悲壯的衰落

VISIT…

2 020 8355 6

悲壮的衰落

——古埃及社会的兴亡

金观涛　王军衔　著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图书馆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成都

责任编辑：安庆国
封 面 图：朱 岩
插 图：朱 岩
装 帧：盛寄萍

走向未来丛书

悲壮的寨落

金观涛 王军衔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mm 1/32 印张10.75 插页6 字数 164 千
1986年 3 月第一版 1986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17118·156 印数：1—26.000

定价：1.55 元

《走向未来》丛书顾问

（按姓氏笔划为序）

包遵信　严济慈　杜润生　张黎群　陈一咨
陈翰伯　钟沛璋　侯外庐　钱三强

《走向未来》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金观涛

副主编：陈越光　唐若昕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学良　王小强　王岐山　王军衡
王晓鲁　王　焱　尹蓝天　乐秀成
朱嘉明　朱熹豪　刘　东　刘青峰
严家其　何维凌　张　钢　阮芳赋
陈子伶　陈越光　易小冶　金观涛
秦晓鹰　贾新民　翁永曦　唐若昕
陶德荣　黄江南　董秀玉　樊洪业
戴士和

编者献辞

《走向未来》丛书和读者见面了。

她凝聚着我们的心血和期望。

我们期待她能够：展现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面貌；反映人类认识和追求真理的曲折道路；记录这一代人对祖国命运和人类未来的思考。

我们的时代是不寻常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人们迫切地感到，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千变万化的未来。正是在这种历史关头，中华民族开始了自己悠久历史中又一次真正的复兴。

在艰苦而又富有生命力的改革道路上，我们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理解了科学的价值，并逐

步深化了对我们时代和民族的认识。今天，我们听从祖国的召唤，热情地投身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潮流。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今天，照亮我们民族的思想闪电，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的结合，以及由此开始的创新！

《走向未来》丛书力图从世界观高度把握当代科学的最新成就和特点，通过精选、咀嚼、消化了的各门学科的知识，使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能从整个人类文明曲折的发展和更迭中，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科学地认识世界发展的趋势，激发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和责任感。

她特别注重于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新兴的边缘学科的介绍和应用；把当前我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方面创造性的成果，严肃地介绍给社会，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

《丛书》是个新的园地，她将自始至终贯彻严肃认真的学风和生动活泼的文风。

---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16页。

《走向未来》丛书，从她一开始就受到老一辈共产党人关怀，受到学术界前辈的热情支持。

约四百年前，弗兰西斯·培根在《伟大的复兴》一书序言中，曾经这样谈到书中描述的对象，他“希望人们不要把它看作一种意见，而要看作是一项事业，并相信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我们怀着真挚的感情，把这段话献给《丛书》的读者，希望广大读者关心她、批评她、帮助她。

让她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

《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三年六月于北京

引言·过去的世纪

斯芬克斯屹立在人类从野蛮通向文明的门槛上。他向每一个文明起源的探索者投来挑战的目光，并把他引向一个迷宫般的世界。这就是古代埃及。

——作者

早在古罗马诞生以前，那些古老的石头就似乎在说："切记你们只是尘土，世代生而又死，城市建而复废，国家兴而再衰，而我们却永远屹立。"当罗马终于化为一片尘土时，金字塔仍在这样说。

——安娜·泰利·怀特

1798年5月，拿破仑率领他的三万余名远征军进入埃及。当队伍溯尼罗河向南，跋涉在鲁克苏附近的旷野时，突然，他们看到了屹立在那里的古代埃及的建筑群。巨大的雕刻和宏伟的庙宇，虽然经过数千年的风化，表面已经剥落，但它们仍象战士一样守卫在荒漠之中，那尊曾经被称为万古一世君王的石像，冷漠的脸上映照着夕阳的余辉，全然不顾已经流逝的四千年岁月。拿破仑和他的士兵们被惊

呆了。据当时一位随军法国画家范特·德农后来回忆："大军一看到那片废墟，就情不自禁地停下来，把武器放在地上。"拿破仑和他的士兵们被一种古老的文明震动了，他们沉浸在对远古历史的回忆之中。终于，拿破仑打破了这种沉静，他站在高处，面对军队激动地高喊着："士兵们！四千年的历史今天从这些金字塔上面看着你们！"士兵们在这些伟大的古代建筑面前不禁肃然起敬。

今天，我们很少会有拿破仑远征军士兵那种机会，站在雄伟的埃及金字塔面前，内心突然被一种古老的文明所震动。人类的历史记忆是短暂的，古埃及社会似乎已被人们所遗忘。在科学技术飞速进步的二十世纪，有多少人会去考虑古代埃及对我们今天有何意义呢？然而，当人们津津有味地讲述着古希腊美丽的神话、古罗马的赫赫业绩时，又有多少人会想到，古埃及文明对古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我们的文明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是的，古代埃及距离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遥远了。古希腊古罗马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是很古老的过去了，但是古埃及对于古希腊、古罗马在时间上正如古希腊古罗马对于我们。美国的埃及学者莱昂内尔·卡森说："在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人于诺萨斯建造宫殿之前的一千年

前，在以色列人追随摩西摆脱奴隶身份之前的几百年，埃及已经是一个大国。当意大利半岛的部落民族还在台伯河畔结草为庐的时候，埃及已经繁荣昌盛。二千年前的希腊罗马人看埃及，就已有点象现代人凭吊希腊和罗马的废墟了”。①

岁月的流逝，人类社会的飞速发展，使当代的人们很容易对古代人类的文明产生一种麻木和轻视的情绪。对于古代埃及这样远古的社会，我们很容易轻率地把它想象为“原始的”，“极端贫困和野蛮的”，认为了解它们只是考古学家们的事情。古代社会中的一切都简单地被当作历史博物馆中满足人们好奇心的陈列品。一般人对于它们作为古董的价值估计远远大于对它们的文化价值和科学价值的估计。

正是因为这种对古代文明的轻视，人们一旦看到那数以百计的、屹立在尼罗河畔沙漠中的金字塔时，一种不可思议的惊愕感觉就会油然而生。这些金字塔是那样的巨大而宏伟。就拿其中第四王朝法老胡夫大金字塔来说，它是法国埃费尔铁塔建造前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它用巨石230万块 每块约重

①莱昂内尔·卡森：《古代埃及》，纽约时代公司出版 1979年版，第11页。

2.5吨，塔底占地面积达52900平方米。塔高146.5米，斜面长度为180米。建筑金字塔所应用的科学技术知识，更令人惊叹不已。当代专家用新式仪器进行测量后发现，金字塔的东南角仅仅比西北角高半寸。这样巨大的工程，这样高的精密度，对于掌握了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的当代人，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于是有些人把大金字塔当做“不解之谜”，认为这是外星人访问地球所留下的遗迹。

瑞士作家厄里希·丰·丹尼肯在他那本风靡世界的小册子《众神之车？》中说：“在埃及，巨大的城市和宏伟的庙宇、富有表现力的巨大雕像，两旁树立着精美雕像的漂亮街道，完整的排水系流，雕刻得富丽堂皇的石头墓穴，其大无比的金字塔——诸如此类的奇异东西比比皆是。一个国家，看不出有什么史前发展史，却能够突然取得这样的成就，这真是奇迹了！”①他认为：“在二十世纪的今天，没有一个建筑师能够再造出一座胡夫金字塔，即使他拥有世界上所有的技术手段也不行。”②他列举了金字塔的一些奇怪的特点：胡夫

①厄里希·丰·丹尼肯：《众神之车？》，上海科技出版社1981年版。

②厄里希·丰·丹尼肯：《众神之车？》，上海科技出版社1981杜版。

金字塔的高度乘上十亿大致相当地球和太阳间的距离，即1.5亿公里，这真是巧合吗？穿过这座金字塔的子午线正好把大陆和海洋平分成相等的两半，这也是巧合吗？这座金字塔的底面积除以两倍的塔高刚好是著名的圆周率π＝3.14159，这难道还是巧合吗？”他认为，古埃及人已经算出地球重量。金字塔所在的岩石地基水平度很准，这些都不可能是巧合。① 于是这位作家肯定地说，所有这些成就乃是宇宙中的陌生的来客所为。② 几年前，我国电视播放了以《众神之车？》为题材拍摄的电影《向往未来》后，“金字塔是外星人建造的”，已成为人们热衷的一个话题。

撇开厄里希·丰·丹尼肯这些材料是否可靠不讲，有一点确实是令人困惑的：古代埃及人还没有掌握铁器，建造这些金字塔时，甚至还没有发明车子〔注〕。他们是怎样雕琢这些巨石？又是怎样搬运这些巨石的呢？更使人不能理解的是，对古代埃及的金字塔建筑工地的考古发掘表明：修建金字塔时在同一时间内投入工程的工匠大约只有4千人，而

①②厄里希·丰·丹尼肯：《众神之车？》，上海科技出版社1981年版。

〔注〕：车子是在新王国时期传入埃及的。

不是象古希腊史学家们所说的几十万人。那么，古代埃及人又是怎样在短短的二十多年内就修成了这样伟大的工程？确实，这对于“想当然地”把古代文明看作极端落后的人是难于想象的。

1978年3月15日，日本的一群考古学家企图用模拟古人的办法，来解开这个谜。他们在胡夫金字塔前，用5445块重约2吨的石块，砌成了高11米的金字塔。它为胡夫大金字塔的十四分之一。这次模拟试验证明，这些金字塔正是用古代技术建造的。人们之所以会有不可想象的感觉，关键在于我们忽视了古代文明的创造力，而把今天人类用于解决问题的某些途径看作是唯一方法，我们太看轻古代文明的创造性和适应性了！这说明，人们今天对古代文明所持的很多简单化的观念都是错误的。

就拿搬运重达2.5吨的石块来讲，在我们看来，如果没有起重机，必须在石块下安放滚木，为了使地面平整还要在地上铺木板（正如我们在发明起重机和相应的机械前所做过的那样）。模拟试验表明，用30个人拉这样重的石块，牵引2公里费了一个多小时，而要把石块拉上金字塔的斜面靠30个人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为了将石块拉上斜面，只好在石块后面用千斤杠支撑，结果用了3根千斤

杠，30个人拚命拉才勉强移动了1厘米。使用滚木，结果更糟。在一连串的失败下，考古模拟实验小组突然想到一幅古埃及壁画。那是一幅在中王国埃尔塔尔舍的托提荷太普墓（公元前2000年即十一王朝的孟图霍特普三世）中记录牵引60吨巨型石象的壁画，画面上没有使用滚木。画的前方，有四列共166人的牵引队伍，后面的巨象放在木撬上，有一人手执容器在木撬前洒润滑油*。考古学家们决心用这种方法试试，果然问题迎刃而解，搬运效率大大提高了。考古模拟实验表明，古埃及工匠无论在采取石块，搬运石块，堆砌金字塔，测量和保持同一水平面等各方面都采用了独特的技术①。金字塔就是这些技术的杰作。

“太阳船”也许是现代人轻视古代文明的另一个例子。考古学家早就发现在美洲也有类似于古埃

---

*古代埃及人们似乎耗用大量的润滑油，从一些墓室的壁画上可以看到有人去领取润滑油的画面。他们把牛羊脂肪和杏仁、芝麻、蓖麻、橄榄的油制成润滑油。专为擦皮肤用。一份文稿曾说：“擦了这种油膏，可使人的关节柔软轻快。”另据说在公元前1100多年时，一些为法老修建底比斯坟墓的手工工匠们曾组织了一次大罢工，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这类工人的第一次罢工。而罢工的原因竟然是他们缺少防护油。（美国《科学文摘》，1982年8月号。）

①《文物天地》1981年第1期，第44页。

及的金字塔。有人推测建造这些金字塔是受了古埃及的影响。但是古埃及时代的船只大多都是用尼罗河畔沼泽里的纸莎草编织起来的。*这种船很轻，哪怕跟房子一般大小，也不过2吨重。古埃及人造的这种船能载80头牛，还能载运200人。据说能载运40吨的东西。但人们一直认为这些船不适合航海。纸莎草长期浸泡在海水中会溶解、腐烂。因此用“纸莎草”做的古埃及“太阳船”看来是不可能飘渡大洋的。美洲金字塔和古埃及金字塔的类似也就成了一个不解之谜。这个问题一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挪威的托尔·海尔达尔著名的探险后才得到解决。这位探险家坚信，只要按古埃及壁画上的形状和技术来编织，这种太阳船一定能经得起大西洋惊涛骇浪的考验。经过十几年的试验，他用了28万根芦苇编织了一只太阳船，并依靠这只太阳船从埃及摩洛哥的萨菲港出发，经历57天，航行了3270浬，终于在巴巴多斯登上了美洲。他用事实证明了创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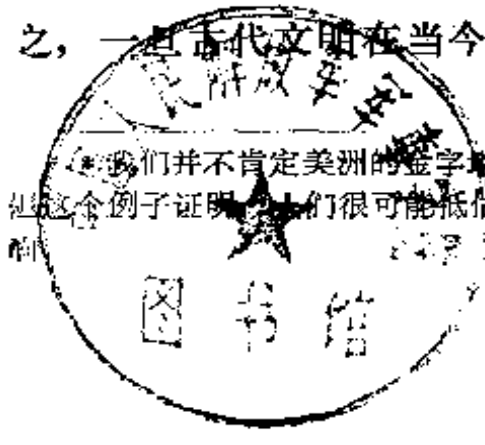
---

*古埃及也有木制的船，但埃及木材大量依靠进口，本地所产奇缺。有史料记载：大约在公元前2600年左右，埃及曾一次用40艘船，从黎巴嫩满载雪松而归，这些木材均为修建城堡宫殿。（见《帕勒摩石碑铭文》，载《世界古代史史料选辑》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另见〔美〕埃克霍姆所著《土地在丧失》，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古代文明的人类确实能做到今天我们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当代人对古代文明的种种误解说明，人们总是过分看重今天文明进步所取得的成就，而不把古代文明看作人类曾生存和创造的活生生的生活方式。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任何一个文明都是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建立的一种组织形态，在古代，人们也曾经征服过自然，发展起一套与其相适应的技术。无论是古代文明还是当代社会，它们都是人类文明不断演变的历史中的一个阶段。

当我们不再把古埃及金字塔中的壁画当作一种与己无关的图案时，就会从中看到古代人的理想、社会制度和他们的奋斗：我们的耳边会响起尼罗河畔三千年前的农人打谷时所唱的歌声，眼前会呈现出他们全家人在一起猎取野鹅和河马时欢快的情景；我们可以想象丰收时节古埃及人大杯畅饮啤酒的豪华的宴会；而当大动乱的黑暗来临时，他们对文明失望，只得把哀思和追求放到永恒的冥世之中。总之，一旦古代文明在当今人类面前恢复了它的真面



* 我们并不肯定美洲的金字塔是横渡大西洋的埃及人修建的，但这个例子证明，我们很可能低估了古埃及文明对古代世界的影响。

目——任何一个时代人们都会经历的有欢乐，有痛苦，有成功，有失败的社会生活，那么，我们的内心就会有所触动。因为这些古代社会比我们今天的文明存在了更长的时间！

古代埃及社会在公元前三千多年前就已形成了。她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一直保持到罗马帝国时期。也就是说，她已经经历了三千年时间的惊涛骇浪的考验，这个时间比西方文明从古希腊开始一直到今天的历史更悠久。一个人只要置身于人类社会那漫长而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之中，就会深感自己的渺小和盲目。人类对过去的世纪知道得太少了。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用广义相对论的方程研究宇宙演化的进程，知道大爆炸后三分钟之内发生了一些什么，能推算500亿年后宇宙收缩时壮丽的情景。对于生物进化的理解也随着分子遗传学的发展而日益深化。但是，对于古代文明的维系、停滞、灭亡的机制我们却所知甚少。从这个意义上讲，位于尼罗河畔的古代埃及历代法老的金字塔对我们就有特殊的意义。它们深藏着一个在地球上生活了三千年但人类对此已完全失去记忆的伟大文明的信息。这里有文明起源的秘密，古老科学技术征服自然的秘密，还有文明停滞然后又悲壮地灭亡的秘密。

自从十九世纪弗朗西斯·商博良第一个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以来，历史学家一直依据各种考古资料来拼出古埃及社会制度的历史图画。一百多年来的积累，虽然整个画面很大一部分还残缺不全，但古埃及的社会结构已经可以粗略地勾画出来，并放到理论历史学家的面前。

本书企图在理论上作一些新的尝试。我们通过近年来有关古埃及史料的收集和分析，对古埃及文明起源、社会结构、王朝更替机制等方面，都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本书将为《兴盛与危机》一书中提出的古埃及社会也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假说提供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证。①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这些观点并不一定正确，但我们希望本书能把读者带到古埃及社会中去。我们期望用这些不成熟的分析来引起人们的进一步探讨，以激发对这段人类曾经经历过的悲壮历程进行深思。

作　者　1985年于北京

①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7—310页。

目　录

引言：过去的世纪…… 1

第一章　古代文明的起源…… 1

1-1 从混沌走向有序…… 3

1-2 干旱怎样促使原始人群的聚合…… 8

1-3 痛苦的转变…… 14

1-4 尼罗河泛滥带来不同部落间复杂的关系…… 20

1-5 打破“史前的梦乡”…… 24

1-6 构想自组织机制…… 30

1-7 地理决定论还是系统演化…… 35

第二章　古埃及社会结构…… 45

2-1 古代文明的物化外壳…… 47

2-2 “灌溉系统”、“东方专制”以及
“社会结构调节原理”…… 55

*　　*　　*

2-3 “国家—诺姆”经济结构…… 67
2-4 奇怪的奴隶制…… 79
2-5 神权官僚政治…… 89
2-6 诸神的王国…… 98

第三章 王朝更替之谜…… 115
3-1 历史的力和社会结构型变……117
3-2 神权官僚政治的异化：祭司力量失控……130
3-3 官僚机构腐化以及“大、中、小官僚奴隶主”出现……141
3-4 王朝瓦解的两种方式和修复机制……148
3-5 两个中间期和轮换主神的原因……156

第四章 又是一个超稳定系统吗？…… 165

*　　*　　*

4-1 古埃及社会的停滞性……167
4-2 另一种振荡机制……174
4-3 涅杰斯、涅木虎和阿吞教……182
4-4 社会演化四种模式……193
4-5 “灭绝型”文明的证据……198

第五章　文明的冲突……207

5-1 从与世隔绝到开放……209
5-2 干扰与冲击……216
5-3 超稳定系统是怎样打破的？……221
5-4 旧瓶装新酒：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229
5-5 两种文明初恋的结果……237
5-6 古埃及文明给人类的遗产……244

*　　*　　*

附录一　古埃及历代王表…… 255
附录二　古埃及主要王朝法老名字的象
　　形文字…… 265
附录三　古埃及象形文字简介…… 291

第一章

古代文明的起源

在我的背后，
我常听见时间的有翼之车，
匆匆驶近，隆隆飞驰。

——Andlew Marvell

1-1 从混沌走向有序

当人类文明的帷幕刚刚拉开之时，古埃及社会已经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出现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了。那是公元前四千年前后，人类由野蛮进入文明，由弱小而分散的氏族部落组织结合成庞大而有序的社会。这也许是整个宇宙进化中最伟大的创举。但是，这个激动人心的历程却统统隐藏在史前帷幕的后面，至今我们对它仍然所知甚少。历史的许多细节，只有猜测而已。

文明起源的机制，是文明研究中最为困难的课

题。目前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仍处于收集材料的阶段。但是，在理论探讨方面，古埃及社会似乎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几乎是最早兴起的文明。古埃及早期社会的一些重要的特点使得我们在书本中对人类社会起源的描述更多地具有科学假说的成分。

众所周知，构成文明社会的基本砖块是处于石器时代的氏族部落社会。考古学以及对目前仍处于狩猎采集阶段的原始社会的研究证明，原始社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组织规模的狭小。非洲的布须曼人的狩猎采集部落一般不到一百人，最少的只有25人。① 处于狩猎采集状态的部落，人口的自然繁殖一般不会造成组织规模的增大。因为原始社会的组织往往是通过血缘关系维系的，组织的大小和它的性质密切相联。人口繁殖到一定程度，这些部落就会分化，分化往往是为了适应环境必然采取的调节手段。今天，很多狩猎采集部落的分化就证明了这一点。爱斯基摩人在狩猎季节常常分解为一个个微小的核家庭从事活动；北美洲的蒙塔格奈人，大洋洲的阿兰达人、毛利人，亚洲的安达曼人、西曼人等许多氏族，至今都保持着这种由一小群人组成

①郑家馨：《论十九世纪以前的南非的社会经济结构》，《非洲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5月版，第43页。

狩猎采集集团的生活方式。要在一个个原始部落之间建立稳定的联系，实现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各种交往，这在史前似乎是极其困难的。当时，大地是如此辽阔，食物是如此丰富，这些原始的狩猎采集部落完全可以自由地游荡，当他们碰到另一个部落，即使发生接触，那也是暂时的。这种不稳定的交往很快会随着部落的分离而消失。这些游荡的部落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似乎同将氮、氢、氧、碳单个分子化合成蛋白质那样艰难。

狩猎采集的部落要形成农耕文明，一般说应具备两个先决条件。首先，他们必须定居下来，只有定居，才会显示出农耕的优点，各个部落才有建立稳定联系的可能。这一过程是怎样实现的呢？人们通常容易想当然地认为，在狩猎和采集时期，人类生活大约是极为艰难和食物不足的，因而由游荡变为定居，由狩猎采集改为农耕是为了克服早期人类食物不足而不得不迈出的一步。然而近年来对世界上现存的狩猎和采集部落的研究发现，这种设想并没有根据。就拿布须曼人来讲，他们每人每天能够吸收大约2140卡路里的热量，93.1克蛋白质。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每人每周只要劳动20小时，就足以维持生活了。史学家常常感到困惑，古代的生存环境肯

定比今天的布须曼人的要好，他们获得食物也更为容易，那么人类为何要开始农耕，这似乎是一个谜。①

形成农耕文明的第二个先决条件是，人们定居下来以后，“互相交往”要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需要。这比由“游荡”到“定居”更为困难。每一个原始部落的村落都有着自己的耕地、语言、习惯，以及自己的血缘组织。在经济上，各个原始村落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处于“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再加上交通上的不便，共同语言的缺乏，使得建立联系十分困难。而心理上、文化上、酋长权力上的天然封闭性更使原始部落的互相交往难于进行。即使在农业社会，古代村落的自我封闭状态也是屡见不鲜的。因此，由众多的原始部落组成一个跨地域的社会组织首先必须要有一种力量来摧毁每一个部落、村社这种天然的封闭性。它要足以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只要每一个原始部落群体单独存在，就必然是不稳定的。

古代埃及文明的兴起，毫无疑问也必须跨越这两个障碍。由狩猎采集转化为农耕在埃及究竟是怎

①孔令平：《世界现存的狩猎和采集部落及其生产活动》，中山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第69—84页。

样实现的，历史学家们至今说法不一。一种意见认为，人类最早的农耕文明产生于两河流域，埃及是受了西亚的影响。另一种意见认为，埃及农耕文明是独立形成的。古代埃及人和东非各部落有着亲属关系，无论在人种上还是语言上，都表明了这种关系。在埃及和尼罗河流域周围高地上的考古发掘证明，很可能创造古埃及文明的部落从旧石器时代就住在东北非，他们靠自己的手创造了独特的农耕文明，而并非受到两河流域的影响。① 这一观点在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中多少得到了证实。在埃及的塔萨文化层（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考古发掘，发现当时人们即已开始从事农业，种植大麦。大约在18,000年以前，埃及已出现了实验性的农耕。南部埃及的库巴尼耶，* 发现了碳化了的距今18,300—17,000年前栽培的大麦粒。它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已知的最古老的炭化粮食谷粒。② 虽然这个问题至今尚难以定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坚持埃及是独立发展起农耕文明的观点。特别重要的是，这项考古发现把埃

①阿甫基耶夫：《古代东方史》，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84—18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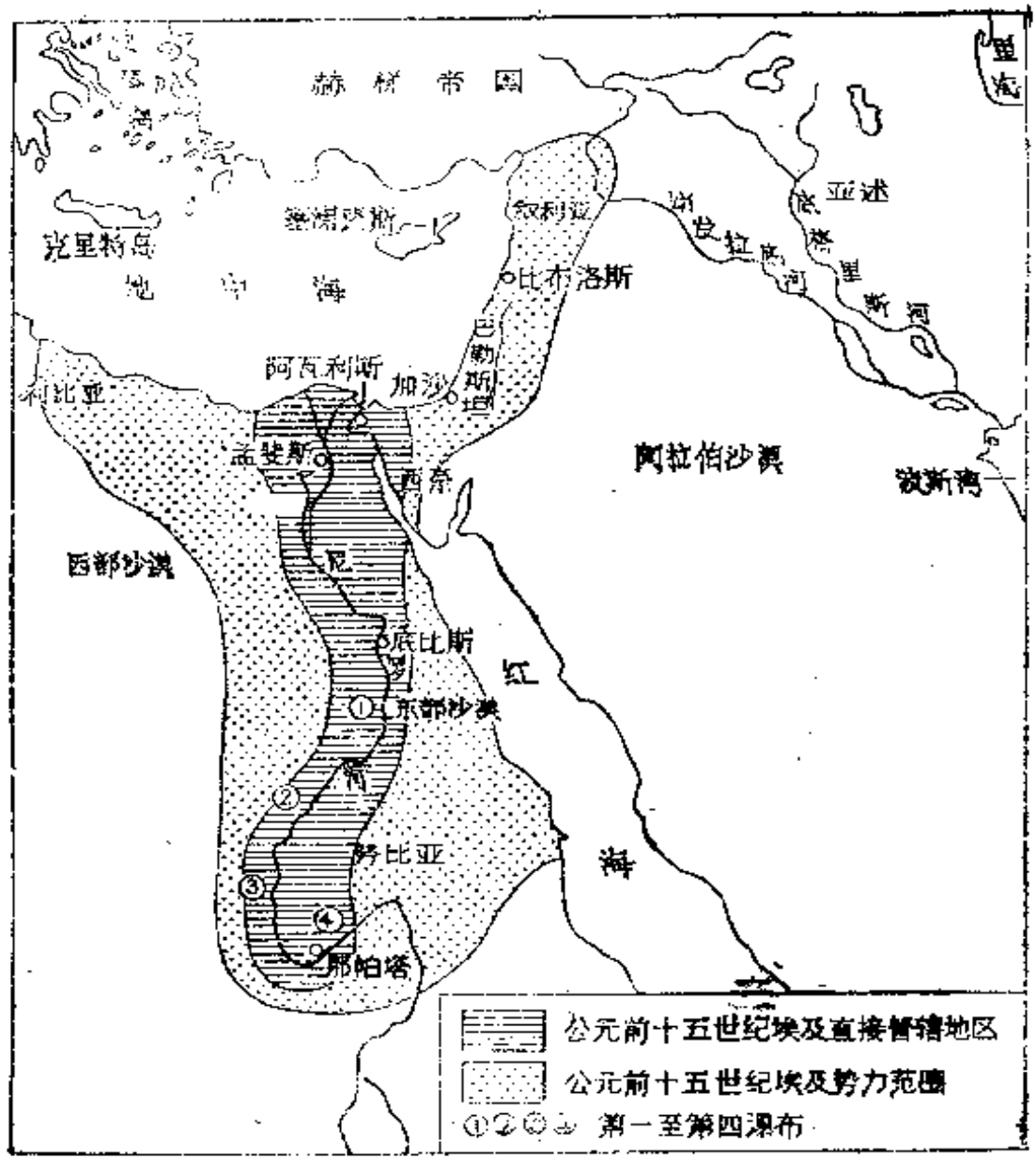
* 位于今天埃及境内阿斯旺北约二十公里处的尼罗河左岸。

②孔令平：《埃及的农业起源问题——关于农耕起源研究评价之三》，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1期。

及农业的起源一直推到18,000年以前。这个时间可以给我们以一种启发，去剖析原始人是如何克服上述两个障碍走向文明的具体进程。

1-2 干旱怎样促使原始人群的聚合

埃及的农业虽然起源于远古时代，但岁月的遥远并不妨碍我们了解人类由狩猎采集向农耕转化的过程，这大概要归功于埃及的特殊的地理环境。现在，历史学家对这一地带气候的历史变迁已掌握了很多知识，这些知识综合起来，将能帮助我们对于这一转化机制进行科学的推断。图（1.1）是公元前1,450年左右古代埃及处于鼎盛时期的版图。这时，整个埃及帝国的势力范围虽然扩大到40万平方公里，但是，古埃及社会所直接管辖的核心地带只有2.7万平方公里，而其中的可耕地则更少。它的西部是无法逾越的撒哈拉大沙漠，东部虽然距离红海不远，但是仍被阿拉伯沙漠隔开。古埃及的可耕地就分布在处于两大沙漠之间的尼罗河两岸及由于尼罗河长期冲积而成的不大的平原——尼罗河三角洲上。尼罗河谷地长达1,200公



图（1.1） 古埃及鼎盛时代的版图

里，其中南部一般宽度在15—25公里，北部有的宽达50公里。这条尼罗河河谷宛如一条细长的绿色生命线，置于茫茫的沙漠之中。（参见地图一）我们知道，干旱的撒哈拉大沙漠，四十年还不一定下一次雨。古埃及社会赖以生存的尼罗河河谷那细长的绿洲，正是水量充足的世界第二长河，横穿沙漠流向地中海带来的副产品。难怪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要把古埃及称为尼罗河的赠礼。人们一定会非常奇怪，为什么恰恰是这样一个地区成为人类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为什么在一万八千多年前，这一地区就开始了实验性的农耕生产呢？

科学家发现，大约在公元前20,000至50,000年，目前这片世界上最干旱的地区曾是一片风调雨顺的沃野。图（1.2）表示了南部埃及从公元前120,000年到公元前3,100年的气候变化。我们似乎发现了两个干旱周期。第一次干旱出现在公元前二万年左右，到公元前7,000年似乎情况有了局部好转。但到了公元前4,000年左右，干旱进一步加剧，它使得整个东北非洲只限于尼罗河河谷和少数绿州才适合人类生存。这张图中很自然使人联想到东北非。由狩猎采集部落向农耕文明的转化正好是在1,800年以前，而且古埃及文明又恰恰是在公元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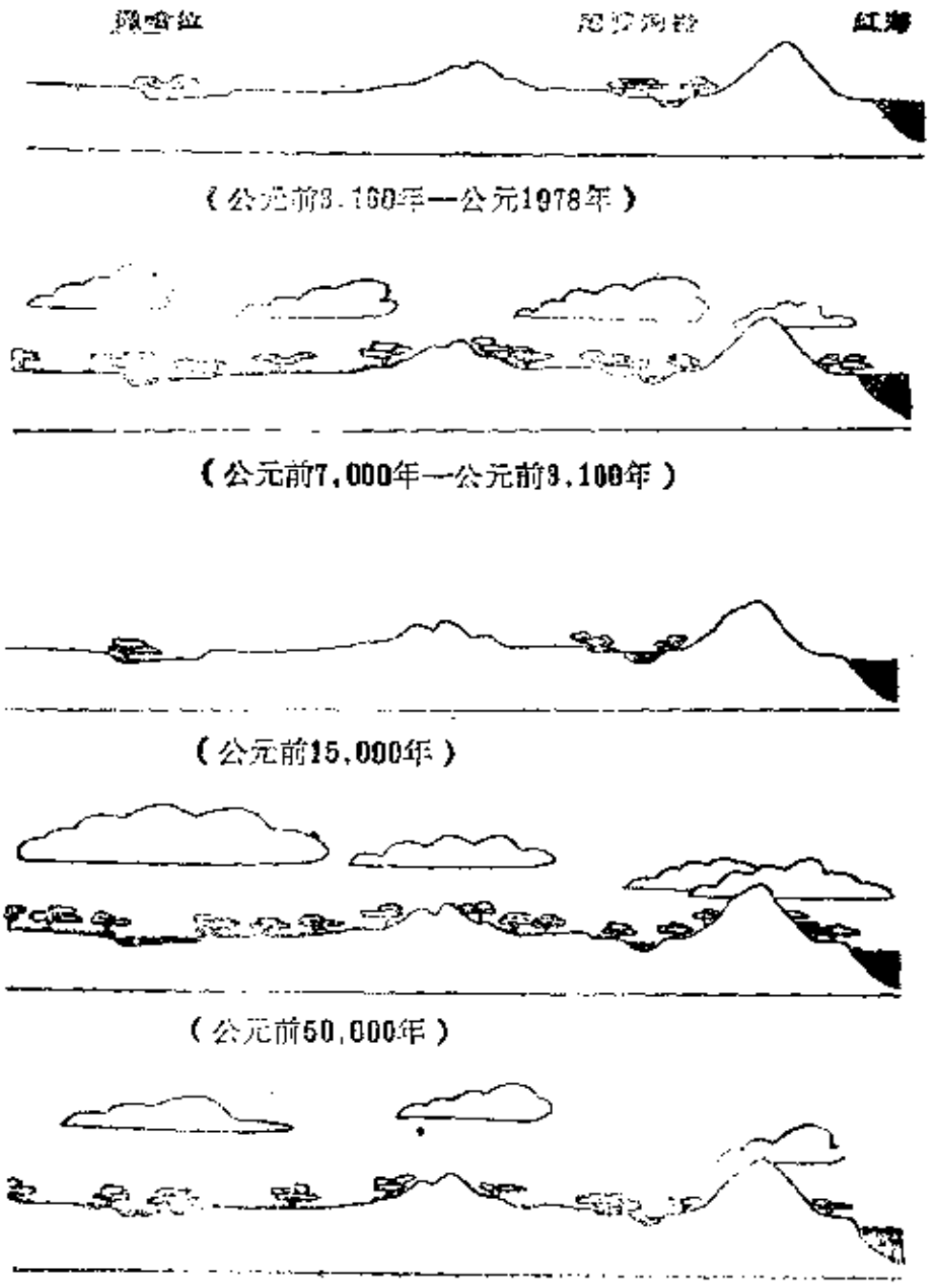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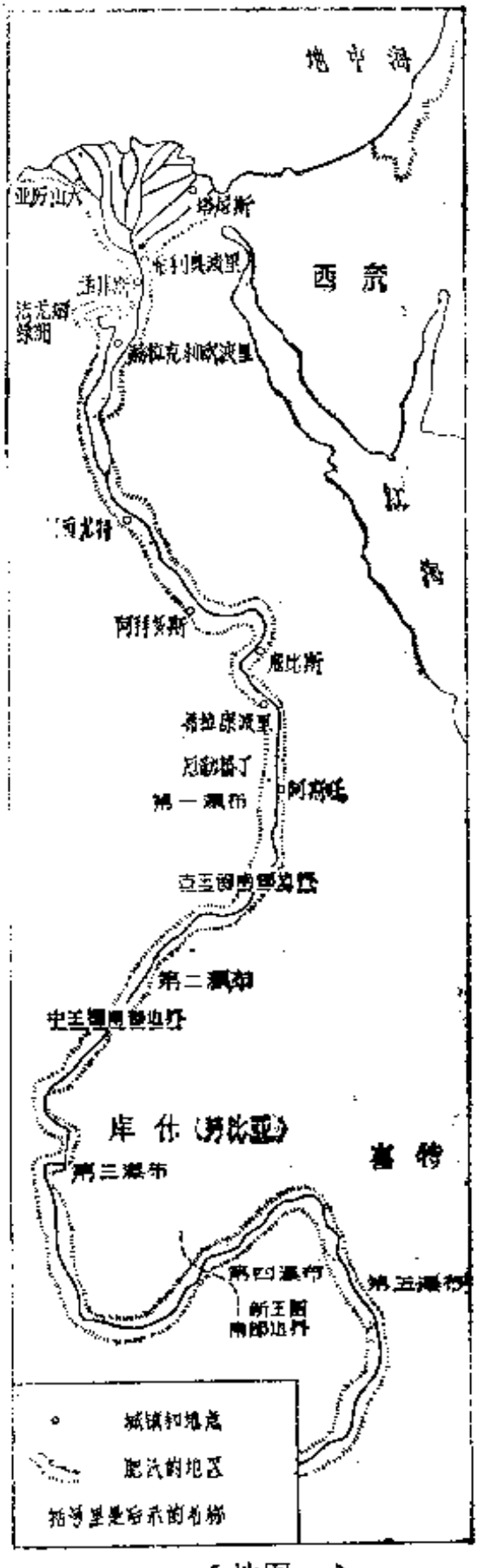
图1.2①雨量改变和干旱期对南部上埃及水源和植物群落影响示意图

①Michael, A, Hoffman «Egypt before the Pharaohs»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1980 b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4,000年左右形成的，这和气候变化的相关性难道是一种巧合吗？

1981年11月，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第二次试飞时，它那足够穿透地下15英尺干沙层获得信号的遥测系统，发现了淹没在今日埃及西南部沙漠下面的一个巨大的地下河谷。这一发现轰动了世界。它表明，在20,000年以前，存在着一个比尼罗河流域规模大25倍的河谷。一些科学家据此认为古埃及人最早就生活在这一广阔地区，由于撒哈拉沙漠的出现，他们才被迫迁移到尼罗河河谷。①这种想法是有根据的。25,000年以前，肯定有着为数众多的处于旧石器时代的原始狩猎采集部落活跃在这千里绿洲之中。古代非洲的草原和森林就如海洋哺育着鱼儿那样养育了这些原始部落，使它们繁殖，并布满大地。如果没有20,000年前开始的这次大干旱，也许这些原始部落今天还会如目前残存的那些非洲部落那样一直游荡下去。但是，干旱的降临使得森林和草原消失了，他们不得不去寻找新的栖身之地。而在这一广大地区中，这种栖身地只有一个，这就是那狭长的尼罗河河谷地带。

① 《美国航天飞机发现埃及沙漠下的巨大地下河谷》见1982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


地中海
亚历山大
塔尼斯
西奈
法尤姆
绿湖
阿尔特
阿拉斯
底比斯
阿斯旺
第一瀑布
第二瀑布
库什(努比亚)
喜特
第三瀑布
第四瀑布
第五瀑布
新王国
南部边界
城镇和地点
肥沃的地区
括号里是古代的名称

（地图一）

1-3 痛苦的转变

我们的脑海中，仿佛出现了这样一幅宏伟的历史画卷，一个个的原始部落群，在干旱的驱使下，怀着巨大的惊恐心理，成群成队地向那陌生遥远的地方举家迁移。为了对这种迁移获得印象，只要想想近三年来非洲干旱带来的后果。今天从非洲由北至南，从东到西，河流干涸，田地龟裂，黄沙弥漫。有三十四个国家遭受大旱，二十四国发生了饥荒，1.5—1.8亿人忍受着巨大的饥饿，至今已有几千万人死亡。撒哈拉大沙漠以每年15公里的速度向南大口大口地吞咽着绿洲。难民们成群结队涌向他们能够生存的地方。当然，在今天的国际秩序中，难民并不能自由自在地移居（虽然有大批难民越过了邻国的国境）。他们涌向政府设立的救济站，等待着国家及联合国的救济。今天，人类已经掌握了高度的文明手段，对待这长时间的干旱所采取的适应方法尚且如此，那么几千，上万年前的人类被那干旱迫离的状况更加可想而知了。

一个个原始部落，在大干旱——这把无情的扫

帚的驱使下，不得不聚集到尼罗河河谷地带，远古的人们，一定痛苦地意识到，他们不得不改变数十万年来养成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他们除了进行农耕也许别无其它出路。对尼罗河谷的考古发掘证明，在大干旱以前，这儿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当时河水水量远远比大旱以后大，两岸布满了茂密的树林，沼泽密布，野兽出没其间，毒蛇、蚊蝇成群。考古学家们只是在尼罗河岸的第八层谷地和第五层谷地上，才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燧石制工具，但却未发现那个时期人的骨骼以及其他遗物。①

据考证，尼罗河流域高出目前水位90米，在45米的砾石层，即从第二瀑布附近的瓦迪·哈勒法（今苏丹境内）北至开罗，并无人迹。只是在高出水位30米以下的砾石层谷地上，考古学者才找到了不同时期的旧石器遗物②。图（1.3）可以证明，并非人们一开始就定居在这个孕育了伟大文明的地区。迁到尼罗河谷地区乃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这一狭窄的地带对于一个个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原始部落是一个巨

①A·费克里：《埃及古代史》，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页。

②《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0—24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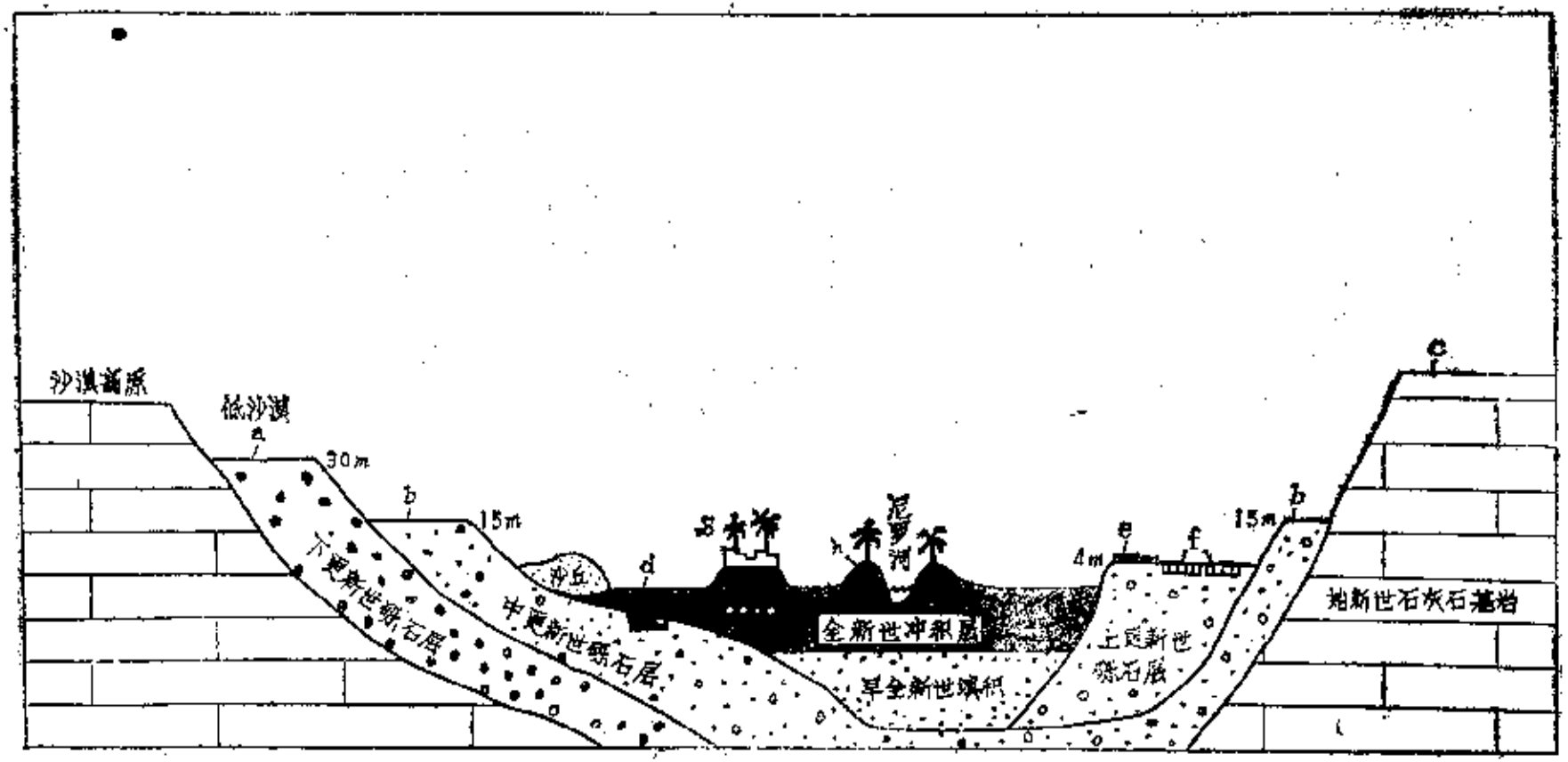


图1.3 尼罗河谷考古遗址与地质特点关系图解

a.b.尼罗河砾石层，含有旧石器时代（旧石器早期）工具，地表有零散的中旧石器时代（旧石器中期）的人工制品。c.前王朝时代墓石，分散于沙漠地表。d.可能有“被埋藏的”前王朝时代墓地，在后来的淤泥沉积之下。e.前王朝时代居地遗址。f.前王朝时代墓葬。g.现代的农村，在文化土丘上（以古代遗址为基底？）。h.堤上道路，傍尼罗河低水位河道。参见《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1页。

大的考验。如果他们不选择农耕方式，那么地域的狭小决定了狩猎采集所需的自然资源迟早有一天会不足以养活人口，无法维系整个部落的生存。因此，无论古埃及的农耕究竟是从西亚（或别的什么地方）传来的还是自己独立发明，这对于古埃及文明形成的机制并不重要，此时此地，他们只有通过农耕生产方式才能维持生活。原始社会的埃及人不得不改变从远古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生活方式了！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既然由狩猎采集向农耕这一伟大的转变在埃及发生于18,000年前，为什么一直要等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才兴起古埃及文明呢？它无疑证明了我们前面讲到的原始村落本身的封闭性对文明形成构成多么大的障碍。

一般说来，打破原始村落的封闭性往往须经过漫长的时间，它需要人口的增长，耕地的扩大，人们的农耕技术的提高，需要原始村落之间由于生存空间的相对缩小而不得不发生接触。但是古埃及社会所处的特殊的自然条件似乎可以大大加快这一个过程。很可能从公元前7,000年—3,000年这段时间干旱的相对缓和起了微妙作用。在气候变得稍为湿润的几千年中，农耕文明星罗棋布地撒在更为广阔的地区，虽然每一个农业点的人口并没太大增

加，组织规模也没有发生多少改变，但它的总数增加了。而当公元前4,000年左右干旱又一次加剧时，这使分布在较为广阔地段上的已经从事农耕生产的原始村落（或从事实验性农耕的部落）不得不再次集中到更靠近尼罗河的河谷地带。也就是说，干旱又一次起到了将人群相对集中起来的作用。*

必须指出，这一次集中也许是历史性的。人类已经掌握了过去不曾有的农耕技术，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从来还不曾这么紧密地生活在一起！确实，大量部落一旦在尼罗河谷密集地定居下来，和他们在别的地方定居下来所面临的处境就大不一样了。首先，这个地区是如此狭窄，河谷宽度只有几十公里，一个部落很容易就占满了它。如果要进一步发展，只有沿着尼罗河谷向纵深方向展开。因而只要两个相邻的部落定居下来，随着人口的繁殖，它们必然要在尼罗河上相遇。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尼

*这一结论也许仅仅适合于南部上埃及，似乎有证据表明，上埃及文明起源更早一些。五十年代前，史学界普遍认为尼罗河谷地区的环境在史前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七十年代后，地理学的研究已反驳了这种观点。至少在南部埃及尼罗河谷地带是适合人类居住的。

（Michael. A. Hoffman《Egypt before the Pharaohs》Part I8 Fi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in in 1980 b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罗河两岸，农耕村落如同一颗颗明珠自南向北点缀在尼罗河两岸。而尼罗河则犹如一根细线，开始将这些念珠串联起来。

从地理条件上讲，尼罗河是村落之间互相进行联系和交往的天然渠道。世界上有许许多多伟大的河流，它们中有的为古代人类提供天然的通讯和交通工具，有的为养育古代文明提供肥沃的土地和充足的水源。而尼罗河在这两方面都最为优越。从它进入埃及在阿斯旺附近的第一个瀑布算起到地中海这整整1,400多公里的地段内，船儿可以航行无阻。最有趣的是，这种航行大多数时候都不需人用力划桨。因为风向一般是由北向南，正好和河水的流向相反。一只小舟可以满意地顺水漂流而下，而它在回来的途中又只需要鼓起风帆。理解了古埃及社会所处的特殊条件，我们大约就不会对在这里最早出现伟大的古代文明感到惊异了。古代埃及的几十个州(诺姆)和大大小小的村、镇犹如明珠般地顺着河流鳞次栉比地排列，这条处于沙漠中的大河养育了它们，创造了它们，并为它们之间建立经常的联系和交往提供了天然的通道。

当然，仅仅指出一个个定居的农耕村落之间存在着地理上互相交往的条件，并不足以证明这些村

落必然要组成一个庞大的文明社会。河流和地理环境虽然提供了建立社会组织的通讯工具，但社会组织本身的产生首先要打破各个村落本身文化、制度和血缘关系上的封闭性，它必须要靠一种自组织机制来实行。而在这一自行组织的过程中，尼罗河以及从公元前4,000年以后开始的干旱加剧大约又一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4 尼罗河泛滥带来不同部落间复杂的关系

史前农耕村落的生活是平静不变的。它们经济上完全自给自足，每一个村落都有自己世世代代因袭下来的习俗，他们用自己特有的语言交谈，崇拜自己的图腾，这种生活似乎可以世世代代延续下去。但是，定居在尼罗河谷的村落却做不到这一点。这平静的史前生活的梦乡迟早会被文明的脚步声所惊醒。这种力量不是外来的，而是由它们之间相互之间复杂的关系造成，它同样是尼罗河的赠礼。

为什么说那处于尼罗河河谷地带上一个个村落

之间一定会出现一种非同寻常的关系呢？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尼罗河河谷耕地的地界不可能一经划分就长期固定。农耕村落平静生活的首要条件是它的耕地和疆界的范围天然固定。这在尼罗河各地区却无法做到。尼罗河不仅是古埃及人饮用、灌溉农作物的水源，而且是那里耕地的创造者。图（1.4）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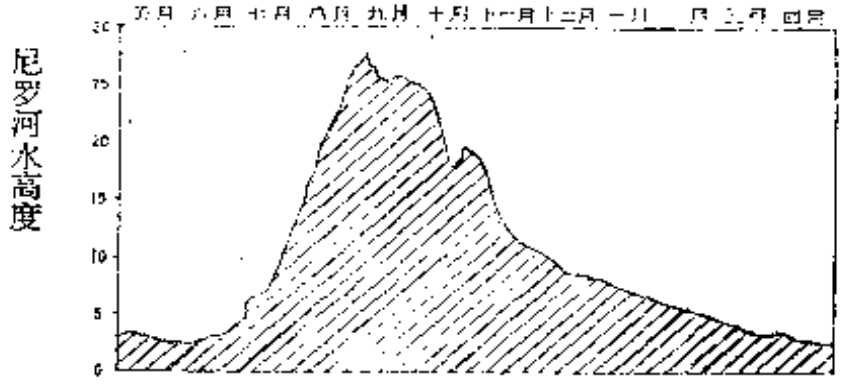


图1.4　尼罗河水涨落模式

尼罗河涨落模式，这种模式在以往的数千年中一直保持不变①。每年5—6月随着尼罗河上段埃塞俄比亚境内大雨滂沱，尼罗河就泛滥，河水暴涨，淹没整个处于河谷地区的埃及大地。尼罗河水的水位、颜色、带来上段冲击物的多少几千年来处于一种恒定的周期性变化中。即使在今天，这种景象还是颇

①莱昂内尔·卡森等：《古代埃及》，纽约时代公司出版，第34页。

为壮观的。在二月至五月的枯水期内，开罗附近的水差不多清彻透明。六月河水冲来大量腐败的植物，开始变成绿色并散发出难闻的臭味。七月泛滥开始，河水变得浑浊，泥沙滚滚，整个河流变成红褚色（这里面有着大量肥沃的冲积物）。于是河水开始漫越堤岸，泛滥到沿河两岸的土地上。

古希腊的希罗多德于2,000年前曾到埃及游历，据他说："尼罗河在泛滥的时候，它不仅泛滥到三角洲上去，而且也泛滥到被认为是属于利比亚和阿拉伯的那些地方上去；它泛滥到离两岸有两天的路程的地方，有时远些，有时则近些。""当尼罗河泛滥到地面上来的时候，只有市镇才可以被看到高高地在水面之上并且是干燥的，和爱琴海上的岛屿非常相似。只有这些市镇露在水面之上，而埃及的其他地方则完全是一片水。"① 河水浸灌了龟裂的土地，并停留相当长的时间。11月中旬，水位下降，河水退去后，尼罗河两岸上留下了一层厚厚的淤泥，表（1-1）表明每次泛滥给土地带来冲积物的数量和河谷土地每年增高厚度②。从这张表看出，

①希罗多德：《历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②高尔东诺夫：《埃及（经济地理概述）》，三联书店1953年版。

对于那些汲水灌溉系流，每年土地增高在0.3—1毫米之间，可以想见，4,000多年前，每年土地增高量还要大于此数。

今天，大多数人都知道尼罗河的泛滥对科学起源的影响。人们常说，由于尼罗河年年泛滥，远古的人类不得不经常丈量土地，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希罗多德就指出了当前仍为人公认的事实，即在这种丈量活动中才诞生了几何学，而希腊人又从那

表1-1　尼罗河泛滥对河谷耕地的影响

地区		面积(单位：千埃亩)	每年冲积物流入量(百万吨)	每年土地增高额(单位：毫米)
上埃及	汲水灌溉系统	1,128	8.3	1.03
	常年灌溉系统	1,192	2.8	0.31
下埃及	常年灌溉系统	3,230	1.5	0.06

里学到了它。① 但是，人们很少想到尼罗河冲积物对地界经常性的覆盖对文明起源会产生什么影响。

当一个农耕村落内部耕地被冲积物掩盖后，村落内部必须建立一个机构来重新划分它，一次一次

①希罗多德：《历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21页。

的覆盖强化了这种机构。如果说这并不足以打破村落平静的生活的话，那么两个邻近村落地界的消失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件。近年来，社会生物学的研究表明，确定的领土范围对于动物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疆域不明引起的争夺是动物群体组织之间交往的重要方式之一。尼罗河河谷是这样狭窄，当两个邻近的村落地界相接时，一次大泛滥后，纠纷必然出现。两个本来可以老死不相往来的村落发生交往就不可避免了。当秩序尚未建立时，它常常带来混乱。耕地范围毕竟是和每个农耕村落的生活最直接相关的，只要没有跨地域的社会，这种纠纷便会年复一年地重复。每一次都震撼着古老的村落制度。表面上看，这种交往最初的目的似乎仅仅是经济的，但任何两个村落一旦发生交往，它必然同时是政治的和文化的。语言不通，信仰不同等等交往中的天然障碍会被这种交往的冲力慢慢克服。

1-5 打破“史前的梦乡”

引起村落制度崩溃的另一个因素是灌溉。埃及人大约从来没有仰望天空，焦灼地祈祷苍天降雨。

在埃及，下雨是极为罕见的，偶尔的降雨反而使埃及人认为是上天的震怒。实际上，他们也不指望下雨，整个农业的生命线就是那些灌溉田地的水渠。当尼罗河暴涨时，埃及人将河水储存在水渠之中，河水退去后，用这些水来灌溉。当十分干旱之时，还不得不将尼罗河水汲取到水渠中来。直至今日，埃及一些地方的农民还在使用一种叫"沙杜夫"的古老机械(即桔槔)，从尼罗河中取水注入灌渠之中。这种机械大约在十分古老的年代就开始被广泛运用。因此，当干旱时期，河渠中的水是十分宝贵的。一个人扒了水渠或筑堤引水，其邻近地区的水就会缺少。如果说在一个村落内部，它可以用一种古老的制度来解决，那么如果两个相邻村落出现争水的局面时，纠纷必然十分激烈。

即使在埃及建立统一国家以后，这类现象依然存在。古埃及有一本为死人念的颂经——《亡灵书》。* 这一本书是当一个人死后，为了能使死者进入天堂，超度出生，在庙宇上颂读用的。其中的第125章，列出了许多问题，每一个死人必须在判官面前回答，判官则根据该人生前的所作所为决定他是去天堂，或是进地狱。这些问题已成了套语，如：

* 又译为《死人书》。

“我没有作恶，”“我没有逼迫任何人挨饿”……其中有一个问题必须回答，即“我没有在灌溉的季节阻断河水，我没有筑坝拦阻泛滥的河水”。① 直到公元前三世纪，希腊人统治埃及时，某贵族给自己的农庄管理人的指示中还提醒他“应当留心观察……通过田间的上水道，农民经常从那水道取水。”② 就是到了近代，这类事情也还是存在。埃及小说《土地》曾描写一些农民不顾政府的阻挡，避开警察的巡逻，偷偷扒开主渠道，让水流入自己田中。③ 可以想象，当统一的社会秩序尚未建立之前，争水的纠纷会造成什么样的混乱。

尼罗河的每年泛滥甚至对古埃及社会共同意识形态的形成也起过微妙的作用。原始宗教的差异，图腾的不同往往造成原始部落之间的对峙、仇视心理。它们是文明成长的最大障碍。然而，尼罗河的

① 《From the Book of Dead》 Chapter 125,the Judgment of the Dead the declaration of innocence Excerpt from《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VolⅠ, Ⅱ the New kingdem bylicheim 197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② 《对管理人的指示》《世界古代史史料选辑》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12页。

③参见阿卜杜·拉赫曼·谢尔卡维：《土地》，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泛滥却一下子成为在河谷地区生活的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一个历史学家曾这样描述埃及人在尼罗河泛滥时的心理状态："尼罗河每次泛滥，埃及的农民都不免忧心忡忡。每自泛滥之日起，他们都设有专人将水位上升的情形，每日清晨驰赴开罗大街小巷报告，尼罗河泛滥了几千年，几千年都没有成灾（实际上也有成灾的年头，但这类事情是罕见的。作者注），就一般人而言，从过去推知未来，应该可以安心了。可是埃及农夫却不如此，他们把每一次泛滥，都看成一桩了不得的大事。因为泛滥一旦失去控制，他们一生所系的沟渠农田，便有被摧毁之疾。"①

在远古时代，虽然很多村落处于极为相似的自然环境之中，但要他们在同一时刻注视同一自然现象往往十分困难。日食、月食这些景观虽然可以同时吸引不同村落的人们，但它们毕竟不如尼罗河泛滥那样与己休戚相关。毫无疑问，这种对同一问题年复一年的关注，对古埃及形成共同文化的心理基础产生了重要影响。连埃及各地关于世纪起源的神话，也都很类似尼罗河水退去时耕地和岩石慢慢露

①杜兰：《世界文明史》，台湾台北市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4月版，第41页。

出水面的情景。这条伟大的河流一呼一吸和每一个部落的生存息息相关，它肯定为整个埃及接受一个至高无尚的统一的主神提供了心理基础。*

当通讯渠道已经天然具备；一个个社会的细胞（原始部落）密集地排列在这条天然通讯渠道的周围；并且每个细胞的自身封闭性已被打破；各个细胞间的冲突经常发生；古代文明诞生的前夜就已到来。公元前4,000年左右，尼罗河河谷地区的社会正处在这一时刻。尼罗河河谷，它作为一个总的系统在整体上处于一种不稳定（或亚稳定）的状态之中。一个伟大的、灿烂的古代文明，仿佛一个即将出世的胎儿在腹中操动，一系列伟大进步的链条开始启动了。

我们以上的分析，大概很容易被认为我们是在重弹埃及统一社会的出现，乃是适应“大规模人工

* 一个例子是埃及这一名称的来历。有一种说法，古埃及人称河神为哈辟（Hapi），后演变为埃及。（摩勒《尼罗河与埃及之文明》上海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第17—18页）希罗多德也讲过一个有关埃及统一意识的故事：古时，住在埃及与利比亚接壤的两个城市玛列阿和阿庇斯的市民，认为自己是利比人而不是埃及人，不必受埃及那种不许吃牛肉的宗教贡例，于是他们派人到阿蒙神庙向神请示。但神拒绝了他们，神回答说，全部埃及是尼罗河泛滥和淤泥的一块土地，而全部埃及人就是住在埃烈旁提涅（即厄勒蕃丁）的下方并饮用尼罗河水的那个民族。（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83页。）

灌溉事业的客观要求”这一众所周知的观点。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许多国内外的学者都强调过这样一种直线性因果关系：灌溉的需要——>管理者的官僚主义——>专制统治。他们用此来解释古代埃及国家的起源①。实际上，我们前面的分析仅仅指出了由于尼罗河的特殊地理环境，使得一个个相邻的村落必然打破其天然的封闭性，不建立一种秩序，社会就无法稳定。它并不涉及组织形成过程，更不意味着建立什么样形态的国家的问题。原则上，结束这种混乱，只要一个地域性的组织完全可以做到。正如1976年美国K·巴塞尔在《埃及的早期水力文明》一书中所指出，埃及所需要的灌溉工程从未象两河流域或中国那样的广泛和复杂，主要是引进在年年泛滥影响均匀的池塘水注周围。“埃及的水利的网状组织是地方化，不象美索不达米亚那样杂乱无章的线状事务；因此任何行政上的灌溉的支流必定局限于一个小的地理范围。这个事实无疑地帮助了诺姆的起源的说明。”② 确实，埃及文明兴起的初期，恰恰是形成了一个个地方性的城市国家——

①②刘文鹏：《古埃及的早期国家及其统一》，载《世界历史》杂志1986年第2期。

诺姆。*关于诺姆的性质，学术界至今仍有争论。**但一般承认它兴起于涅加达文化Ⅱ时期（约公元前3,500——3,100年）。因此，仅仅指出灌溉和管理的需要并不能导出古埃及统一文明形成的具体过程。为了说明古埃及国家组织形成，必须分析研究系统是怎样从混乱走向有序，一个个组织单元怎样形成某种大组织的。现代组织理论似乎提供了很有用的模型，这就是自组织过程。

1-6 构想自组织机制

自组织理论认为：当那些构成组织的基本细胞（单元）自身封闭性被打破，各个细胞之间发生相互作用，这些作用又使各个单元处于不稳定状态，它就为自组织过程准备了第一个条件。生命起源以前的原始海洋中的有机物浓汤，制造晶体的过饱和溶液，大质量恒星形成前的气态云都属于这种状

*诺姆（nomos）一译"州"，古希腊人对古埃及各区域的称呼，埃及人自称为塞普（zept），公元前3500年左右，埃及约有40个诺姆。

**一说是早期的以城市为中心的若干村庄组成的独立国家。一说是独立的村社。

态。自组织过程的第二个要求是必须先出现一个组织核心。第三，已形成的组织和组织过程要互相反馈，构成一个互为因果的循环链。① 一旦上面三个条件具备，组织过程就会自动发生。

举一个具体例子可使我们对自组织机制获得清晰的理解。一些科学家认为，大质量恒星起源于宇宙空间一块均匀、静态的气体云。只要气体云受到某种扰动，使一个球状小区域变得比它周围的气体略为稠密。这一小区域内的引力场变得稍强。这时，它把更多的物质吸收过来，因而它的引力进一步增加，以致于采集到更多的物质，直到这个小区域的气体最终结合成一个天体为止。在这个颇为典型的自组织过程中，② 最早出现的一个物质密集小区间就是组织核心。一旦组织过程和已形成的组织之间构成一个正反馈的增长链，组织越大，吸引力越大，组织形成得就越快。因此，一旦自组织三个前提满足，雪崩一般的自组织过程就必然发生。

我们可以用这个比喻来分析一下史前社会，在这里，尽管对象不同，但机制是类似的。气体云是

①金观涛、华国凡：《控制论和科学方法论》，科普出版社1988年版，第115页。

②金观涛：《逻辑悖论与自组织系统》，载《自然辩论法通讯》1985年第2期。

自组织过程发生之前的状态。这时气体分子之间的引力是存在的，但它们尚未发生吸引，整个系统处于亚稳状态。过饱和溶液大约和形成社会之前但封闭性已打破的原始村落更为相象。过饱和溶液中的物质分子已经稠密到这个程度，它们之间碰撞的机会大大增加，平均距离的缩小使得它们之间的吸引已经可能大于热运动的排斥。在文明兴起的机制上，无论是统一政治组织的扩大，还是意识形态的统一都是一条正反馈的自我增长链。一种宗教一旦被更多的人接受，在同一心理背景下，它传播也就越快，结果信仰这一宗教的人也就越多。对于政治势力范围的扩充也是这样

自组织过程三个阶段所经过的时间是不相同的。最慢的是组织单元形成亚稳定或不稳定系统阶段。相比之下，第二、第三阶段相当快。在文明起源过程中，原始村落封闭性的打破比形或国家组织所需要的时间更长。这就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古埃及狩猎采集部落向农耕定居的转化发生在大约20,000年以前，但直到公元前4,000年前左右才进入文明社会。

自组织过程给我们第二个富有启发性的结论是，为什么上下埃及几乎在很短的时间内同时形成

很多诺姆。我们知道在一个即将进行自组织的系统中，究竟形成几个组织往往取决于一开始出现几个核心。每一个核心都是一个晶种，围绕着它，自组织机制迅速促成一个组织的形成。一般说来核心总是多个的。关于核心形成理论，是自组织机制最令人感兴趣的部分。表面上看，核心出现似乎是第一推动。人们总是困惑于这样的问题：第一个小组织核心是哪里来的？它为什么有许多个？实际上，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自组织过程好象多米诺骨牌的倒塌，核心等于第一块骨牌倒下。核心是相当小而且可以是原始的，所以外界影响和系统随机涨落都会对形成核心起作用。① 正因为微小影响都可以成为核心，那么，一般自组织系统总是同时出现多个核心。而且核心常常因组织过程互相影响而造成。就拿大质量恒星形成而言，最近哈佛大学天文台和史密森天体物理观察所的两位天文学家提出了一种核心形成机制。他们提出一个数学模型，当某一块宇宙气体云形成恒星时，只要新星在自组织过程中膨胀过度达到每秒5到10公里，这种速度快得可以产

①关于耗散结构理论对涨落作用的分析，可参见湛垦华、沈小峰等编：《普利高津与耗散结构理论》，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7月版。

生一种引力波，传到宇宙空间去，冲击波进入另一块分子云时，就在其后面带走一层物质。在几百万年后，冲击波前后面的这些物质所达到的密度高到足以导致引力不稳定状态。在新的引力不稳定区又使气体在这里凝聚成新的恒星中心。这个模型表明，一个自组织过程或许会激发另一个地区的自组织。① 因此，恒星往往是成团成团相继出现的。公元前4,000年在肥沃的尼罗河河谷绿洲上兴起的一个个诺姆组织，正如那冷漠的宇宙空间爆发出的新星。用恒星成群形成的激发机制来类比诺姆群体在互相影响下形成，也许这是我们想象力过于丰富了。有关这个自组织过程的具体细节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来说明。但是从整个系统自组织条件上来看，一个诺姆出现很可能激发其它地区形成诺姆社会组织。

自组织理论还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埃及文明兴起之初，上埃及的诺姆力量总是大于下埃及。虽然从经济条件上讲，处于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下埃及经济环境可能比上埃及更为优越雄厚。埃及历史也证明这一点，在统一后，下埃及比上埃及发达。但是在文明兴起的初期，却不是这样。原因可能在于

① 《科学美国人》1979年第6期，第54—56页

上埃及比下埃及处于河谷更为狭窄的地带。因此，自组织条件比下埃及更早具备，诺姆的团聚力也更为强大。总之，自组织理论似乎给我们提供了一架高倍数的时间望远镜，使我们能够透过遥远的时代，观察文明的帷幕是怎样徐徐拉开的。

1-7 地理决定论还是系统演化？

我们在讨论古埃及文明起源时，谈到非洲两万年来气候的异常变迁，谈到尼罗河不同于一般河流的那种奇特的组织作用。这一切很容易给人一个错误印象，似乎我们主张地理决定论。

用自组织机制来探讨文明的起源和地理决定论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出发点上都迥然不同。地理决定论主张地理环境是早期文明形成的决定性原因。它认为文明形态和地理环境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而自组织机制则是从系统演化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地理环境只是这种过程展开的历史舞台，它是通过文明系统演化的内部因果链对整个过程发挥作用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先宏观地分析一下原始

社会演化的可能机制。每一个社会组织必定和自然界处于密切的相互作用之中，形成一个稳态系统。五万年以前，地球上存在着许许多多处于石器时代的原始氏族部落组织（我们简称为原始小社会组织）。它们每一个都和环境耦合得很好，它们对环境的适应，使得环境和这些小社会组织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处于稳定状态。但稳态迟早要被破坏*，虽然这个过程进行得极为缓慢。造成不稳定的原因大约是多方面的。某一地区的生态系统不足以养活那么多狩猎采集人口，部落氏族组织和不断增加的人口及其活动规模不适应等等，都是无组织力量增长的形式。这种不稳定状态通常可以用简单办法来解决。比如原始小社会的分裂，或者迁移到其它地区去，并在内部采取限制人口增长的措施。分裂和迁移之后，无组织力量得以清除，原始小社会与环境的耦合又处于稳定的适应状态。如果地理环境允许原始小社会能用这种办法一次一次地克服无组织力量的增长带来的不稳定，那么这种狩猎、采集的生活也许会无止境地延续。很可能这就

* 我们可以把这种破坏稳定性的过程归为由于互相作用而带来的无组织力量的增长，对于原始社会，无组织力量增长得最快的很可能是这些小社会所处的环境，有关这一点的分析可见《兴盛与危机》第9.8节（金观涛、刘青峰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是至今我们还能看到处于原始状态的小社会的原因。

今天人类学家对原始部落的研究证明了这种机制的存在。著名的非洲史研究者巴兹尔·戴维逊说："那里（非洲）的土地是这样的辽阔，并不发生要求在某个地方生产剩余食品的情况。古代的氏族在捕完当地的野生动物以后，就迁移到其他地方去。即便到了后来，（对于那些农耕村落）当农业和金属时代的技术使某一地区的人口密度超过当地土地供应能力时，情况也是这样：部落分支脱离原来的部落，迁移到新的地区去。"① 他还非常清晰明确地指出"这种迁徙的过程肯定是不鼓励社会由一种形态发展到另一种形式的。"② 近年来对处于狩猎采集状态的科伊桑人的研究，使我们对这一机制获得更进一步的了解。无论从科伊桑人所处的环境还是他们内部实行的制度都十分有利于及时消除不断积累起来的原始小社会与环境之间的无组织力量，使他们能通过一次次简单的调节重新获得小社会与自然环境的稳定。

这些小社会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如果妇女生

①②巴尔·戴维逊：《古老非洲的再发现》，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36页、38页。

育过多，婴儿产后便被溺杀。他们几乎保持在平均大约几百平方公里才有一人的人口密度。萨恩人总数在任何时候也没有超过4.5万人。这个数目是和当地生态环境密切保持平衡。部落不断游荡是萨恩人的另一个特点，当一个地区动、植物因狩猎和采集处于稀缺时，他们就换一个地方，让这个地方依靠自然力量重新恢复平衡。每个氏族公社不过数十人。社会组织也极为简单，没有酋长，也不需要酋长。只有所谓“守护人”，但权力极小。这种组织方式又决定了它只能容纳几十个人的规模。这样，虽然存在着许多毗邻的氏族公社，但他们老死不相往来，往往听不懂彼此的语言。①

但是，如果地理环境或者某些其它目前尚不明了的因素决定了这些原始小社会不能用这种简单的办法来克服社会与环境之间不断增长的无组织力量时，那么将会出现什么呢？一种可能是这些原始小社会正如不适应环境的古代生物那样不得不灭亡。另一种可能是他们走上一条全新的道路。我们前面所讲的两万年以前在尼罗河河谷定居的原始村落就

①郑家馨：《论十九世纪以前的南非的社会经济结构》，载《非洲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6月版，第49页。

属于这后一种情况。他们在狭长的尼罗河河谷定居下来，变为原始农耕村落。然而这种转变也只能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和自然环境的适应性。随着人口繁殖，一个个毗邻的村落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尼罗河水周期性泛滥的波涛，一次次地冲击着那古老的制度，迫使人们不得不互相交往。它使整个系统就犹如孕育着第一次生命的原始海洋，自组织的条件在这里最早具备了。综合分析这一个系统演化树（图1.5），我们可以看到，特殊的地理环境的作用只是系统演化机制的组成部分，它们所起的作用原则上都是社会的。这就是：促进产生足够多的密集定居的小社会，并打破它们的稳定性、封闭性，为大的社会组织提供通讯渠道，以及最后对形成大社会形态进行选择。

根据这种分析，自然可以推想，只要地理因素所起的功能用其他因素来实现，那么并不一定需要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也并不一定需要在大河流域，同样能形成古代文明。在沿海地区，通讯联系渠道可以由海上航行提供，每个自然村落封闭性的打破往往来自于生产的发展，商品交换的出现等因素。众所周知，城邦文明的兴起也许就属于这一类型。它有着同样的自组织机制，无非是在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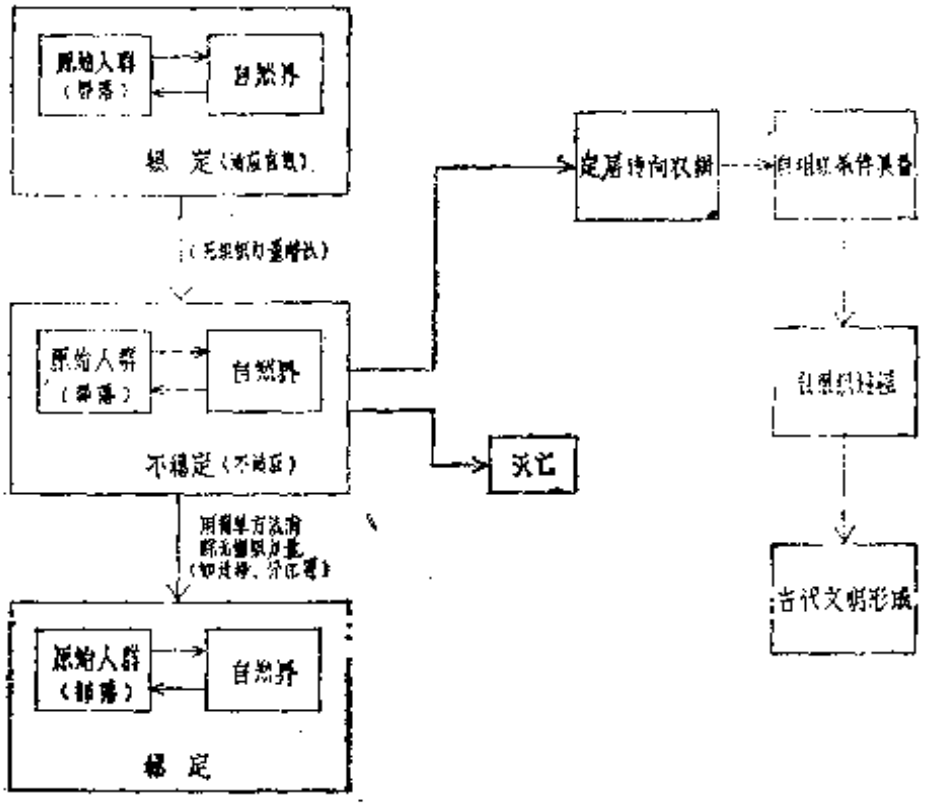


图1.5 文明起源的机制

的地理环境舞台上展开罢了。当然，由于实现自组织条件的方式不同，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系统演化规律表明，即使同样处于大河流域，也不一定会形成同样形态的古代文明。如果河流地区并不是象尼罗河那样被不可逾越的沙漠所包围，那么自组织具体过程就会与尼罗河河谷地带有所不同。即使最初文明起源之际，由于河水泛滥，共同灌溉的需要在这里建立了类似于尼罗河河谷地带那

样的古代社会雏型；但随着文明的发展，必然扩张到大河流域以外的更为辽阔的地区，这样河流的制约因素将不复存在。文明中的人类已经组织起来，他们可以自己开辟通讯渠道，可以改变自己的组织形态，甚至于也可能发展出一些类似于城邦文明的形态。这些例子在世界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因而，只有把地理因素放到整个系统演化机制中去，考察它的作用，我们才能真正揭开文明兴起之谜。

一些历史学家把地理比作历史的左眼和右眼，文明的太阳和月亮，把地理称为“是历史的哺育之母和教养之家。”① 如果把这种见解理解成地理因素决定论，那就错了。但把它看作文明在儿童时代成长的基地，社会自组织过程展开的自然背景，那么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儿童在成长着，文明越是发展，她改造环境的力量也越强大。起初人类社会不得不依靠天然的自然条件为他提供通讯渠道，陌生而无知的人群不得不依赖于气候、环境的意外的变化来加速自己的聚合。文明一经诞生后，人开始从摇篮中走下来，他们自觉地依赖于社会组织。他们可以改变大地的面貌，创造交往的方式和工具，

①杜兰：《世界文明史》，台湾台北市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出版。第6页。

地理这一摇篮将随着人类文明的成长一天天退出历史的舞台。可以说，一旦伟大的古代文明兴起并走向繁荣，文明的发展和型态则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它内部的结构了。古埃及社会正是这样。当诺姆在尼罗河河谷地带兴起后，在这些城市国家进一步合并成大组织，最后形成统一的帝国的过程中，诺姆本身的结构所起的作用也许比地理环境还要重要。如果诺姆本身政治上没有扩张性，人们不把征战当作一种光荣，把征服和掠夺当作一种经济需要；那么很可能埃及文明是由一个个城市国家组成的。总之，在这里，文明本身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诸因素和地理一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将古埃及社会和撒哈拉沙漠另一边那些热带丛林中至今仍处于原始狩猎采集状态的部落作一下比较，会使我们感叹不已。他们的祖先也许都来自于两万年前在非洲大陆上游荡的人群，当那次历史性的大干旱来临的时候，往哪一个方向去寻找新的栖身地也许纯属偶然。然而这一次选择却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一些人被迫迁到尼罗河河谷地带，不得不开始创造，而另一些人至今还是顽固地保持着远古时的面貌。就其命运而言，这也许无所谓公平还是不公平。那些原始人虽然更多地依赖于地理环境。他

们却处于一种“既不知欢乐也不知痛苦”的睡梦之中。而对于文明的创造者，他们不得不去攀登文明进步的巅峰。他们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但同时也必须承受社会的压迫，忍受理想破灭那难言的痛苦。文明的历程一经开始，就不会停下来。文明打开潘多拉之盒，它给人类带来的未来比他们几百万年来所经历的一切都更为惊心动魄。每个人都注定要被织进那张无法摆脱的社会大网中，与文明的结构同舟共济。

第二章

古埃及社会结构

人的一切行为都可以分为三类：创造、调节和破坏。当创造一旦完成，重要的就是调节。它使已经燃起的生命之火不至于被虚无吞没。

——作　者

2-1 古代文明的物化外壳

一位作家曾用一窝蜜蜂的兴衰来比喻社会的繁荣和衰退。蜜蜂社会是很有趣的，因为它有一个物化的外壳，这就是蜂房。公元前3,000年前后，统一的埃及王朝在自组织机制长期作用下诞生了。它是一个由复杂的经济、政治、文化关系组成的大厦，但是如果我们从天空上鸟瞰整个古埃及社会，就会发现它也存在着类似于蜂房那样物化的外壳。其中令人注目的就是布满全国的人工灌溉系统。古

代埃及人用象形文字“𤰞”来表示她的“地域”性组织，特别是那些“在城市或农村周围聚集起来的地域公社。”① 这个符号即源于那些纵横交错的灌溉河渠。*古代埃及的社会依赖于这些河渠，正如蜜蜂离不开蜂房。要剖析古代埃及社会结构，也必须从解剖这个特殊的物化外壳开始。

任何一个文明社会，如果它要生存下去，一个首要条件就是社会组织要为每一个成员提供必需的生活资料。在古埃及，它直接取决于灌溉系统是否存在。这些河渠不仅影响每个人生活的好坏，而且可以决定社会的存亡。为什么灌溉系统是这样重要呢？因为古埃及一旦形成了一个人口众多的统一社会，它对尼罗河的依赖必定会达到一种近乎苛刻的程度。

在尼罗河第一瀑布处（今阿斯旺附近，古希腊人称为埃烈芳提那〔又译为厄勒蕃丁〕的一个尼罗河河道中的小岛上）有一古老的石碑，上面的刻度形象地表明尼罗河水的上涨高度与全国的经济状况的关系。（见图表2-1）从这张表中我们可以发

①刘文鹏：《古代埃及的早期国家及其统一》，《世界历史》1985年第2期。

*与中国古时的“井”字类似。

表2-1① 尼罗河水位与埃及经济的关系

尼罗河水位高度	埃及经济状况
21呎	上埃及普通凶年
22—23呎	上埃及大部分地区是旱灾
24—25呎	恰到好处
26—26.5呎	全埃及陷于一片汪洋
27—28呎	下埃及洪水之灾
28呎以上	尼罗河变为吞噬埃及人民的猛兽

现，为了保持全埃及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上涨的水位须得保持在24—25呎这个十分精确的范围之内。而在这以上或以下都意味着灾难！每年河水泛滥的大小，都与埃及社会的繁荣息息相关。古埃及人对尼罗河水位极为关注，他们很早就通过测量每年尼罗河水泛滥的大小来预测这一年粮食的产量。至少从早期王朝起（公元前3,100年），古埃及的政府就开始每年记录尼罗河水泛滥的高度。著名的《帕勒摩石碑》铭刻*就是例证。古埃及人还设计

①见冯祚民编著：《西洋全史》第二卷，台湾台北康京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7月版，第18页。

*埃及最古的纪年石刻，今只残存部分片断，藏于意大利西西里巴勒摩博物馆，载录了前三朝至第五王朝的埃及历史。可见，《世界古代史史料选辑》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1959年版，第1页。

了专门的测定计，用以测量河水的上升。他们在现在的开罗附近安设了一个，在第一瀑布正下方也安设了一个。埃及的疆域扩展以后，他们又在往南较远的地方设置了一个。① 当然，除了记录水位、对产量和灾情进行预测以外，最好是用社会的力量来改造自然。要做到这一点，大约唯一的办法是让整个社会生活在一个复杂庞大但可以调节的水利系统之中。

在古代埃及的历史上，每当一个统一王朝兴起之时，总要看到重新丈量分配土地和修筑那些灌溉水渠。今天发现的古埃及的文物“蝎王权标头”上，画着一个高大的蝎王——国王站在河岸上，手持一柄木锄，他前边一个人半躬着身子，双手拿着一个畚箕，就反映了国王在为挖渠举行奠基仪式。中王国的第十二王朝的创建者——国王阿门涅姆斯（旧译阿门内哈特）的目标则更为宏大，他决心兴建一个可以调节水位的人造水库，这就是著名的法尤姆湖人造工程。法尤姆湖位于尼罗河西面的法尤姆绿洲中最低的地方（今埃及境内法尤姆省的法尤姆洼地，最低处现叫加龙湖，低于海面45米）。史

①莱昂内尔·卡森：《古代埃及》，纽约时代公司1979年中文版，第31页。

前这是一个淡水湖。它曾与尼罗河相连，干旱出现后，湖与尼罗河的联系被掐断。只有在尼罗河水位上升得很高时，河水才能流入这个湖泊中。在古王国时期，有一次河水暴涨到18米以上，泛滥的河水就流到湖里去。① 河水下降时，水就往回流。这一现象启发了古埃及人利用这一洼地来调节尼罗河的水位。十二王朝的第一位法老阿门涅姆斯一世在位期间（公元前1991—公元前1962年），建立这样一个调节系统的艰巨工程开始了。他们修筑了一些特别的水闸和水堤，同时修建一条大型水渠把法尤姆洼地与尼罗河相连接。这样，每当尼罗河泛滥季节，河水顺着水渠流入了水库。而当尼罗河河水不足时，可以将水库的水放出来。这一巨大的工程能对大片农业区进行灌溉。因此，在这里成长起了一个新兴的大城市②。

希罗多德曾经非常形象地描绘过由于这些纵横交错的渠道的修建，尼罗河三角洲地貌发生的巨大变化。他说．“在以前埃及是一个适于马和马车行走的地区，但从此以后，它变得对二者都完全不适

①阿·尼·格拉德舍夫斯基：《古代东方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34—185页。

②阿甫基耶夫：《古代东方史》，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86—287页。

应了。虽然这时它的全境是一片平原，现在它却不适于马车行走，因为它的全境布满了极多的，向四面八方流的河渠。国王这样做的目的是把尼罗河水供应给内地不是临河的城市的居民。因为在先前，河水退下去以后，他们不得不饮用从井里吸取的发咸的水”。①系统的水利工程的建立改变了尼罗河谷的天然环境，它使整个社会生活在一个人造水利调节系统中，并使得这个地区一年之内可以收获两次。农业亩产量也大大增加了。

从古王国到中王国这近两千年时间中，埃及一直处于金石并用时代。铁器是新王国以后才普遍使用的。古代埃及人世世代代用木锄、木犁进行耕作。照例说来，生产水平应该是十分低下的。但由于建立了这一特殊的灌溉系统，埃及成为最早的世界粮仓。《圣经》中记载着，尼罗河流域四周的民族发生了可怕的天灾时，他们就派人到埃及去筹粮②。那时埃及的生产水平远远地高于同一时期的世界其它地区。甚至高于那些已经使用铁器的民族。古埃及小麦亩产量就证明了这一点。

有关古埃及的亩产量的直接资料至今未有发

①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21页。
②《圣经·创世纪》。

现。但我们可以根据希腊化时代埃及（公元前332—30年）的亩产量来进行推算。当时埃及每一阿鲁尔地，在一般年景约可收获10—12阿勒塔巴小麦①，同一时期的中国西汉王朝，虽然已广泛使用了铁犁牛耕，并且是在精耕细种的条件下，亩产亦不过70—115升②。当然，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时期亩产量比托勒密王朝时要低，但据考证，亩产相差并不悬殊。可见古埃及的生产水平还是相当高的。

一些人看到古代埃及人用木锄、木犁就能获得这么高的产量，不由感叹道："他们比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都易于不费什么劳力而取得大地的果实。"如果仅仅着眼于农夫耕作，确实如此。但这种评价并不正确。埃及人的收获主要是借助于灌溉系统，而建设维修这一人造环境却是十分艰巨的。苏联一位学者曾估计修建这类庞大水利工程的工作量。他举例说：十九世纪中叶疏浚长约100俄里、宽15.24米、深约2米的运河河床，就需要有3.1万农民同时工作。而对于埃及，这一工程每三

①一阿鲁尔（又叫斯塔特）约等于四亩；一阿勒塔巴等于39.3升。当时一般亩产量约98.25—118升。见久梅涅夫《近东和古典社会》载《史学译丛》1958年第4期。

②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合编：《中国古代经济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6—67页。

年必须重作一次。只要这些工程稍一放松，那么最肥沃的土地就变成了沼泽地或被沙土所掩盖。①毫无疑问，这么大工程的组织工作让尼罗河河畔的任何一个诺姆单独承担，是无法完成的。它需要一个统一的，能够在一时间调动起千军万马的国家政权来组织。在古代埃及，这一组织工作正是通过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来完成的。

我们可以描绘一下这种大工程实施的情景：数以万计的书吏*要登记每一个村社的每家每户，以便根据法令从每家抽出一个壮年丁男。那些有技术的手工工匠则另编成一队。这样一支大军从全国各地集聚到施工地点。国家要为这支大军准备原材料和给养。还得经常把大量战俘投入这类工程之中，并派出一支为数不小的监工队伍来管理这支劳动大军。为了完成这一工程，各级官吏把相应的文件送达到每一个诺姆的各个角落。一切组织的指令都由朝廷颁布，朝廷的指令则来自于那至高无上的人间君主——法老。

整个古代埃及的历史证明，只要埃及一统天下

①久梅涅夫：《近东和古典社会》，载《史学译丛》1953年第3期。

*古奈及国家基层各级官吏的总称。

的局面遭到破坏，陷入分裂动荡的状态，就不可能具有这种组织能力。统一的灌溉系统没有人维持，就变成一段段的地方性河渠。全国的经济遂告瓦解，生产力迅速地萎缩，退回到统一前的水平。拿破仑在埃及曾说过："埃及政治与人民福利，关系至深。政治清明，则沟渠治，水利溥；政治腐败，则沟渠塞，堤防破，灾害至"。①马克思也曾精辟地指出："在埃及丰收是取决于好的或者坏的政府，犹如欧洲丰收取决于好的或坏的天气一样。"②

2-2 "灌溉系统"、"东方专制"以及"社会结构调节原理"

古埃及统一的灌溉系统，使人们产生一种印象：埃及的庞大官僚机构、法老的专制统治正是出于统一灌溉的经济需要而产生的。无论是坚持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学者还是主张大河流域的灌

①摩勒：《尼罗河与埃及文明》，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第20页。

②转引自阿·尼·格拉德舍夫斯基：《古代东方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135页。

溉需要导致东方专制官僚社会的历史学家，大概都从这里获得过灵感。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分析在逻辑上是不严格的。它只证明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国家组织是建设全国性灌溉系统的前提，而不能把“灌溉的需要”看作形成统一国家和官僚机构的终极原因。马克思虽然一再强调灌溉系统在这些古老文明中的重要地位，但是他讲的只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和灌溉系统的关系。马克思曾指出：“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者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以及其他国家，都是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①“从撒哈拉起横贯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直到亚洲高原最高地区，人工灌溉在这里是农业的第一个条件，而这不是公社和省的事，就是中央政府的事。东方的政府总有三个部门：财政（掠夺国内）、军政（掠夺国内和国外）和公共工程（管理再生产）。”②很明显，这里讲的只是两者的互相依存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

那么，为什么不能把“灌溉的需要”当作出现“东方专制官僚主义”政治结构的终极原因呢？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75—76页。

历史事实看，古埃及社会全国性灌溉工程的修建都是在统一国家形成以后，特别是依赖于官僚组织的完善。2.1节讲的法尤姆人造水库是在中王国时期修建的，那正是古埃及王朝鼎盛之际。从逻辑上讲，建设庞大的人造工程，首先需要强大的组织力量作为前提。这种组织力量只有统一的专制官僚政府才能提供。

那么能不能把建立统一的灌溉系统看作一种历史的“目的”性，看作一种社会的“需求”，而“官僚政治结构”正是在这种“需求”的促进之下形成的呢？这种分析是很多人常用的。他们认为，“没有这些灌溉系统，将出现全国性的灾荒，粮食的收成将大大减少，近百万人口都会陷于饥饿的境地等等……。因此，虽然官僚专制政体的建立意味着每一个公民失去自由，甚至沦为国家的奴隶，但为了社会的生存，这是一种‘历史的目的’。”然而，我们一旦将这种“需求”分析的思路贯彻到底，立即会碰到因果循环。这种分析正是以统一社会，特别是全国性官僚专制政体建立以后的社会条件为前提的！

在统一王朝建立以前，尼罗河谷地带根本没有这么多人口，根本不存在对粮食这样大的需求，对

灌溉的依赖从来没有到达如此紧迫的程度。埃及成为一个统一国家时，约有38个诺姆（州）。在古埃及文明刚刚兴起之时的前王朝时期（公元前3,500—3,100年左右），一个诺姆大约有几千人，也有的诺姆有5,000—10,000人口。如在上埃及的希拉康坡里处发现一个古代诺姆的遗址。根据考证，在古代，这原是一个中心城市（它是当时整个尼罗河流域的最大的两个城市之一①），周围是农村，面积大约50,800平方米，人口约为4,700人，至多10,000人②。因此，统一王朝建立以前埃及的人口是不多的，至多到达10万人数量级。为了养活这些人口，大约只要利用尼罗河的天然泛滥就可以了。每年河水泛滥后，土地进行了自行的灌溉施肥过程。希罗多德曾记载了他亲眼见到的古代埃及农民的生产过程。“他们要取得收获，并不需要用锄头锄地，不需要用耨掘地，也不需要做其他人所必需做的工作。那里的农夫只需要等河水自行泛滥出来，然后每个人把种子撒在自己的土地上，叫猪上去踏进这些种子，此后便只是等待收获了。他

①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58—59页。

②《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2页。

们是用猪来打谷的，然后把粮食收入谷仓。”①确实，如果在尼罗河谷上只居住着人数不多的原始农耕村落，靠这样一种维持生计的方法是十分简单的。我们在1.5节引证过，埃及所需要的灌溉是完全可以通过修建地方性的水渠来实现的。它也完全可以通过诺姆来管理。无非是地方性水利系统达不到对尼罗河泛滥那么强有力的干预，不能保证远离河流的每一寸土地都能得到充分灌溉罢了。而对灌溉的这种要求是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才出现的。

实际上，整个经济生活对全国性灌溉系统的依赖恰恰是埃及统一专制王朝建立以后的事情。从人口方面讲，到了古王国早期阶段，整个尼罗河河谷地区的人口大约增加到百万，人口的密度则达到每平方公里20人，尼罗河谷地及三角洲地区成了地球上最早的人口稠密地区。这时的非洲其他各地的人口密度还远不到每平方公里一人②。到了新王国时期，古埃及人口曾达到300—700万左右。虽然由于政治动乱，瘟疫流行，异族入侵，人口时有下降，但总人口一般都保持在300—450万人左

①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81页。

②胡焕庸，张善余编著：《世界人口地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5页。

右。① 一个拥有如此众多的人口的社会，却处于十分狭窄的地域中，它的耕地仅仅限于尼罗河谷和三角洲的细长的绿洲，因而，每一块土地是否都能得到灌溉就显得分外重要。只有这时候，全国性的灌溉系统才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自然可以问，这么多的人口是怎么来的？它难道不是社会统一、安定、战乱消失的结果吗？甚至可以说，只有建立一个大一统的管理严密的社会后才能出现如此众多的人口。汤普逊曾指出："自古以来，埃及是以人口的稠密出名的；在古代，号称拥有一万八千至二万所村庄和城镇，到托勒密王朝时代，这项数字均在三万以上。"②这些城市、村镇是王朝有机组成部分，它们本身又和全国性水利系统息息相关。在这里，我们发现，所谓"社会对某种制度的需求"从来是自己创造自己。

因此，我们可以同样反过来说，这些全国性灌溉系统是顺应着全国的统一，特别是官僚专制政府

①参见胡焕庸、张善余编著：《世界人口地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5—258页。Б.И.乌尔拉尼斯主编：《世界各国人口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3—25页。

的需要而建立的。历史需求的因果关系完全可以颠倒过来。只有建立统一的社会秩序，整个社会安定数百年后才会造就出这么多的人口。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从来更为关心自己的利益。建立这些灌溉系统是为了王朝的强大，为了获得庞大的税收，以养活国家数以万计的官吏。退一步讲，即使尼罗河河谷地区人口众多，耕地缺乏，但如果没有官僚专制政体，没有庞大的非农业人口，如果农民并不需要缴纳收成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来养活这个政府和非农业人口；那么，也许古埃及社会并不需要那样依附于全国性灌溉系统了。因此，如果我们全面深入地分析灌溉系统、经济结构和专制官僚政体三者关系时，毫无例外地都可以发现这种互相说明，互为条件的因果循环（图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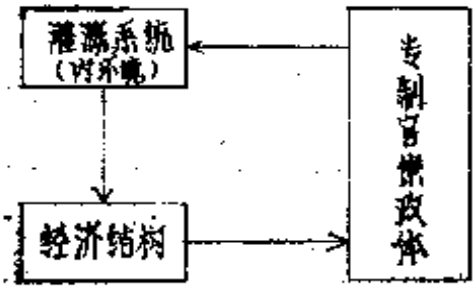


图2.1

这种互为因果、互为条件的反馈关系，近十几年来，不少学者都注意到了。普莱斯（Price）在评估韦霍高（Karl wittfogel）的“水力文明（hydraulic civilization）”学说时就这样分析过：韦霍高认为指导和管理水利工程的建设和控制，导致

“东方专制”的发展。而越来越丰富的证据则显示出，在某些地区，政治的复杂性和密集灌溉系统的发展，是在互为因果地携手并进的。她反对那种“把管理和水利工程”的需要看成为“东方专制”发展的动因的过分简单化的解释。她指出：“‘那个最先发生’的问题是……不会有结论的……，是一个虚假的问题。我们的看法是，以灌溉农业为基础的生产系统之扩张随之而来的社会复杂之间的关系，是因果系统的正面反馈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本质上是自我加强和加深的一个过程。”①在这里所谓正面反馈就是指两者的互为因果、互相依赖和互相维持。

总之，所谓历史的“需要”，其实是这样一种分析方法的产物：社会结构各个部分本来处于互相调节、互为条件的依存之中，却人为地假定在这个互为因果的整体中某一部分不存在，那么自然其它部分也不能存在下去。于是这部分无论如何也必须顺应“需要”产生出来！而我们认为，社会结构各部分间的“互相需求”仅仅是在逻辑上说明整体各

①R.Keesing：《Cultural Anthropology：a contemporay perspe ctiue》1976.by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中译本）巨流图书公司印行（上册）第185页。

部分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并不是什么哪一个先产生的终极“因果”关系。在人们发现历史需要的任何一个地方，我们毫无例外地都发现互相调节，都可以用“社会结构调节原理”对它作更深刻的说明。

《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中曾分析过这种互为因果的需求和社会结构维系演变之间的关系。书中曾经指出，社会结构可以分解为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子系统。这三个子系统是处于互相调节之中的。经济结构的功能必须恰恰是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存在的条件，反过来经济结构这种功能的存在又要求特定功能的政治结构与文化结构对它进行维系。三个子系统功能互相耦合，组成整体的社会结构。我们把它称作“社会结构调节原理”。①如果把灌溉系统归为经济结构的一部分，那么在灌溉系统和专制政体之间互相维系的因果循环恰恰是“社会结构”中各子系统功能耦合的体现。这是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在互相调节和维系中保持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具有说服力的例子（图2.2）。

这一切表明，要解剖古埃及社会结构，我们必

①金观涛、唐若昕：《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6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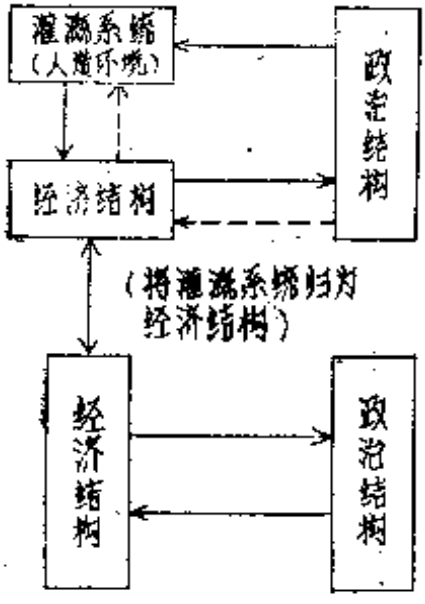


图2.2

须把分析拓展到更为广阔的方面，我们必须去研究古埃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这些子系统分别具有什么结构，研究它们是如何调节，如何耦合的。灌溉系统也好，经济结构也好，只有把它和政治、文化看作一个互相作用的整体，通过各个子系统的互相作用分析才能真正理解它们各自的形态。《在历史表象背后》和《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两本书中曾用这种方法解剖了中国封建社会、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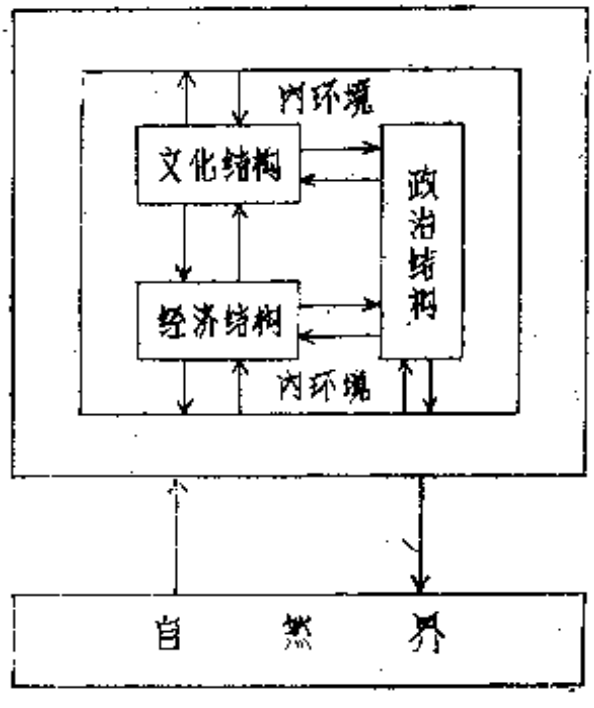


图2.3

马帝国、西欧封建社会等不同的结构。分析古埃及社会，我们也必须用同样的方法研究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子系统独特的耦合方式。

但是，必须指出，由灌溉系统等组成的内环境在古埃及具有某种特殊重要的地位，我们在剖析古埃及社会结构时有必要把它从经济结构中分离出来单独作为一个子系统。《兴盛与危机》一书曾用宏观分析方法把社会结构分成“内环境”、“政治”、“经济”、“文化”四个子系统的耦合①。（图2.3）由于古代社会中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弱小，我们在以往对其他文明作分析时，常常将这些物质文明结构（内环境）分别归入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结构之中，使分析更为简明。但在这一方面，埃及社会却正好相反，倒需要把内环境单独作为一个子系统（正如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内环境不可忽略一样），考虑它和其它三个子系统的互相调节；只有这样，分析才能清晰准确。这也是埃及特殊的自然环境决定的。在古代社会中，一般说来人类对内环境结构有着较大的选择余地。比如，当某一个地方不适于农耕，则可以选择另一些地方作为经济区。

①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而埃及却处于干旱少雨的尼罗河谷之中，它被凶险无边的沙漠包围着，人对内环境结构的选择余地很少。这是一个特殊的生态系统。任何一个统一的人口密集的大社会为了使自己在这里生存下来，就必须创造一个特定的内环境结构。社会需要这个内环境的稳定尤如寄居蟹依赖于外壳。因此，埃及统一王朝的社会结构是否能稳定存在则取决于内环境、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四个子系统能否很好适应，以及它们作为整体能否和自然界适应*（图2.3）。而解剖古埃及社会结构，则要去揭示这四个子系统怎样互相调节、互相耦合以保持各个子系统的稳定。我们认为只有坚持这个出发点，才能分析朴朔迷离的古埃及社会，理解古埃及文明兴衰的原因。下面我们先从经济结构的分析开始。

---

*物质文明结构（内环境）在什么时候可以分别归属于经济、政治、文化结构？这是一个十分复杂而有趣的问题，一般说来，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它独特的物质文明结构，但当物质文明结构（内环境）本身组织性整体性（即结构）不强，或者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对它有较大选择余地（也就是说内环境结构对其它子系统反作用不强）时，它可以分别归为其余三个子系统，这样整体分析变得更为简明。当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对内环境选择余地很小，比如古埃及、古代两河流域这样的自然条件，几乎只有唯一的内环境结构才能和它耦合。因而即使当时人类物质文明不甚发达，在分析社会结构时把它单独作为子系统独立出来则更为精确。对于西欧中世纪社会，它倒可以忽略或归并到其余三个子系统中。

2-3 “国家—诺姆”经济结构

经济结构是一张由人和人之间经济关系组成的无形大网，它比社会物化外壳更难研究，特别对古埃及，它几乎是一个巨大的迷宫。史料缺乏使历史学家只能根据纸草书和墓穴中的壁画来对它加以推断。好在埃及炎热的气候和干旱少雨的地理环境，使它保留了大量历史遗物。但是，由于年代久远，逝去的时间象一层不可穿透的帷幕把古代社会的许多重要方面遮盖起来。其闪现的部分常常离奇古怪，对此历史学家仅仅根据历史的直观是难以理解的。

历史学家碰到的第一个困难是：如何理解古埃及经济结构中那表面上几乎是自相矛盾的宏观特征。假如把统一前的诺姆看作城邦国家，那么古埃及似乎应该是奴隶制经济。无论是早期诺姆之间的交战，还是在古埃及王朝的对外战争中，古埃及确实存在着把大量战俘当作奴隶的纪录。据史料记载，上埃及曾在北部抢夺40万头牛、142万头小牲畜和12万奴隶。① 另外一些材料也记载，在镇压北部暴动

①阿·尼·格拉德舍夫斯基：《古代东方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119、120页。

时，曾把北部埃及俘虏当作奴隶的有4万7千人。① 这种记录很多，它表明当时把战俘作为奴隶的数量是为数不小的。那么古埃及是不是有和古希腊罗马类似的奴隶制经济呢？通过对分工和互相交往形态的研究，立即使持这种观点的历史学家陷于困惑。一般说来，奴隶制经济的兴起大多是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同步的，无论是古希腊罗马社会，还是其它奴隶制国家，奴隶制经济的出现除了必须经常把大量战俘作为奴隶外，还需要土地的私有制发达、商品交换繁荣等条件。古罗马经济结构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奴隶制商品经济② 但在古埃及既没有商品经济，土地私有制也不明显。

埃及王朝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一个令人注目的特点，就是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古王国时，商品基本上是物物交换。当时墓穴壁画生动地表现了集市贸易的情景。用于交换的有谷物、蔬菜、鲜鱼等食品和陶器。二千年后的新王国，以物易物仍然盛行。据考证，一直到很晚(十八王朝)社会上才出现了以买卖为职业的"商人"。③ 当商品经济真正

①阿·尼·格拉德舍夫斯基：《古代东方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116—120页。

②金观涛，唐若昕：《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23—25页。

③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448页。

繁荣之时，古埃及文明已如一支快要熄灭的蜡烛，面临即将终结的历史命运。更不可思议的是在绝大多数经济生活中，商品交换的发展和分工总是同步的，而古埃及社会商品交换很原始、但分工却很发达。

近年来，考古学家在埃及的卢克索的古特地区挖掘出一座法老时期的城市(十八王朝)。在其内部的每个部分都居住着同一专业分工的人员，如建筑师、艺术家和工役等。① 这说明古埃及的社会分工不仅社会化、行业化，而且为了方便及其它原因，每一种行业的相应人员都在某一地区集中起来了。古埃及社会有各种手工业，包括造石、冶金、造船、纸草加工业。制造木乃伊是由专门行业的人干的。还有酿酒业、专业医生（医生中还分了不同的科），甚至还有美容、整容行业。分工之细，在古代文明中大约是首屈一指的。虽然我们今天难以判断当时城市人口的比例，但汤普逊曾指出古埃及存在着数以万计的城镇，表明古埃及王朝有相当多的城市人口，可见古埃及社会从事各种非农业生产的人员是一支相当庞大的队伍。

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在古埃及经济结构中，

①1983年8月31日《光明日报》。

这些发达的分工是怎样互相协调的？我们知道，分工、奴隶制总是随着土地私有制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而发展。这是因为，不同分工之间的协调需要通过市场，奴隶制经济的发展也要通过市场。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商品经济。那么古埃及又是怎么回事？

古埃及经济结构研究第二个难点是土地制度。据现有资料，我们很难判定古埃及农民究竟是奴隶还是自耕农或村社农民。埃及的农民虽然生活在诺姆村社之中，但不象一般农村公社中自由农民那样自由，也不象自耕农对自己的小块土地拥有支配权。在原则上，古埃及每一寸土地都属于法老。古埃及农民没有迁移的权利，他们每个人都被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埃及农民要缴的田赋比一般所谓"自耕农"要高得多。税率通常保持在总收成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以上。① 新王国时，根据雷克米拉墓碑推知，税率最少为百分之二十左右。② 圣经上说，埃及税率为五分之一，但有人根据维勒布尔纸草书估计，有时农民租税高达百分之五十。这样高的剥削率已和农奴甚至隶奴相差无几，再加上

①杜兰：《世界文明史》，台湾台北市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67—68页。

②冯祚民：《西洋全史》第2卷，台湾台北市燕京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116页。

古埃及农民有着繁重的劳役，于是很多人认为古埃及农民实际上是奴隶。

但是，如果把古埃及诺姆村社中的农民看作奴隶，有一点是说不通的。这就是他们除去不能离开土地外，并没有象奴隶那样失去人身自由。当国家处于战时非常状态时，每一个农民都有义务参军。他们归村长、州长以及诺姆各级头目统领。国家把来自一个个诺姆的农民编成一支庞大的公民军*，发给他们武器。战争结束后，各级将领和军士立即解甲归田。从这一点看，埃及的农民又是自由民。因此，一些学者指出，埃及的农民是一种特殊的奴隶——国家奴隶。这里“奴隶”仅仅只指国家和个人的关系，而不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经济关系，因为不仅是农民，甚至国家官吏、贵族都是法老的奴隶。**那么为什么古埃及社会会形成这样一种奇特的自然经济结构？为什么在其它农业社会中盛行的

---

*古埃及实行雇佣兵制，但这已经是新王国的事情。在古王国以至中王国的近两千年中，古埃及一直实行一种普遍的公民兵制度（参见《大臣乌尼传》、《世界古代史资料选辑》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

**很多贵族在临死前觉得一辈子最值得夸耀的事是他从没有埃过法老的鞭笞。久梅涅夫曾指出：“在统治阶级关系上，是极端卑躬屈节，地位低下的人叩拜有权势人物之前，称自己为奴隶……这是马克思所讲的普遍奴隶制。”

土地私有制在埃及却始终发展不起来？为什么埃及处于诺姆村庄中的农民有着这样特殊的身分？

在社会结构的研究中，凡是从某一个子系统内部来寻找原因碰到困难的地方，“社会结构调节原理”都能给我们新的启示。2.2节指出，埃及的内环境结构、官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必须互相功能耦合，三个子系统处于互相调节之中才能保持各自的存在（图2.2）。任何一种官僚政体都离不开充足的税收和庞大的兵源这些必备的经济条件。《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中曾指出：一般说来，只有自耕农经济才能提供税源和兵源这些保证官僚政治稳定的经济条件。因此从社会组织功能耦合来看，建立在小农经济上的大一统官僚政治国家必须保证自耕农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自耕农经济的存在又必须依靠相应政治结构的各种调节，需要国家通过各种政策法令来防止自耕农农奴化，克服它内部各种不稳定倾向，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依赖官僚政治结构的调节职能。在中国封建社会就很典型，当新的王朝建立后，就把土地（主要是战争、动乱以后大量无主的荒地）分配给自耕农，然后对土地进行登记、造册，依靠官僚机构建立收税系统，并用种种调节手段来保持大量自耕农的存在以

维持税收。古埃及社会也是这样，官僚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一定要互相耦合，组成一个互相调节系统，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各自才能保持稳定。因而对于古埃及这样一个庞大的官僚政治社会，也必须使经济结构保持在“类似于自耕农 经 济”形 套。确实，从保持兵源，税源、稳定方面，古埃及官僚政治结构对经济结构的要求和调节和其它那些官僚专制社会类似。但是由于古埃及社会特殊 的自 然 条件，使得政治结构对经济结构的调节不得不具有某些特殊形式。

我们知道，在中国封建王朝或某些东方专制帝国，政治结构的调节只要做到限制人身依附关系，国家控制土地买卖，将土地分配给自耕 农 就可 以了。土地一旦分配、登记、造册完毕后，第二次重新登记往往要经过很多年（大多是土地兼并严重，不得不变法之际），而且并没有必要对自耕农加以严密的控制。但古埃及却不行，由于尼罗河年年泛滥，地界经常被覆盖。随着地界每覆盖一次，就必须重新登记分配一次。埃及对土地的管理任务比任何一个东方国家都繁重，挑战也更为严峻。一旦这种工作做得不好，土地的纠纷也许会酿成整个社会的动荡，国家也就失去了经济基础。因此，从埃及

建立统一的社会开始，政治结构对经济的调节、特别是在对土地的管理上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严格和发达。

希罗多德曾这样写道："（拉美西斯二世）在全体埃及居民中间把埃及的土地作了一次划分。他把同样大小的正方形的土地分配给所有的人，而要土地持有者每年向他缴纳租金，作为他的主要收入。如果河水冲跑了一个人分得的土地的任何一部分，这个人就可以到国王那里去把发生的事情报告给他，于是国王便派人前来调查并测量损失地段的面积；这样今后他的租金就要按着减少以后的土地面积来征收了。"① 这些事情说起来简单，干起来却非同小可，它需要数以万计的行政人员。

早在古王国建立时，法老为了向各州征税，就规定了每两年进行一次"清查黄金"和田地的制度。② 后来，由于制定了全国性地籍簿，为停止每隔两年的"清查田地"提供了可能。但因为牲畜数量是不断变化的，还是照例每隔二年清查一次。③ 制

①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年321页。

②见《帕勒摩石碑》、《世界古代史史料选辑》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

③阿·尼·格拉德舍夫斯基：《古代东方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22页。

定了地籍簿，并不意味着工作量有所减少，只不过不需要进行经常性全国性土地分配了。这些工作转化为地方政府常设性的工作。正因为整个税收和土地占有情况是处于一个庞大官僚机构的严密控制和监视之下的，所以土地转让和买卖在埃及比其他东方国家都困难。地籍情况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每次土地丈量都要重新核对。这样，土地占有关系在埃及就相对凝固，不太容易变动。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古埃及农民在“服兵役”“交田赋”方面非常类似于那些大一统国家经济结构中的自耕农，但是在对“土地的占有权”“支配权”“不准迁徙”方面却又类似于农奴和奴隶。对于埃及社会，是不可能形成拥有小块土地的中国式的自耕农的，土地经常需要由国家重新丈量、分配、核对。由于管理上的困难，不能允许农民离开土地。否则，管理和收税将出现混乱，国家也就失去它存在的经济基础了。管理任务空前复杂，就必须建立更为强大的官僚机构。这个机构的人数比例，甚至大到不合理的程度。因而，养活这个机构的“必要”税收也必然更多一些。而埃及可耕土地是有限的，这就造成埃及农民税率不得

不很高。这一切，使得埃及农民成为四不象：既不象奴隶，也不象自耕农、农奴和村社农民；但同时又兼有它们的某一方面特点。庞大的官僚机构只有靠这种经济制度才能维持，而这种经济制度也只有靠这种国家进行计划管理的办法才能存在。

从古王国到新王国这二千多年中，国家管理土地的方式经过几次变化，机构慢慢趋于完善。早在古王国时期，国家的管理系统和税收系统基本是合一的。当时庞大的官僚机构已经形成，但效率不高，国家不得不直接从事生产组织工作。农民几乎象“农业奴隶”一样在这个官僚机构监视之下从事生产。到中王国新王国时期，税收机构强化了，国家把土地丈量、核对交给地方政府，对农民和土地的管理主要通过地契和税收来实现。这时农民虽仍不能离开土地，但劳动过程并不需要国家行政机关的监督。到新王国后期，商品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国家对税收和土地的管理仍是很严，但管理的重点放在税收和限制土地转让上，对土地使用过程的干预有所减弱，租种别人土地的佃农开始出现。这时，古埃及农民的地位在某些方面有点接近于自耕农和佃农。虽然管理形式几经变化，但古埃及王朝的

整个经济结构一直处于政治结构的强控制之下，甚至可以说，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实现了一体化。我们把这种经济结构称为国家诺姆经济。当然，在这种国家诺姆经济结构中，除了处于官僚机构控制之下的国家耕地和农民外，还有神庙、贵族、小私有者等占有的土地。但在一个王朝兴盛时候，这部分土地不占主导地位，而且是处于国家限制之下的。*

我们一旦认识了古埃及政治结构对经济结构独特的调节方式，古埃及社会种种难以理解的现象就豁然明朗。为什么古埃及商品经济不发达，但分工很发达？为什么可以存在着众多的城市和非农业人口？不同分工是如何协调的？答案十分简单，这些协调功能是靠政治结构的调节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市场。既然古埃及整个农业生产必须由官僚机构和国家组织来管理，那么国家把这种管理方式推到其它在经济生活中不占主导地位的行业也是轻而易举的。在古代埃及，每一种行业基本上是被国家组织起来的。国家设置了大量官吏来管理经济生活。为了管理方便，政府规定各种行业必须父传子

*关于这部分土地占有制的发展在第三章中讨论，它们的增长和王朝的崩溃有关。

袭，①由国家统一下达生产任务，并发给实物作为工资。埃及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全国性神庙组织中，拥有大量书吏对生产过程进行组织，并登记分配实物。一些西方史学家根据古埃及王朝经济结构这一特点，认为古埃及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它是一个由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所管理的计划经济系统。②显然，这种说法未免言过其实，埃及的国家诺姆经济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今天人们理解的计划经济是不尽相同的。

在国家诺姆经济结构中，为了对经济生活进行严格管理，建立一级级管理机构，必须建立众多的城市。因此古埃及的城市主要是顺应政治上的需要成长起来的，它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中心，而不一定是贸易中心。每一个诺姆都有一首邑，它在政治上、宗教上的作用大于经济上的作用。由于国家控制系统已深入农村每一个经济细胞，只要一种新的行业出现，它马上就会被编织到这个管理系统的大网中去。分工可以顺应着国家计划管理发展起来。

①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28页。

②杜兰：《世界文明史》，台湾台北市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75页。

因而古埃及的分工可以很发达，非农业人口可以很多，但并不需要商品经济的基础。

利用“社会结构调节原理”不仅能帮助我们正确理解古埃及经济结构许多表面上互相对立的宏观特征，而且还能使我们揭开古埃及的“特殊身份奴隶”这一个历史之谜。

2-4 奇怪的奴隶制

本世纪五十年代前后，学者们发现古埃及社会存在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这就是特殊身份奴隶。这些人非常奇特，从身份上讲他们与自由农民不同，没有人身自由，确确实实是奴隶，而不仅是对国家意义上的奴隶。但是这些奴隶居然象农民一样拥有土地（当然土地名义上也是属于国家的）。同时，这些土地，他们可以象自由农民一样自由出卖、转让。伊·阿·司徒契夫斯基根据《维勒布尔纸草》分析指出，“奴隶与自由民乍看起来没有区别。奴隶使用地段的大小与自由农民的地段相同。奴隶地段纳税的多寡与自由民所使用的地段并无区别。在和土地的关系上，纸草中所提到的奴隶享有与其余广

大自由农民同样的使用权”，他们的土地“和自由民的地段一样，当奴隶死后，其地段可以自父亲手中保留、继承、或转让”。①

《开罗铭刻$\frac{2716}{2413}$》中的记载也证明了这些特殊身份奴隶拥有土地。这一石刻记载了一个市民谢吉斯特的女奴由于生活窘迫，要把她的土地卖给主人。女奴要求主人给她布匹，谷物及其他东西，以使她的土地不至于卖给其他人。②这一发现使历史学家震惊。它与人们头脑中的常识相悖。今天，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连人身自由都没有的人怎么能象一个自由民那样拥有土地。但如果我们运用社会结构调节原理来分析研究这一现象，疑难也就会迎刃而解。

在一个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个是土地关系，即土地耕种者是否拥有对土地的所有权(这里讲的所有权并不是名义上的，而是要看土地是否能够出卖、继承等等)。第二是人身依附关系，它表示一些人对另外一些人的人身支配权。人身依附

①②伊·阿·司徒契夫斯基：《古埃及新王国时期奴隶制度的特殊形式》，载《河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第71—76页。

关系有两种极端状态：劳动者对其他人没有人身依附和有人身依附，我们把这两种状态分别记为y_0、y_1。而劳动者对土地的占有也有两种极端状态，我们用x_0表示没有土地，x_1表示拥有土地。那么，作为经济关系（由这两种组合而成），一共有四种基本状态：x_0y_0；x_1y_0；x_0y_1；x_1y_1。我们分别用A、B、C、D（图2.4）代表这四种经济关系。A（x_0y_0）表示耕作者基本上没有土地所有权，但人身并不依附他人，这是佃农。B（x_1y_0）代表劳动者人身上既不依附他人又有耕地。他是自耕农（或者是村社的自由农民）。C（x_0y_1）是农奴。这三种经济关系可以互相转化。转化的方式既取决于经济活动，同时又和政治结构的调节有关。当政治结构调节力量强大，国家严禁人身依附关系发展时，自耕农破产就会变为佃农（B→A）。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常看到这种情况。国家调节能力一旦破坏（商品经济衰落），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不能控制，自耕农在失去土地时也可能同时失去人身自由，这时就会出现农奴化，即（B→C）、（A→C）。这种过程在西欧封建社会早期很明显。当国家强大，采取一系列控制人身依附关系措施时，这种变化可以逆转（中国南北朝后期、英国、法国中世纪末期等都发生过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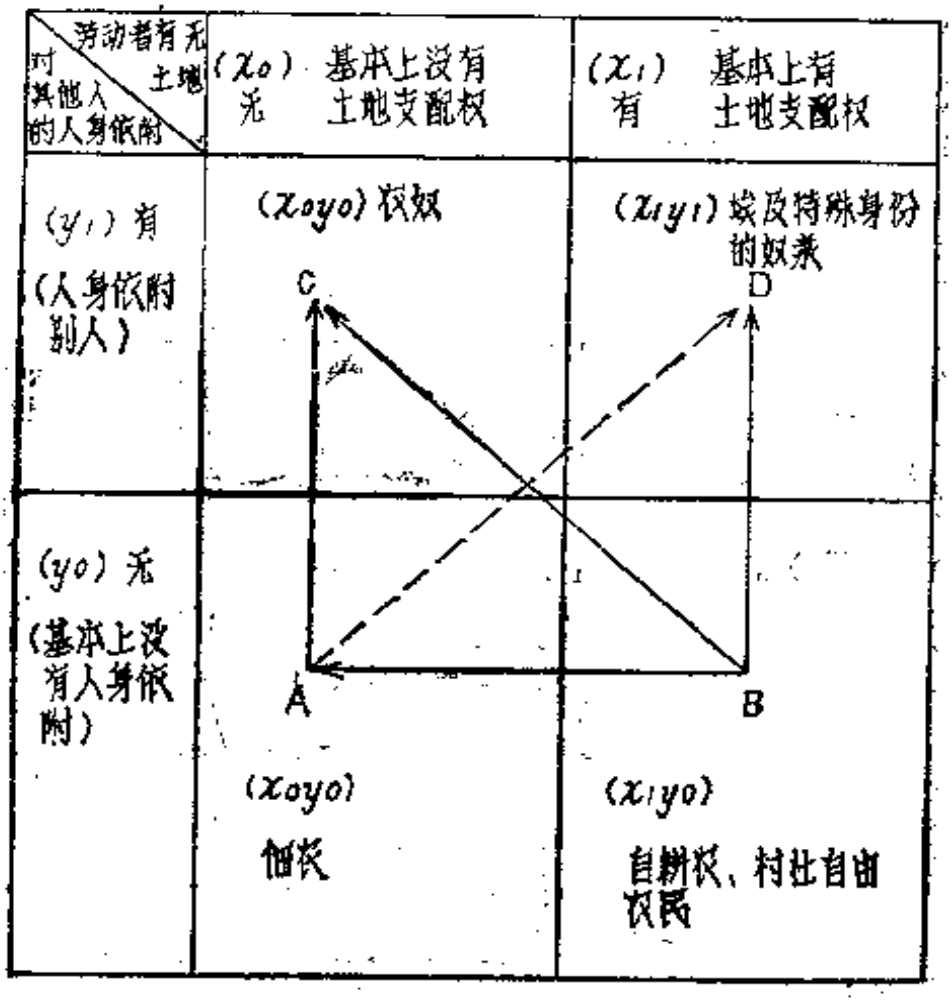


图2.4　古代社会自然经济中经济关系及其变化趋势分析

种情况）。

D一般说来是不会出现的。一个土地耕作者在穷到要卖身之前往往先卖地。不可能人身自由已失去，但身外之物仍保留着。而从上面文献提到的情况来看，埃及奴隶的身份却正好处于状态D。这些人和自由农民同样地拥有土地（当然也要向国家交租，而且土地所有权名义上也属于国家），但同时在人身上又依附于他人。分析一下埃及政治结构对经济的特殊调节作用，埃及这种奇怪的奴隶制就很容易理解。上一节谈到埃及国家诺姆经济结构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官僚政体对土地的强控制。由于尼罗河的泛滥以及耕地缺乏，古埃及王朝比任何其它文明更依赖于对土地的控制。控制的重要手段就是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不许迁移，并建立一个超级管理机构。史料证明，古埃及王朝对土地转移控制之严，是世界上罕见的。国家严禁土地买卖。在特殊情况下的土地转让必须到政府办手续，甚至要得到法老本人的许可，违者要受重罚。因此，一块土地一旦分给某一个农民耕种，那么这个人和土地的联系就处于官僚机构重重监督之下，变动很困难。

但是，即使存在着控制，任何一个经济结构内部都存在着不可抗拒的流动倾向。一些农民因经营

得好可以发财，而另一些则可能倾家荡产。通常，演变的洪流总在那些较薄弱的环节冲开控制的堤坝。在中国封建社会，土地买卖虽然也是受控制的，但国家对人身依附关系控制得比土地买卖更为严格。因而控制堤坝的被冲决导致自耕农失去土地，变为佃农。而在古埃及，由于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一体化，情况倒了过来。国家对农民依附于土地的控制强于对人身依附关系的控制。控制的相对薄弱环节是人身依附关系。农民经济地位的变化就有可能出现一种特殊情况，卖身比卖地容易。这样就会导致由B→D的转化。形成很罕见的和自耕农一样拥有土地的奴隶。当然，从图2.4可见，由B转变为D仅仅是一种渠道。C→D、A→D也是可能的。古埃及没有货币，官俸是由实物付给的。对于高级官吏，法老往往赏给他一定的土地（古王国期间一般是几百阿鲁尔），并赐于这些地免税特权（或部分免税），这些地上的自耕农的税收由官员自己支配。*收税也由官员属下的书吏自行管理。有时，法老也把战俘赐给官吏。这些战俘如被安排到田地里

*这种免税特权更多地赐给神庙的大祭司们（见阿甫基耶夫：《古代东方史》，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31—232页）。

劳动，就成为官吏的奴隶。我们可以设想，一旦这位官吏失去官位，古埃及国王作为官俸的赐地是不能世袭的。那么这些土地的收税权就归国家。但奴隶仍属于这位官吏。这时，奴隶仍耕种这块土地养活自己。但土地属于国家（象自耕农一样），这是C→D的例子。

读者或许会有一个疑问，既然土地原则上不允许买卖，那么对上面纸草书中提到的那个奴隶要卖掉土地一事又作何解释呢？必须指出的是，这是一份新王国时的文献，新王国后期商品经济开始萌芽，特别是在一个王朝末期，埃及国家控制已趋于衰落，土地买卖就控制不住了。这份文献的意义在于它刚好记录了一种特殊状态，这些人在失去土地以前很久就失去了自由身份。如果土地买卖根本不可能发生，那么我们在文献上也根本不会发现有奴隶卖掉土地的记载。古代埃及大量纸草书中经常将奴隶与自耕农相提并论。① 这种奴隶可能就具备上述特殊身份（在土地占有方面和自耕农相同）。仅仅因为他们不能卖土地，他们对土地的处置权与自耕农是大不相同的。

①见伊·阿·司徒契夫斯基：《古埃及新王国时期奴隶制度的特殊形式》，载《河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

我们这种分析有没有其它依据呢？有！这就是古埃及王朝对战俘奴隶的特殊处理方法。历史学家都熟知，古埃及还存在着另一个颇为奇怪的特点，这就是国家虽然经常得到大量战俘，但这些战俘作为奴隶，通常是不用于农业生产的。他们常常被用来开水渠，修金字塔，做家务劳动。有时，把少量战俘安排进行农业生产时，这些战俘的身份几乎和一般农民没有区别。这点很奇怪，农民是自由人，而战俘是奴隶，但是一旦安排在农业生产中时，二者居然区别甚少！第三乌尔王朝时期苏美尔档案材料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例证："在埃及，战俘一经编入'农民'之列，就象其余的依附农民一样被安顿在村落里。"①"据哈里斯大纸草书记载，在捐献给神的'头'（指奴隶，奴隶主对奴隶象畜牲一样按头计算）中有作为战利品的战俘，也有土生土长的埃及人。"② 为什么战俘很少用于农业劳动？为什么一旦战俘用于农业劳动，在土地占有制上就和农民区别不大？这一切都证明这种特殊的奴隶制是国家诺姆经济的产物。任何一种社会成份，一旦用于

①久梅涅夫：《近东和古典社会》，载《史学译丛》1958年第3期第38页。

②《哈里斯大纸草》。见林志纯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1页。

农业，就必须接受国家特殊的管理方式。它只能编织到原有的经济结构大网中去。因而，战俘是很难安插到农业中去的，一旦需要用于农业生产，那么他们对土地的关系就和一般农民类似了。区别仅在于他们人身是不自由的。

古埃及王朝不许土地和劳动者分离还造成了另一个结果，这就是地价十分便宜。表2-2给出新王国时期土地开始流动时和各种物价的对比。一头山羊居然值3阿鲁尔土地(12亩)，一个女奴隶的身价是1阿鲁尔耕地价格的20倍。只要用一块土地年产谷物的3倍，就能买到这块土地。地价实在是太贱了。处于狭窄的尼罗河河谷地区的古埃及社会，耕地面积是很有限的，因而也是一种最为稀缺的生产资料。一种十分稀缺又是最重要的资源居然那么便宜，是不符合价值规律的。这一奇怪的现象也是由于国家对土地流动的控制造成的。这些名义上由国家分给农民(或其它人员)耕种的土地是处于国家官僚机构重重监视控制之下的。它不得不转让时，总是带着沉重的枷锁。国家的法令使得很少有人能买它(除了那些有权有势者，他们能够逃过国家官吏的监视)，这些土地转到哪里，税吏就跑到哪里。税收是这样的重，一般人即使买了它们，如不能逃避税收，买

土地带来的收益就可能很有限。这一切造成耕地虽然稀缺宝贵，但价格又是特别低贱这特殊的经济现象。

表2·2　20王朝末的土地价格

1克白银＝$72\frac{1}{2}$升谷物≒每年产量$\frac{1}{6}$
1阿鲁尔耕地＝15克白银≒每年产量的3倍
1头山羊＝45克白银
1女奴隶＝182—360克白银　（20王朝末）
1女奴隶＝210克白银　（18王朝末）
从中可算出，一女奴值20阿鲁尔耕地左右
一般官僚有几百阿鲁尔土地，如“梅腾”拥有266阿鲁尔土地，伊比一次获物203阿鲁尔土地

见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454页。

“地价”与“奴隶”身价悬殊的差别则从另一个侧面进一步证实了古埃及特殊身份奴隶出现的机制。一个农民在穷困之极时，“卖身”不仅比“卖地”容易，而且得到的收益也远比卖地来得大。据表2-2，一个农民只要卖身，其价值居然等于一个官僚全部地产的十分之一左右。

2-5 神权官僚政治

古埃及的诺姆经济结构是强大的国家官僚机器对经济发挥独特调节作用的产物，反过来它又为这种官僚机器提供维系生存的必要条件。然而古埃及的官僚机器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怪兽，它总是可以得到足够的经济营养物。只是它能维持稳定的一个方面，这还不足以说明官僚机构是如何组织起来，如何克服内部分裂倾向的。古埃及官僚政治组织由一级级权力构成，每一个诺姆都是一个小小的权力核心。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很容易造成权力的地方化，使整个统一官僚政治解体。但是在古埃及王朝鼎盛之际，每一个地方诺姆都匍匐于法老权威之下，宰相指挥的中央政府牢牢地掌握着对各州官吏的控制权。要进一步理解古埃及社会结构，除了分析经济根源外，还必须从其它方面寻找这种保持统一专制官僚政府稳定的机制。

今天，历史学家在研究纸草书中记载的古埃及政府机构时，最惊奇的莫过于古埃及的官吏之多。不仅各级行政长官是官吏，还有河渠官，运输管理

官，条规记录者，掌玺官，洪水管理人，国王葡萄园管理人，王印刻写者等。甚至给国王拿扇的、拿鞋的人都是某种官吏*。这些数不清名目的官吏犹如一块块岩石，坚守在自己岗位上，共同砌成一座官僚机器金字塔。在金字塔的顶端是国王——法老。法老是整个官僚机构权力的来源。他对全国事务有着最终的制裁权，如果他有兴趣政务，那么他必须日理万机。但大多数法老都把兴趣放在打猎出巡和宴会之上，每天有一大群侍从跟着他。据说专门负责法老化妆的官员就有20位之多。每天，由理发师修面、修发，梳发师负责梳头和戴上王冠，剪指甲师负责修剪指甲，美容师前往喷香水。①

法老一般在下面设一宰相，** 代他管理政府。宰相称为“维西尔”，他是法老从王亲贵族（有时也从下层平民）中选出来的。他有几十个官衔。上至最高法院，下及各种工程、财政，都由他一人总管。他每天至少要处理30项工作，早晨他要进见法

---

*在第四王朝一座巨大陵墓中，历史学家又发现一个新的官衔，“书藏大臣”，似乎在古王国时，已有全国性图书馆了，但管书的方式，今天却不得而知。

①杜兰：《世界文明史》，台湾台北市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76—77页。

**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同时抑制相权，大约在新王国时，开始设置两个宰相分掌上、下埃及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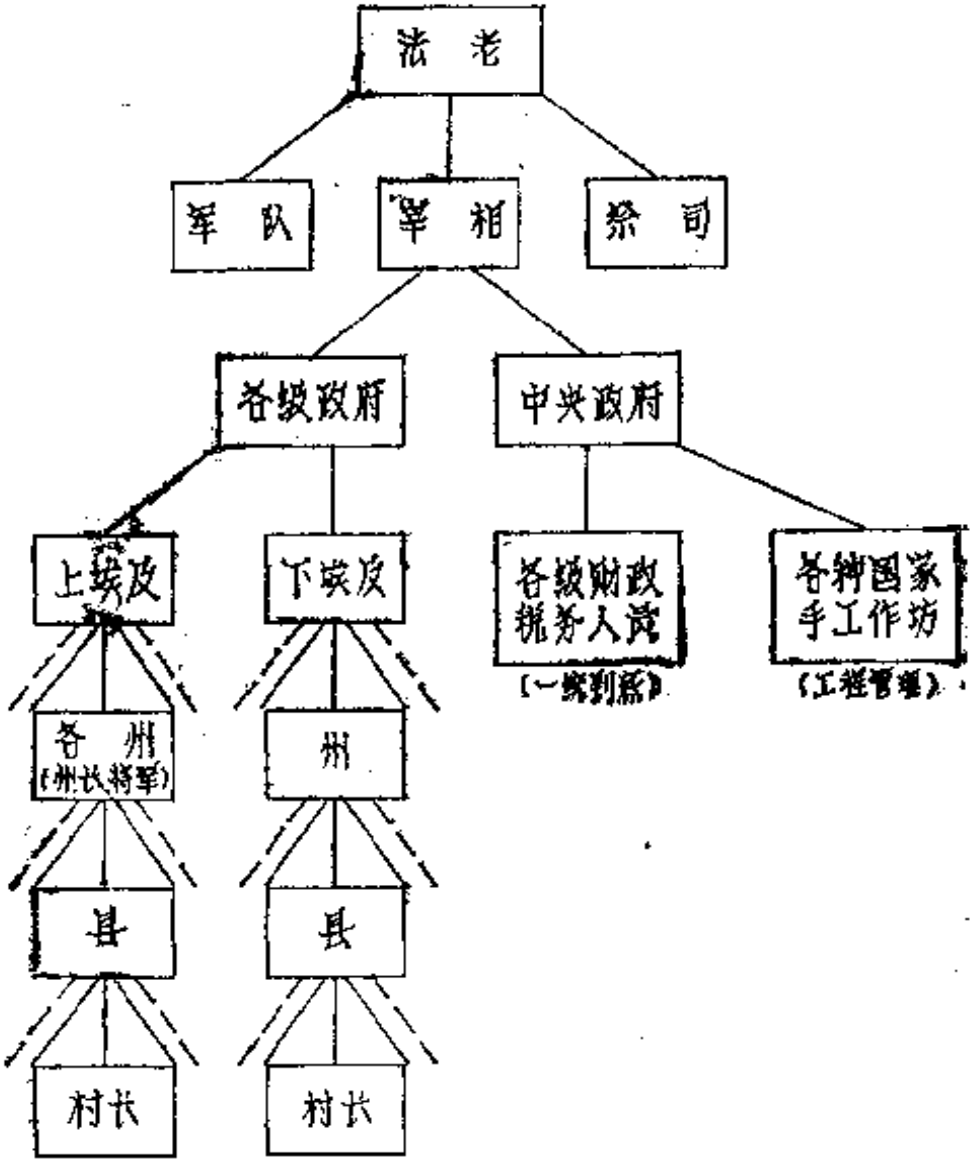


图2.5　古埃及政治结构

老，听取法老的命令，并向法老汇报前一天的工作和全国情况。① 他的权力虽大，但不能成为独裁

①莱昂内尔·卡森：《古代埃及》，纽约时代公司1979年中文版，第94页。

老，因为他只是法老的代理人。在古埃及，宰相常常是公正的化身，他的工作常常事无巨细。一座坟墓里的浮雕显示出一位宰相，清早即到民间视察疾苦，很多穷人向他申诉，浮雕上刻着“不分贵贱贫富，即来申诉均系重视”这样的词句。①

宰相之下是各级政府，通常上下埃及各设一个州长以上的“都督”之类的长官。他管理各级州长，州下面是县，县下面是村，各级均设有政府。各级政府的主要工作为两方面：查户口和收赋税。每年于尼罗河水上涨之初，根据水位高度开始预测这一年的收成，中央政府就把本年的税收数目分配给地方，再由地方政府一级级摊派下去，一直到每一个农民。税收和财务系统受地方政府领导，但由中央统一机构实行监督。整个政府系统呈现为一个分叉繁多的树状结构（图2.5）。

这个管理系统是这样复杂，层次是这样多，虽然早在古王国时代埃及就沿尼罗河建立了发达的交通和邮政系统，② 但维持这1,200公里长的河谷以及三角洲地区的统一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

①杜兰：《世界文明史》，台湾台北市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75页。

②王庸声等：《集邮基础》，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

必然会出现的问题是：如果州长闹独立性怎么办？州长是诺姆的最高行政长官。战时，把农民编为军队，他则身为这一诺姆军队的将军。古埃及各种官职，特别是重要职务基本上是世袭的。州长拥有作为他官俸的领地的收税权。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那些世袭的具有独立领地的地方长官是地头蛇，他很容易演变为割据一方的诸侯。领主和地方权贵分裂割据的事例在世界史上屡见不鲜。那么在古埃及王朝鼎盛之际，维系国家的统一，保证各级官僚机构正常运转的又是什么机制呢？

“统一”来自法老无限的权威。古埃及官员把能见到法老，伏在他脚下，吻他的脚印看作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情。① 据说一位官员有一次因能和法老说话而激动得昏了过去。② 对于埃及官员，法老的名字是不能叫出声来的，因为它据有不可抗拒的魔力。③ 克服各州分裂倾向的力量，除了中央政府具有巨大的财力和拥有全国大部分土地外，还应归因为对法老的崇拜。法老在古埃及是神（或者是神的儿子，他死以后就成为诸神中的一个）。法老的权

①②③ “一个贵族在自己墓碑的铭文中自豪地说：国王在召见他时允许他吻法老的脚。”见阿·尼·格拉德舍夫斯基：《古代东方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123页。

威则来自神的权威。在古代社会，国王的权威要被一个庞大的、层次复杂的官僚机构接受，而这个官僚机构又要被所有的臣民接受，这种权威大多来自于宗教信仰。宗教对政权的维系在古埃及是意识形态结构对政治结构进行调节的重要方式。

必须指出，很多古代社会也具有统一的宗教信仰，但它不能转化为国家行政组织力量。西欧的天主教就是例子，罗马教廷所直接控制的行政势力只局限于很小的范围，西欧虽号称政教合一，但实际上是分裂的贵族政治。那么在什么条件下，宗教信仰的力量才能转化为统一政府的组织力量呢？宗教对人们思想的影响，除了必须有教义外，还需通过一个中间环节，这就是宗教组织和礼仪。在古代埃及，神的崇拜是通过祭司和神庙来形式化的。而法老要有效地对全体臣民实行控制，必须通过一个庞大的政府。考察这两种控制渠道的互相关系十分有趣（图2.6）。我们前面提出，仅仅由“法老→政府→臣民”这一条政治控制渠道，政府组织可能不稳定，一旦出现地方割据势力，法老势必架空。这时必须用意识形态结构对政治结构进行调节。在这种调节中，首先要让法老成为神的化身，但这仅仅只是一个方面。因为法老毕竟离臣民十分遥远，他完全有

可能成为象日本天皇那样的一种象征，而失去对政府的实际控制权。因此意识形态结构对政治结构的强控制必须将两个控制链密切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将用宗教对信徒的思想控制链“宗教→祭司→信徒”和“法老→政府→臣民”这条政治控制渠道一一对应地耦合起来（图2.6）。让他们在互相调节中达到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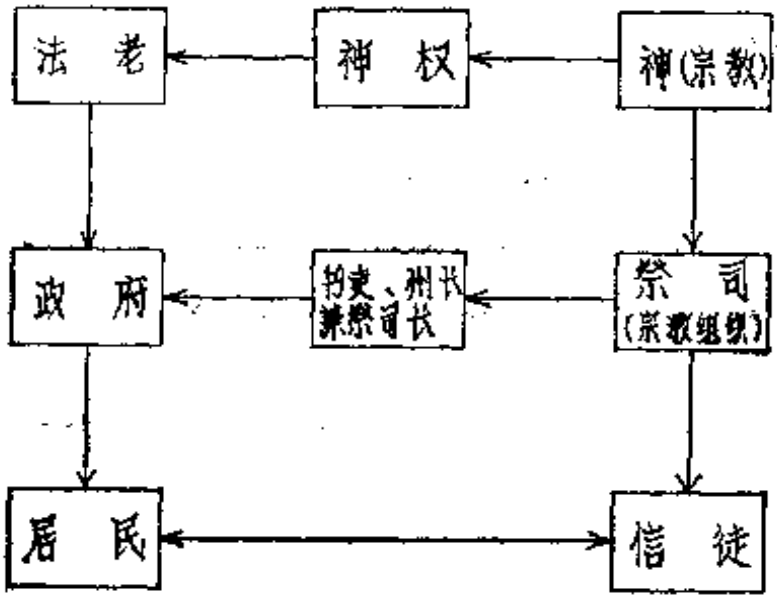


图2.6 神权官僚政治结构中意识形态结构对政治结构的调节

这里最关键的是祭司(神庙和宗教组织)和政府机构的强耦合，它要求宗教组织为政府提供组织力量。我们知道，在中世纪的西欧和日本，“国王→政

府→臣民”和“宗教→宗教机构→信徒”这两条控制链分别都很完备，而且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互相调节，但是由于宗教机构不可能为政府机构提供组织力量，两者没有一体化，统一的官僚政府就难以形成。宗教机构为政治结构提供组织力量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利用具有统一宗教信仰的知识分子作为国家官吏的来源，甚至包括各级宗教头目直接充当政府官员。这就是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结构的一体化。

古埃及正是这样做的。第一，法老是神的化身，而且一般总是全国性神庙祭司长的总头目。而各级政府机构特别是州和各地方神庙、地方性祭司组织存在着对应关系。古埃及各州长都是各诺姆的祭司长，控制着当地神庙和宗教组织①。第二，古埃及政府也是一个文官政府，官吏绝大部分是具有统一信仰的知识分子——书吏。他们和神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管理和组织都离不开书吏。丈量土地，登记户口，分配税收和管理各种公共工程以及国家档案管理都需要文化知识。在古埃及，

①摩勒：《尼罗河与埃及之文明》，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第24—30页。

当古王国兴起之时，我们已经看到大量书吏作为国家办事人员。据金字塔文记载，书吏的名目五花八门，分成公文书吏，书信书吏，军队书吏，“国王”书吏，“圣书”书吏①。这就要求社会上存在着一支知识分子队伍。在古埃及，文字始终是掌握在祭司阶级手中的。虽然每一个人只要肯下苦功去掌握这些文字，他就可以成为一个高人一等的书吏。*然而，要学文化他就必须到各神庙中去向祭司求学。关于古埃及何时开始有专门的培养书吏的学校，学术界尚无统一的说法。** 但有一点是公认的，即大量书吏是通过神庙学校培养出来的。一旦神庙消失，古埃及的文字和文化就可能断根。公元二世纪左右，在古罗马文明强烈冲击下的埃及，最后一批神

① 《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3—284页。

*古埃及有一名谚语：“年轻人的耳朵是长在背上的。”只有强迫和鞭打，才能使人掌握文化，识读写字。古埃及学文化是很艰苦的。地位低的人也可以成为书吏。《杜夫家训》中就是这样教导儿子的。（见司徒卢威《古代的东方》，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第89页。）

**有人认为，国家设学校始于中王国。古王国的书吏由神庙培养。但古王国流传下来的一个故事讲到，王子为法老聘请一位年迈博学的老者一代教，代教对王子讲。“为我另备一只船吧，以便我把我手底下的那些青年和我的图书带走。”似乎古王国时已有民间“学者”和私人学校（或象我国春秋战国时如孔子和他的学生那样的团体）。见《埃及古代故事》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8页。

庙祭司死去了。此后，古埃及文字没有人能识别。这说明，神庙是古埃及文字和文化知识传播的基地。因而古埃及利用大量书吏作为文官政府的主要组成部分正是体现了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耦合的特殊方式。神庙掌握着宗教和文化，并成为培养知识分子的机构，为意识形态结构对政治结构的调节提供了组织力量。

我们把古埃及这种法老和神合一，各州州长和祭司长合一，并且利用宗教文化培养出大量知识分子作为国家官僚组织中主要成分的政治结构称为神权官僚政治结构。神权官僚政治结构一方面和经济结构耦合，一方面和意识形态结构互相耦合，依靠宗教的调节力量来保持系统稳定。这是古埃及社会能最早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文官政府的必备条件。

2-6 诸神的王国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本章思路，我们从剖析古埃及社会物化外壳开层，逐步深入到整个社会结构的经济、政治、文化关系网中去。要理解全国性灌溉工程建立的原因就必须解剖国家诺姆经济；而认

识古埃及经济结构，关键又在于把握神权官僚政治结构对经济的独特调节方式。而且，埃及出现专制主义官僚政体除了需要特定的经济土壤外，也离不开意识形态结构的调节。这一切证明，古埃及的内环境结构（包括灌溉系统、金字塔、庙宇、邮政交通等等），国家诺姆经济结构、神权官僚政治和宗教结构组成了一个互为因果，互相调节的整体。只要其中一个不存在，其它子系统就不能保持稳定（图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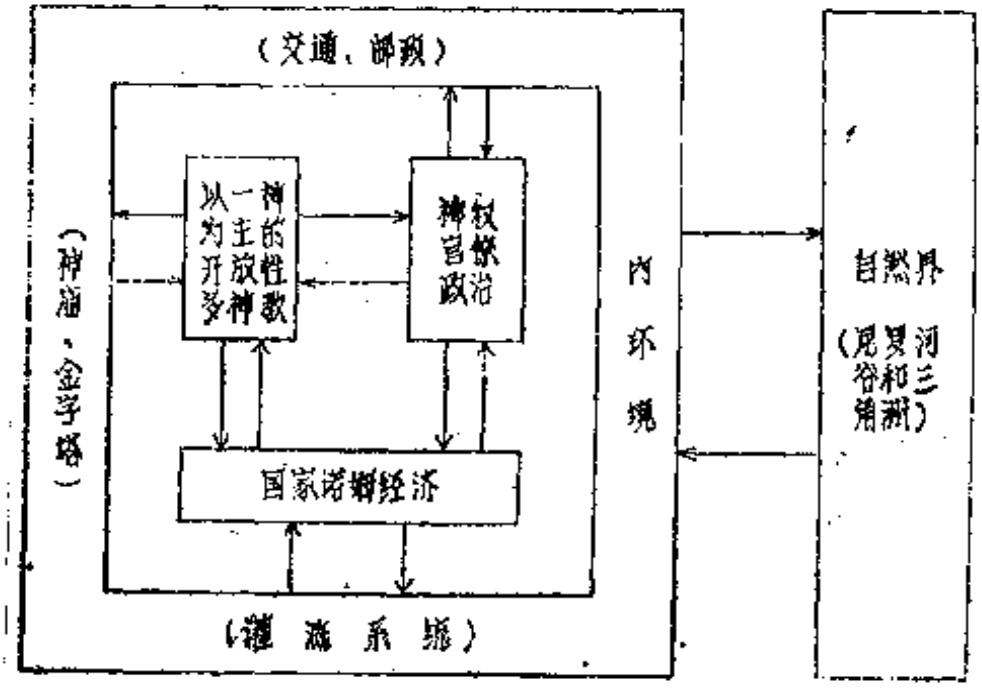


图2.7

理解了一个社会结构中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怎样耦合，怎样互相调节，只是说明了

这个社会是怎样维系，怎样保持自己存在的。那么，古埃及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奇怪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分析能对这个问题提供启示吗？能！这就是演化协同原则。

社会结构各个子系统既然是一个互相依赖的整体，而“整体”的起源只能来自于那些“原始的整体”。这就排除了先建立某一个子系统，再发展出另一个子系统的可能。也就是说，社会结构各个子系统必须协同发展。我们在第一章指出，尼罗河河谷地区最早形成的只是一个个诺姆，每个诺姆都是一个独立的地方性社会组织。古埃及王朝是由这些诺姆统一而成的。在诺姆的统一过程中，先是出现上埃及和下埃及两个王国，然后上埃及战胜了下埃及，建立了统一的古王国王朝。

诺姆的统一意味着社会结构各个子系统逐步完善，并在协同发展中强化它们之间互相调节的功能。每一个诺姆都有地方性政府，掌管着地方性河渠和灌溉系统。通过武力征服统一全埃及，意味着每个诺姆的社会结构中较原始的政治、经济子系统发生归并。一个个地方性官僚机构合并成统一的官僚政体，地方性河渠变成全国性灌溉系统，地方性诺姆经济转化为国家诺姆经济。一般说来，只要每个诺

姆社会结构类似，政治、经济结构是可以在演化中协同发展的。但是，在众多诺姆组织演化为统一王朝时，最大的困难也许是各个诺姆意识形态结构的差异。一个全国性的统一宗教几乎不可能由一个个地区的宗教加和而成。如果说，征战和武力对建立全国统一政府是可能的途径，但统一宗教却十分困难。

诺姆作为从原始公社直接转化过来的社会组织，它的文化共同体肯定带着浓厚的原始色彩。史前原始社会的部落，大多都具有自己的图腾崇拜。而每一个部落的图腾都是不同的。埃及早期的诺姆也是这样。在结构演化中，图腾不同大约是协同演化的最大障碍。图腾崇拜有着巨大的封闭性。一个部落的图腾实质上可能与另一个图腾大同小异，差别仅在于象征符号不同，但一个部落却很难接受另一个部落的图腾。因而目前学者们用图腾来说明古埃及宗教起源的企图几乎都失败了。在人类社会漫长的进化史上，一个跨地域的地区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比政治上统一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

我们可以想象，在古埃及王朝社会结构形成的演化过程中，一个个诺姆的政治经济结构慢慢向官僚政体和国家诺姆经济演变，但是如果统一宗教的形成很慢，那么整个演变的潮流就可能逆转。虽然

经过征战建立了统一政府，但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结构对它进行调节，统一王朝会很快瓦解，整个社会又会重新分解为一个个独立的诺姆国家。这种过程在前王朝早期可能一次一次重复。但是埃及从出现诺姆国家后只经过几百年，就形成了稳定的统一局面。这说明，正是在这个不太长的时间中，统一宗教奇迹般地诞生了。倒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古埃及能如此迅速地形成统一的宗教结构？

分析古埃及社会奇特的宗教，可以为我们找到线索。初学者常常被埃及多如牛毛并如幽灵一般出现在生活每一个角落中的诸神搞得头昏脑胀。据统计古埃及宗教中居然有两千多个神①。它是一种典型的地区性多神教。每个诺姆都有一大批神，它们具有各种各样动物的外形（或者是动物的头、人的身体）。这些神中往往有一个主神。对于不同的诺姆，众神谱和主神往往是不同的。表2-3罗列了部分诺姆崇拜的主神。每个诺姆有不同的主神和神谱无疑反映了古埃及宗教的原始色彩。也说明了古代社会中宗教信仰上的差别对形成统一文化的天然障碍。我们如果去分析古埃及众神的含义，就会发现

①冯祚民：《西洋全史》第2卷，台湾台北市燕京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75页。

表2-3　古埃及部分诺姆的主神

诺姆的名称	诺姆的主神名称	图　形
阿拜多斯	奥西里斯	人形(阴间的阎罗王)
希利奥波里	拉	太　阳
孟斐斯	普　塔	人形手持节杖
底比斯	阿　蒙	人形(有时羊头)
亚历山大城	萨拉匹斯	与希腊宙斯类似(人形)
厄勒藩丁	克努姆	羊头人身
达曼胡尔(赫姆波里斯)	努　特	女人形状
布　托	瓦吉特	带有帝国特征的人形又做毒蛇状
塔尼斯	荷鲁斯	鹰　形
布巴斯特	巴斯特	猫　形
登得拉	哈托尔	一头哺育法老的母牛
阿西尤特	哈　派	狼　形
门弟兹	巴	羊　形
卡伊塞[sic]	阿努毕斯	犬　形

那些神话常带着氏族制度的烙印*。似乎它和图腾相差并不大。但古埃及地区性多神教在结构上和图腾的根本不同，这就是它不是封闭性的。它是一种开放性的多神教。

古埃及宗教能在不太长时间中成长为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其奥妙正在于它的开放性。虽然每个诺姆都有地方主神，但埃及多神教中的神的数目和位置却不是固定的。通常各个地区除了崇拜地方主神外，还同时崇拜全国性的主神。比如太阳神拉（Re）、鹰神荷鲁斯。只要这些神被国家所推崇，它们很快就成为全国性的主神。图(2.8)中所画的12个神是古埃及部分全国性和地区（即不止局限于一个诺姆）主神，埃及各诺姆信仰的神虽不尽相同，有时也会出现由于信仰神的冲突而导致的两个相邻诺姆的纠纷。但是古埃及人的宗教对待神是极为开明的。他们从不拒绝与本诺姆崇拜不同的神。每个诺姆的地方性多神教都是开放性的，它很容易接受别的诺姆推崇的主神（只要国家提倡、有相应的神庙），新来的神会渐渐加入到本诺姆神谱，在

*古埃及农神奥西里斯的故事就很说明问题。奥西里斯神和爱西斯神结为夫妇，儿随母姓。早期王朝的女人可以当大臣等都反映了古埃及社会的氏族痕迹。（摩勒《尼罗河与埃及之文明》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第52页。）

爱西斯，奥西里斯的妻子和妹妹，天生神通广大。所行善事甚多，其一是保护儿童，这使她成为埃及最受欢迎的女神。

拉，希利奥波里的太阳神，第五王朝时享祀全国，有些传说尊他为人类的创造者。古埃及人自称“拉的牲畜”。

阿努比斯，司制木乃伊的胡狼神，由于他在葬礼中协助，死者才能进入冥世。他手中握着国王和神都要握的神权杖。

尼费塞斯，爱西斯的姊妹，妇女之神。她的名字意为“宅第夫人”。她曾助奥塞里斯复活，也就总与后者家联在一起。

荷鲁斯，长着鹰头的神，右手中握着生命之匙。他是爱西斯和奥西里斯之子。埃及历代国王都把自己同他联在一起。

奥西里斯，大地和植物之神。他的死象征着每年的旱季，他神奇的复活象征着尼罗河一年一度的泛滥和谷物的生长。

哈瑟，长牛角的爱情女神。亦司快乐和舞蹈、音乐。一个婴儿降生时，就有七个哈瑟跑到他床边，共同决定其命运。

塞特，被认为是上埃及的主宰。其形象是长着两只大耳朵活像驴似的想像的动物。一般说他是主管沙漠和风暴的神。

赫斯，不是长着朱鹭头就是长着狒狒的头，掌管智慧之神，太阳消逝之后也管月亮，赫斯总是想用其光明驱散黑暗。

普塔，孟斐斯的地方神，又是手艺人的保护神。有些传说中说他念出世界万物的名字，就能令那些东西突然间出现。

索贝克，鳄鱼神，水源特别珍贵之城如绿洲上的克罗考底洛玻利斯崇奉他。这些城把鳄鱼养在池里，并给它们戴珠宝。

阿蒙，底比斯之神，往往具有人形，但有时也作公羊或鹅形。罗马人后来奉他为朱庇特·阿蒙，并在其庙里求签问卜。

图2.8　古埃及全国性神

形象上甚至和本诺姆的神合并。正因为这种开放性，各个诺姆很容易形成一些统一的全国性主神。这些主神就可以成为宗教统一的基础。

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古埃及人对外来宗教的态度。到古埃及王朝后期，随着犹太人，尼基的殖民者进入，他们信奉的神居然也加入埃及各地的众神的行列。一旦外族人建立起神庙，立起牌位，信仰上开放的埃及人也就经常出入，他们甚至不排斥外国的新神①，久而久之，这些外国的神和他们的地方神合成一起了。正因为埃及各诺姆原始崇拜有这种开放性和结构上可调整性的特点，这样各诺姆的统一宗教，就不需要完全打破旧有的崇拜而重新建立(这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它只要在不同的地方神谱中推出一位全国公认的主神就可以了。这个过程是相对简单的。在埃及统一王朝建立前几百年中，随着各诺姆的互相作战和交往，那些经济上、军事上最强大的诺姆的主神成为全国主神。随着军事征服，就可以造成各诺姆经济、政治以至于文化上的统一。古埃及的神话就是一个例子，在神话中，古代那些统一的国王不仅被当作神，而且上下埃及的领导权的斗争，被描述为神话中荷鲁斯和塞

①阿甫基耶夫：《古代东方史》，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568页。

特神之间的种种斗争。第一王朝时，大约是信奉荷鲁斯的那些诺姆组成的王国战胜了其他诺姆，完成了统一，因此荷鲁斯成为全国主神。正因为主神通常是由诺姆地方神中推到全国地位的，在它当地方主神时具有一种动物形状，而成为全国主神时，往往需要大家共同接受的一些形象——比如太阳。所以埃及的主神不仅多变，而且在形象上也是复杂的，人们往往搞不清这个神到底是太阳还是鹰。

那么，为什么古埃及人地方性多神教具有这种开放性结构？尼罗河河谷特殊的条件可能是一个原因。我们在第一章谈到过尼罗河的泛滥怎样有利于形成古埃及人共同的心理基础。各个诺姆的神都是他们将自己周围环境的各种力量（自然的和社会的）人格化的体现。埃及各个诺姆，都生活在沙漠的包围之中，它们都饮用尼罗河水，用河水灌溉。每个诺姆在经济上和对外关系上不可能是封闭的。这有助于他们宗教信仰的开放性。我们发现埃及的许多地方的神，都是含有人们崇拜尼罗河、土地、沙漠、太阳的意思。鹰神荷鲁斯是太阳神。起源于希利奥波里的拉神，也是太阳神。底比斯的阿蒙也是如此，它曾有各种形状（有时是一只鹅、有时是一条

蛇、后又为公羊），但到后来，它的头上也顶起了一轮太阳。大概正是这种共同的环境，造成了不同诺姆的人的心理易于趋同的特点，也塑造了埃及各种神之间的包容性。

另一个原因来自宗教结构内部，一般说来多神教比一神教开放。神谱中的神越多，对外来神的排斥力也就越小。埃及不仅神多得数不过来，而且它是“现实的”，“入世的”。埃及宗教不是对一种理想境界的描绘，不是让人忘记现世而追求来世，它不是一个人逃避外来冲击和现世冲突的避风港。它是把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力量神化而社会化。因而当新的社会力量和新的外来冲击出现时，很容易塑造或接受新的神。

在这里，有一点必须说明，埃及人为法老建造金字塔作为死后永久居住的宫殿，他们把死尸制成不会腐烂的木乃伊常常使人产生一种错觉，好象埃及人对死后、对冥世所花的功夫远远大于对现世的兴趣，从而使人以为古埃及宗教是注重死后生活，而不是现世的。这是一种误解。埃及人是为了死后永远享受现世生活而铸造那死人居住的王国的。希罗多德讲过古埃及一个有趣的风俗，很能说明这一点。他说：“在富人的家

席上，进餐完毕后，便有一人带上一个模型来，这是一具涂得和刻得和原物十分相似的棺木和尸首，给每一个人看，说：'饮酒作乐吧！不然就请看一看这个，你死了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啊！'"① 古埃及人十分现实，他们在祭神以后都毫不客气地吃掉所有的供品，因而他们制金字塔也好，做木乃伊也好，都表明他们对现世生活重视到这种程度，以致希望死后仍然重现这种生活。因而古埃及宗教和印度佛教、基督教等一个重要的差别，就是它是入世的，而不是注重来世的。在这种高度"入世""现实"的宗教中，神无处不在，而且生活在世人中间。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在埃及，与其称为人格化的神，不如称之为神化的人"。② 既然数不清的神在人世间漫游，那么当现实生活发生改变，当一个新的神庙在尼罗河畔落成，一种外来的强大政治力量要求人们接受时，这种政治力量的代表就很容易被埃及人看作主神。"入世的""迷信的""崇拜现世中力量"的深层文化结构决定了古埃及宗教的开放性。

①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09页。

②杜兰：《世界文明史》，台湾台北市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129页。

埃及地方性多神教这种开放性不仅可以说明全埃及统一宗教何以那么快地形成，从而诺姆社会结构能迅速演化为统一王朝，而且它还带来另一个结果。这就是神的关系和社会组织存在着同构对应（图2.9）。

我们把埃及各种神排在一起，来看看他们的关系。首先至高无上的是一个主神（日神）。它是全国统一的主神。他和法老对应。除了全国性主神外，还有一些全国性的方面神（注意不是地方性的，而是指这个神管理宇宙中某一方面事务）。比如奥西里斯神，他的死亡和复活象征着尼罗河年年泛滥带来农业季节性变化。普塔神是手艺人的保护神，他虽出自于孟斐斯地区，但后来成为手工作坊工人的主要信仰。爱西斯的妹妹尼费塞斯则是妇女之神。这些神和全国性各种行业以及各诺姆共同的习惯联在一起。在主神之下的是上下埃及共同信奉的神。再低一个层次是各个地区人们信奉的地方主神，它们和州一级组织对应。神与神之间的关系和地域组织层次同构。这是宗教史上很少见的现象。它不仅能证明古埃及诺姆国家何以能演化为统一帝国，还可以说明为什么古埃及宗教能对政治结构起到有力的调节作用。第三章中我们还将谈到，这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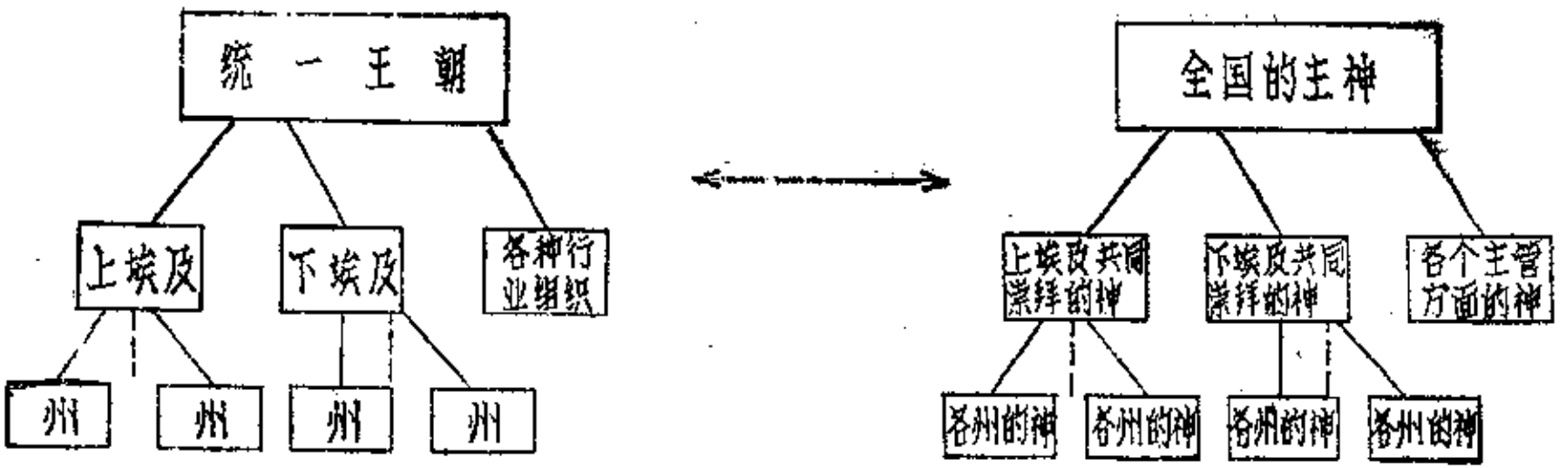


图2.9　社会组织与神谱的同构关系

同构效应对古埃及王朝崩溃后的重新修复也是不可缺少的。

宗教的世界是一个阴影的王国，它是一个反映现实的倒立歪曲的世界。然而古埃及人创造的宗教是如此精密地和社会组织同构，它说明了古埃及人非凡的创造力。也许，在尼罗河河谷那严酷的自然和社会问题的挑战下，古埃及人只有创造这样的社会结构，创造这样的宗教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并保持几千年的繁荣昌盛。但是古代文明的悲剧也正在这里。如果说古埃及王朝社会结构是在这种特殊自然和社会条件下各个子系统互相适应的唯一选择，那么有了伟大的起源以后，它的停滞以及最后必然灭亡的命运也被这种结构决定了。

第三章

王朝更替之谜

它们
坐在金字塔前面
注视着各民族的刑场、洪水、战
争与和平——
从无面部表情

——摘自汤因比《历史研究》

3-1 历史的力和社会结构型变

我们曾用金字塔来形容古埃及社会。这个比喻并不总是恰当的。金字塔可以全然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一动也不动地屹立在沙漠中。但任何一个古代文明都做不到这一点。内部的张力会时时刻刻使这座社会金字塔的石块发生微小的移动，这种缓慢的变化在一天、一个月、一年之中是难以觉察的。但它迟早会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型变，使文明经历兴起、衰落，重组等一系列不可抗拒的变迁。当历

史学家乌瞰沙漠中七十多座金字塔群时，就会感觉到这种变动的节奏。小山般的古代坟墓忽大忽小，周期性地一起一伏。那些高大的金字塔往往是在王朝鼎盛之际所建，而在盛大王朝之后，我们总可以看到社会衰落，不再具有无限权势的法老只得躺在那些较小的陵墓中。但是，过了几百年，伟大的王朝又会重新兴起。金字塔群似乎在向后人叙述着王朝一盛一衰的历程。

但是，古埃及社会的变迁至今仍是一个历史上的疑难问题。古埃及为后人留下的史料太少了，以至于连这些王朝存在的年代都难以精确判定。最系统的资料是公元前280年古埃及祭司曼涅托用希腊文写成的一部本国历史。但传到今天，已残破不全。从这部历史的片断中，我们知道古埃及经历了三十个王朝。埃及纪年中最早确定的年代是中王国塞索斯特里斯三世第七年，这一年记录着天狼星与日同出的记录。科学家根据天文学计算，确定了那是公元前1872年。经过多年的努力，结合了帕勒摩碑石、都灵纸草以及阿拜多斯王表、萨卡拉表和卡纳克表等大量古代文献，特别是近年来还对某些考古发现文物进行碳—14测定，历史学家基本上划分出各个王朝的年代。表3-1是根据七十年代的资料

确定的三十个王朝纪年。①

表3-1　埃及王朝的更替〔引自《古代埃及》〕

分期	王朝名称	存在时间	社会特征
早王朝（共414年）	第一王朝 (C3100—BC2890)	210年	
	第二王朝 (C2890—BC2686)	204年	末年上下埃及政治、宗教纠纷后由哈谢海姆法老统一全国
古王国（共506年）	第三王朝 (C2686—BC2613)	73年	
	第四王朝 (C2613—BC2494)	119年	
	第五王朝 (C2494—BC2345)	149年	
	第六王朝 (C2345—BC2181)	164年	末年割据出现国家进入无政府状态。
第一个中间期（共141年）	第七王朝 (C2181—BC2173)	8年	
	第八王朝 (C2173—BC2160)	13年	
	第九王朝 (C2160—BC2130)	30年	大动乱，社会不稳定，不统一。
	第十王朝 (C2130—BC2040)	90年	
中王国（共247年）	第十一王朝 (C2133—BC1991)	142年	
	第十二王朝 (C1991—BC1786)	205年	

①威廉·兰格主编：《世界史编年手册—古代和中世纪部分》上册，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61—62页。

第二个中间期（共219年）	第十三王朝（C1786—BC1633）		大动乱，中央集权衰落，混乱状态 从亚洲来的希克索斯人夺取政权，后期开始了驱逐外族人统治的斗争
	第十四王朝（C1786—BC1603）		
	第十五王朝（C1674—BC1567）		
	第十六王朝（C1684—BC1567）		
	第十七王朝（C1650—BC1567）		
新王国（共482年）	第十八王朝（C1567—BC1320）	247年	末期宗教改革失败
	第十九王朝（C1320—BC1200）	120年	末年国力衰退
	第二十王朝（C1200—BC1085）	115年	末期法纪废弛
晚期王国（共744年）	第二十一王朝（C1085—BC945）	140	
	第二十二王朝（C945—BC715）	220年	
	第二十三王朝（C818—BC715）		
	第二十四王朝（C727—BC715）		古埃及受到外来文明冲击
	第二十五王朝（C747—BC656）		
	第二十六王朝（C664—BC525）		
	第二十七王朝（C525—BC404）		
	第二十八王朝（C404—BC399）		

	第二十九王朝 (C399—BC380) 第三十王朝 (C380—BC343)	
托勒密王朝时期 (300年)	托勒密王朝 (C305—30BC)	和古希腊以后是和罗马文明融合的尝试

每一个王朝代表了一个家族世袭体系*，（如表3-2就是第六王朝各个法老名字的象形文字**）。从这些表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社会稳定、全埃及统一的强大王朝历时100—200年。而不稳定的王朝则如昙花一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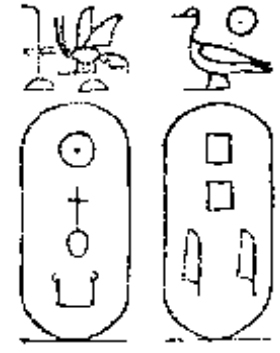
一个稳定的王朝显示了第二章所说的古埃及社

表3-2

法老(国王) (第六王朝)	法老名字的象形文字
特　　提	
尤瑟尔卡瑞	

* 古埃及法老一般是世袭的（包括把王位传给女儿和女婿）。

** 关于各王朝世系详见附录一的王表。

麦尔瑞尔(培比一世)	
麦伦涅瑞	
涅菲尔克勒(培比二世)	

会结构各个子系统互相适应；而王朝的倾覆标志着社会结构的瓦解，或者某一个子系统不稳定。那么必然出现一个问题：既然古埃及社会结构中的国家诺姆经济、神权官僚政治和以一神为主的开放性多神教是互相适应并在调节中保持自己的稳定的，为

什么我们看不到一个寿命长于300年的王朝？为什么当整个社会统一和鼎盛维持一百年后，分裂、动乱或者改朝换代就必然出现呢？

当我们对目前保存下来的那些文献，特别是那些盛大王朝的后期资料，进行细致的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每当一个王朝建立一百多年后，社会结构往往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使得原来互相适应的各个部分变得不那么适应了。它们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1．法老那来自冥冥苍天的至高无上的权威遭到了凡间人们的怀疑，人们心中法老与神合一的信仰发生了动摇。从埃及建立王朝之日起，法老（国王）就是神，他的身份是神圣的，他的诏谕也是神圣的，“凡人”不能够和他对抗①。每逢大典，做为神的法老，额戴黄金制成的嵌有蛇神的王冠，手持代表神权的牧杖和打禾杖，以凡人高不可攀的姿态，出现在膜拜顶礼的群臣面前，他虽然活在人间，却已参与了死后永劫的事业②。本来法老与神是合二而一的。但是，日久天长，法老成了神的儿

①A·费克里：《埃及古代史》，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4—15页。

②雷奈·格鲁塞：《近东与中东的文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4页。

子*，当然，神的儿子仍然是神，但这里有着一种微妙的变化。人们不仅要去崇拜神的儿子法老，还要去膜拜其"父"——大神了。人们的信仰，随着这种分离而减弱，法老的地位日益被世俗化和行政化。

这种分离甚至表现在古代埃及的建筑上。过去，埃及人只需要给那神人合一的法老造起巍巍的金字塔，而在法老被称为神的儿子以后，祭神的庙宇日益堂皇富丽，甚至和金字塔平分秋色了。"在第五王朝以前，全国的力量集中于建造帝王的不朽的坟墓，但从第五王朝起，一部分力量（从当时的庙宇看，这'一部分力量'还是相当大的。作者注。）用于太阳神"。① 第五王朝的每一个国王都要建造一座神庙来表示自己对神的敬仰。② 每一个王朝法老的神权都处于一种不断递减的过程之中。今天的考古学家们在对金字塔等遗迹的考察中，居然在一些石块上发现建造金字塔的那些石匠们刻下的"胆大妄为"的话："看法老醉成那样子！"③

---

* 第五王朝的开国法老，一继位即说明自己是拉神的儿子。

①A·费克里：《埃及古代史》，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4页。

②阿尼·格拉德舍夫斯基：《古代东方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129页。

③莱昂内尔·卡森：《古代埃及》，纽约时代出版公司1979年中文版，第130页。

如果不是法老的神的地位受到了动摇，这种大不敬的言论似乎是不可想象的。更有甚者，往日那些法老的臣民，受神统治的“下贱”的人们，竟然凿通了金字塔，钻进那神的住所，将坟墓中的宝藏洗劫一空，法老的神体遭到了亵渎*。

2．官僚机构一天比一天的腐化。每一个王朝的末期，我们都可以看到大量国家官吏、王公贵族们行私舞弊，抢占穷人财产的记录①。不少官吏死后，在他的墓铭中一再强调“我没有霸占人家的女儿、我没有霸占人家的田地”。②这些碑铭使我们看到了社会的真实的一面。

3．神庙祭司势力的强大。在一个王朝的鼎盛之际，法老是全国最高祭司长，他手中掌握的不仅有世俗的行政大权，还握有冥冥天界中的神权。但那不可抗拒的时间之流慢慢将法老手中的权力冲淡了。各神庙的祭司的独立性越来越大，甚至和法老分庭抗礼。各神庙拥有越来越多的土地以及耕种这

---

*今天留下的金字塔，几乎都为人盗挖过，而且发生在几千年前。（参见A·费克里《埃及古代史》，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1页及第55节。）

①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489页。

②刘家和主编：《世界上古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页。

些土地的农民，而且掌握着日益增多的书吏和管理人员。神庙慢慢发展为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的独立体：它们可以拥有十几万奴隶（可以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和400多万亩的土地（占全国可耕地的百分之十四）。那些地方性神庙也处于不断膨胀之中，它们占地可达全国耕地的百分之十五。并掌握近百个船团，几百个果园，53所大型手工作坊，160座城市。至于实物就数不尽数了。① 一些学者估计新王朝时期阿蒙神庙占全国土地的百分之三十以上。② 神庙祭司力量甚至会大到这个地步，连法老都是他们选定的*。神庙的祭司们凭借着雄厚的财富，参予政事，掌握官僚机构的某些行政大权。他们常常任国家的宰相，架空法老。图特摩斯二世（约公元前1512—公元前1504年）时代的宰相哈普塞涅布，同时又是“阿蒙最高书吏”，“南部和北部僧侣长”（即祭司长），“卡尔纳克阿蒙神

①冯作召编：《西洋全史》第2卷，台湾台北市燕季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7月出版，第215页。

②莱昂内尔、卡森：《古代埃及》，纽约时代出版公司1979年中文版，第79页。

*如图特摩斯三世被女王哈特舍普苏特(公元前1523—1482)打入冷宫，图特摩斯三世被祭司保护在神庙之中，以后祭司们通过“阿蒙神的显灵”，把图特摩斯三世推上了王位。

庙阿蒙每块土地的首领”，“阿蒙神庙每个职务的长官”，“神庙长官”。女王哈特舍普苏特的宰相，阿蒙神庙祭司出身的塞平穆特，又是阿蒙第一管家，阿蒙谷仓的监督。① 这种例子举不胜举。

4．地方诸侯势力抬头。在中央集权强大时期（特别是古王国某些王朝早期），国王可以任意将州长从一个地区调到另一地区，上下埃及官员也可以互调，大部分州长和国家重要官吏都由王室成员担任。但是，久而久之，各州州长位置落到地方权贵手中，不再由王子担任②。他们不仅管理着地方政府，而且还建立自己的军队③。从州长和地方权贵们的坟墓和碑刻上看到，他们甚至给自己加上了“伟大的统治者”的头衔。④ 如希利奥波里统治者模仿前法老“太阳神拉之子”的称号，自称为“月亮神托特之子”。割据势力增长最后导致王朝的倾覆，统一的帝国瓦解了。地方势力增长和王权衰

①《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2—303页。

②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31页。

③阿南基耶夫：《古代东方史》，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30页。

④《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0页。

落，甚至在坟墓排列上都表现出来。本来臣民们都以自己坟墓排列在金字塔旁边为极大的光荣，但有的王朝法老地位降到微不足道的地步，连墓葬差别都消失了。十一王朝灭亡后，十二王朝刚建立初，墓地中既有法老之墓，有王子之墓、公主之墓、有家宰之墓，有官吏之墓，甚至也有农工商人之墓。当时，人人皆可升天，死后都可为神。①

5．农民日益贫困化。古埃及王朝对土地控制虽然十分严格，土地转让极难进行，但是我们总是看到农民慢慢地失去了土地，或者是由于不堪忍受赋税和劳役，或者是出于神庙和地方官吏的压迫，他们不得不逃亡，转让土地。有的卖身为奴，有的成为神庙和大小官僚的佃农。大量农民挤到城镇，成为赤贫如洗的人。最后出现“土地缩小了，但是它的行政人员却很多，土地荒凉不毛，税却很重；只有很少的谷物，但量斗却很大，而且量时总是满得上尖。”②国家税收递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五种倾向中的任何一种发展到一定程度，都必然造成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互相维系、互相调

①席勒：《尼罗河与古埃及文明》，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第118—120页。

②《亚非尔列胡预言》，载《世界古代史史料选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0页。

节状态的破坏；都足以倾覆一个王朝。因此在古埃及三千年历史中，我们经常看到王朝不断更替。当祭司力量大到一定程度，一个王朝被废止，另一个王朝便取而代之。当地方割据势力不断增长，必然出现统一帝国的瓦解，全国弥漫着分裂混战的烟火，而一旦大多数农民破产陷于赤贫状态之时，我们则看到：广大农民揭竿而起，“大地象陶轮一样翻转起来了，富贵人的女儿成了穷人的女儿”，“法老的木乃伊从金字塔中抛了出来。”①埃及王朝被贫民奴隶大起义推翻。整个社会遭到粉碎性瓦解。

这五种倾向增长是一种历史的力，它是一种来自社会结构内部的张力。仅仅指出这些倾向的增长导致古埃及社会结构的瓦解，这不过是在描述历史现象。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研究这些力的来源，并指出它为什么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被社会结构呼唤出来。

---

①《伊浦味陈词》，载《世界古代史史料选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3—37页。

3-2 神权官僚政治的异化：祭司力量失控

为什么法老的权威会一天天丧失？为什么神庙势力必然一天天膨胀，直接威胁了法老权威呢？说起来非常奇怪，这个和法老中央集权官僚机构的对立物是法老本人一手培育出来的。在古埃及历史上，我们总是一次一次看到这一种奇怪的历史现象，每当一个法老即位，当王朝统治尚未巩固之时，法老都要赠给神庙大量土地，给予各种免税特权。法老是神庙的修建者，也是它的哺育者。结果某一王朝被日益强大的神庙祭司集团所推翻。但新王朝建立后，法老却又重蹈复辙，重新去养育这个以后可能来推翻他自己的怪物。法老权威的失去，神庙从修建到强大的历程，非常形象地反映了社会结构调节功能被调节结果慢慢破坏这一不可抗拒的规律。

法老作为庞大官僚机构的中枢，他是中央权力的象征。他的权威之所以被确认，因为他是神。但是他在官僚机构中的作用以及他对整个中央政府的控制每时每刻都显示出他是一个国王，一个世俗权

力的掌握者。为了维系整个国家官僚机构组织的稳定性，法老不得不经常强化神权。强化神权的一个重要(也许是唯一可行的)措施，就是修建神庙，建立全国性的祭祀中心。通过这些中心控制臣民的意识形态。第二章曾指出，我们不能用现代佛教圣地的庙宇和土地城皇庙的观点来看古埃及神庙。在古埃及，神庙承担着重要的组织功能。神庙祭司既是神的侍者、是沟通人与神的中间渠道；又是古埃及文化的掌握者，为统一帝国培养出一批批有统一意识有知识的官吏。神庙传达神的意志、成为维系整个官僚机构具有共同信仰而不使其分裂的重要机构。因此，每一个新的法老继位，都要对神庙有所表示。比如，图特摩斯三世在举行加冕典礼时，一次就赠给阿蒙神庙2800斯塔特（阿鲁尔）土地，以及“南方和北方很多土地”。① 另一个铭文中还记载了他一次给卢克索尔神庙1578个叙利亚奴隶。② 当法老觉得自己有被认为是世俗国王的危险或地方势力增长时，就不得不加强和各种神庙的联系，举办公共祭事活动，通过神庙维系整个神权官僚政体的稳定。因此每个法老都不遗余力地建立神庙，赠与神

①②同启迪：《关于埃赫那吞改革的若干问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庙土地，给予他们免税等各类特权。这与其说是法老的一种对神的虔诚，毋宁说是一种历史的意志。它是不断强化维系官僚机构统一的一种必要措施。

神庙在维持政治统一中的作用从各类神庙的分布上可以明显表现出来。我们在2.6节讲到古埃及宗教结构与国家组织存在着同构现象，主神与法老（中央王权）对应，地方神与各级州政府对应，它反映了意识形态结构对政治组织的调节作用。由于这种维系是通过神庙来实现的，因而古埃及的各个神庙的富有程度及地位必须和社会组织密切对应。表3-3给出某一王朝全国各类神庙财富占有程度的

表3-3

神庙名称	所有财富占各类神庙财富总数的百分比
阿蒙神庙	62%
太阳神庙	15%
普塔神庙	8%
其它小庙	15%

（参见《埃及考古学》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第47—49页）

百分比。奉祀全埃及主神的阿蒙神庙财富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二，而太阳神庙、普塔神庙作为全国性的主要的方面神和其它奉祀各地地方神的小庙则占百分之三十八。从这张财产的分配表中，还可以看

到全国性的神庙占百分之八十五。如果这些神庙不存在，那么整个中央集权的神权官僚组织就会土崩瓦解。

但是，以法老为首的专制王权企图以加强神庙的办法来维持中央官僚机构的权威，最后，终将自食恶果。古代埃及神权政治就象是一个要靠吞吸鸦片来维持精神的烟鬼，鸦片就是这些神庙。他愈吸愈重，愈来愈离不开鸦片的刺激，他的身体也就日益衰弱，终于有一天，神权官僚政治倒在地上，痛苦地抽搐着，呻吟着死去。神庙强大到一定程度，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必然与专制王权发生对抗。

尼罗河河谷及三角洲地区的土地毕竟是有限的，每随着法老捐赠给神庙一块土地，作为国家税源的土地就少了一块。因而当神庙的地产大到一定程度，一系列滚雪球般的过程就发生了，神庙田产就会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增长趋势。法老捐赠土地给神庙，国家掌握的可耕地面积必然减少，为了维持税收不变，税率必然就要增加。当税率高到一定程度时，会给农民带来什么？在某些东方国家，当对土地买卖控制不严时，就会出现自耕农卖掉土地，农民佃农化。比如中国封建社会，每当国家徭役加重，增加附加税或实行“摊逃”时，会促使自耕农纷纷

破产转化为佃农。但古埃及国家对土地卖买限止极为严格。那些穷凶极恶的税吏就象一个榨果汁的机器，他们对土地一刻也不放松，农民卖地是困难的，但一天比一天难以承受这么高的经济压力。一种最常见的办法就是把土地赠给神庙，自己成为神庙的佃农。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说是在精神上得到补偿，更重要的，神庙税率虽然也很高，但劳役或税收相对固定，农民也许可以逃避承受国家不断加重的剥削。

在古埃及文献中，农民和其他社会成员把土地捐给神庙的纪录比比皆是。在很多情况下，私下买卖土地是非法的，但捐给神庙似乎得到默许。第八王朝（公元前2173—2160年）的一份史料说一个不知名的官吏，把土地给了神庙，做死后的祭司基金。他说："不准你把土地、人及其他财产偿付给别人，如果你转让，偿付给别人，我就要到法院去控告你。"① 目前保留下来的新王国二十王朝时期的《维勒布尔》纸草是一份关于土地丈量的清册，从中可以看到神庙占地相当多，其中既有国家、国王

① JamesHenry Breasted《Ancient Records of Egypt》Vol. 1 Published 1906 third impression 1927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 196.

捐赠的，也有私人转让的。这些土地都是能得到灌溉的好地。① 著名的美国埃及学家布列斯特德估计古埃及各类神庙所占的土地高达439万亩地，而全埃及的土地（根据1903年材料统计）约为3035万亩。神庙土地占全国土地总数百分之十四左右。②

神庙好似一头猛兽，它不仅吞噬着全国的土地，它还吞噬着国家的劳力。古代埃及有个法律，如果一个奴隶从主人那里跑到神庙内避难，把自己的一身献给神并在自己身上打上了神圣的印记，则不管他的主人是谁，再也不能动一下这个奴隶了。③ 以此推知，当人们不堪忍受那沉重的赋税、劳役之时，他们一般会跑到神庙中去。由于法老不断赐与神庙免税特权，神庙势力的膨胀十分迅速。表3-4（1）例出了某一阿蒙神庙占有的财产，表3-4（2）是各类神庙所占财产的数量和比例。从中可见，神庙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经济实体，它拥有数以百计的城镇和几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为了

①参见刘家和主编：《世界上古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5—70页。

②James Henry Breasted《Ancient Records of Egypt》Vol. 4 Published 1906 third impression 1927 by the univetsity of Chicago.

③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23页。

表3-4(1)　阿蒙神庙的财产庙

土地：	169个村镇
	2849平方公里的土地
其他不动产：	50个花园、葡萄园
	50个船坞
通讯设备：	88只船
动产：	363630升粮食
	139磅金，2675磅银
	6122磅铜，18168块宝石
	16339件金银器皿
	4575件精工编织的长袍
	1529瓮香精、蜜、油
	28080瓮酒
工人和管理人员：	107，615人(木匠、铜匠、石匠、香料匠、牧羊人、水手、养蜂工、书记等)

对这些土地实行监督、税收，对十几万工人进行组织，所以它还具有一个庞大的由书吏组成的管理机构。

另外，在古代埃及的司法机构中，神判所和世俗的法庭同时存在。在王权强大时，国王掌握着司法大权，中央集权是巩固的。但是随着神庙祭司集

表3-4(2) 神庙产业表

	底比斯	希利奥波里	孟菲斯	一般的诸小神庙	总计
人力(各类劳力)	86486	12364	3079	5686	107615
大小牲畜	421362	45544	10047	13433	490386
果园和园林	433	64	5	11	513
土地	350万亩	65万亩	4万亩	15万亩	434万亩
船支	83	3	2	无	88
手工作坊	46	$5\frac{1}{2}$	无	2	$53\frac{1}{2}$
埃及城镇	56	103	1	无	160
在叙利亚和库什的城镇	9	无	无	无	9

James Henry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4 P.97

团势力的强盛，神判所的力量会慢慢超越世俗的司法力量。从古代埃及的许多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圣言可以把法庭和政府的指令掷弃不用。许多人宁可相信阿蒙神的决定而不相信正规的审判法庭。神不但决定一人是否有罪，还可以选择或反对某岗位的候补者。这样神庙必然同时成为一个和中央政府对抗的政治力量，它似乎已成为国中之国

了。*

因此，神庙强大到一定程度，在利益上必然和代表中央王权的法老发生冲突。在经济上神庙是一种大地产（土地的所有权属于祭司头目），政治上它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小政府，并不属于中央王权管理。在古埃及历史上，神庙和法老的冲突是经常发生的。十八王朝末期的埃赫那吞改革大约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例子。早在埃赫那吞父亲阿蒙霍特普三世（即阿美诺庇斯三世）那里，阿蒙神庙的祭司们已经强大到足以钳制王权的地步了。法老的两个维西尔（宰相）之中有一个实际上就是阿蒙神庙的高级祭司——普塔赫拿斯。埃赫那吞的父亲“曾明白无疑地作出尝试，去摆脱那如此沉重地压在王位上的祭司们的手。”他另选了一个宰相拉莫斯来取代祭司宰相，而阿蒙霍特普四世决定破釜沉舟，企图用宗教改革的办法一举清除那些日益威胁着法老权力的阿蒙神庙的祭司们。他宣布阿吞神（日神）为

* 据布利斯特德统计，在第二十王朝时期《哈里斯大纸草》中记载属于神庙的土地（有1070419斯塔特），占全国耕地的15%，劳动力的2%。据谢德勒的意见，《哈里斯大纸草》中记载的仅是拉美西三世赠给神庙的，它占全国耕地的10%，劳动力的6%。据司徒切夫斯基的意见，该纸草又剩下1/3，因而实际占有土地和劳动力的比重应更大。（周启迪：《关于埃赫那吞改革的若干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第18—19页。）

全国唯一的神，取缔对其他一切神的崇拜，关闭它们的神庙，没收他们的财产。为了改革彻底，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埃赫那吞”。把首都从底比斯迁出，想在一个与其他任何神没有关联的地方建立一个新的首都，① 以彻底摆脱神庙祭司们的控制。

这一切表明：当神庙强大到一定程度时，法老害怕神庙，不得不没收神庙财产。但是取消神庙等于国王自己抹去了他头上的灵光，等于砸烂那用于维系自己王权威信的机构。他已经从神之子降为一个世俗权力的掌握者了。在古代埃及，一旦国王不再代表公认的神，那么中央王权就会解体。因此，埃赫那吞的改革注定要失败的，虽然他把自己打扮成另一个神的儿子，但是另一个神的一套祭祀机构刚刚建立，还不可能强大到足以维持统一。埃赫那吞的改革引起了混乱，中央集权力量不但没有强化，反而削弱了。当他死后，改革的尝试便烟消云散。他的继承人图坦阿吞被迫迁都返回底比斯，并且将他那还留有改革痕迹的名字图坦阿吞改为图坦阿蒙。遂恢复了对阿蒙神的崇拜，祭司们重新掌了权。他不得不再次去讨好阿蒙神的祭司，公开承认

①A·费克里：《埃及古代史》，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81页。

自己是阿蒙神的皈依者，还为阿蒙神塑造金身，赠给神庙大量黄金白银，男女奴隶。① 图坦阿蒙统治九年后便死去了，国家内部酝酿已久的动乱因素终于爆发，国内发生了激烈的动乱。十八王朝瓦解。

神庙和法老王权之间的矛盾，不仅仅表现在神庙的祭司们要把选择法老的权力抓在自己手里，使法老成为自己的代言人。更重要的是，神庙和法老统治下的整个中央政府、官吏也是格格不入的。官僚机器的职能是保持国家统一，特别是维持税收。而农民一旦把土地捐给神庙，国家税收机关就无可奈何了。那些国家税吏们对此是大为恼火的，神庙力量大到一定程度往往危及他们本身的利益。目前保存在布隆博物馆的《第1086号纸草》记载着一份书吏巴康纳蒙向托特神庙祭司拉麦斯提出的报告。报告中叙述了他寻觅一个失踪的奴隶——农夫的事。书吏说，他听说法老驻军部队的通讯长强占了他，但这位军官否认了，又听说宰相强占了他，但宰相也否认此事，书吏要求那些强占者把农夫归还给祭司，提出他们一共要缴纳的税赋。② 这一文件明显反映

①周启迪：《关于埃赫那吞改革的若干问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第25页。

②伊·阿·司徒契夫斯基：《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奴隶制度的特殊形式》，载《河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第71—76页。

出神庙祭司和国家机关的官吏对农民占有权的争夺。可以想见，这种事在古埃及是经常发生的。

埃及神庙力量这种从强大到失控的过程，大约是人类文明史上社会结构功能异化最早的例证。神庙本来是作为神的法老用来强化中央王权，维系各级政府忠于中央王权的工具。但是法老用各种办法巩固这根王杖时，有一天突然发现手中的王杖变成了一条毒蛇，它成了和中央集权和整个官僚机构对立的东西。调节者变为破坏调节者，他反过来要求法老成为他的工具。社会结构在互相调节中必然出现功能异化，这在埃及历史上也得到了证实。每一种调节造成的和谐和稳定都似乎是暂时的。调节的过程必然造成功能的异化，它的结果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稳定性的破坏和无组织力量的增长。

3-3 官僚机构腐化以及“大、中、小官僚奴隶主”出现

既然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结构在互相调节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功能异化，导致无组织力量的增长；那么政治结构在与经济结构的互相调节中是否会导致

功能异化，从而导致无组织力量的增长呢？答案是肯定的。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在3.1节中所讲的另外几种导致王朝覆灭的社会力量的增长就不难解释了。

古埃及政治结构对经济结构调节的主要方式，是用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和税收系统对土地进行管理，并维持灌溉系统。这种调节机构也处于不断异化之中，其表现形式就是官僚机构的腐化膨胀，营私舞弊一天比一天严重。十八王朝末的法老霍连姆赫布在全国各地公布了他的敕令刻石，他要求用严刑酷法来禁止公职人员和军队抢夺居民的船支和奴隶等，还豁免法官向国库纳税以杜绝纳贿行为。然而这一切都是枉然。当时的史料充满关于各级官员的营私舞弊的报道，加强法官监督没有任何作用。当时甚至在故事和学校的抄本上都公开讲到各级官吏的贪污行为。① 随着官僚机构的日益腐化，必然同时出现一个不可抗拒的倾向，这就是土地兼并。国家关于土地买卖和转让的禁令对于一般农民和市民是行之有效的。但法律的执行者是一级级政府、各种政策法令是通过州长和大量书吏来实行的，当管理者进行土地兼并时，这种趋势就无法控制了。

①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483页。

目前古埃及保存下来的文献中，有不少有关官吏霸占人民土地和财产的记载。有一份第六王朝时期的某寡妇和孤儿的祷文说明了这一点。他们在祷文中祈求死者的灵魂保佑他们免受他人欺侮，因为这些人不仅夺取他们的一切财产而且还霸占了全家的三名女仆，这几名女仆都有埃及名字①。看来这一家是一个中产阶级，贪官污吏对这样的家庭都毫无顾忌，对一般农民更是穷凶极恶了。这种情况在一个王朝的末年是那样普遍，以至于一些比较廉洁的官吏往往把自己没有兼并农民土地作为美德刻在自己坟墓上。十一王朝的一个官员叫伊提，在自己的石碑上刻有“我没有霸占人家的田地”。② 古王国一个高级法官叫霍特菲利哈特菲讲，“我修造的这座墓做为我的财产是公正的，因为我从来没从别人哪儿拿过不应属于我的东西”。一个叫Nezemib的人在他的坟墓铭文中讲，“我从来没有强行拿走任何人的财产”。④ Mes碑文里记载，在拉美

①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22—223页。

②刘家和主编：《世界上古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页。

③④James Henry Breasted《Ancient Records of Egypt》Vol. 1 Published 1906 third impression 1927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115、125.

西斯二世18年，有一个名叫Khay的人用伪造的地契，巧妙地从当时的占有者 Nubnefert 手中夺下这块土地。但后者的儿子提出他自己就是原有地主人的后裔，向法院控诉，最终获得胜利。①这是用法律来遏止土地兼并。但一般说来，在一个王朝中后期，通过法律和各种政策来限止兼并的效果并不大，上述例子一定极为罕见。在古埃及，虽然法律已达到相当完备的形态，然而整个控诉和审理过程都由官僚机构办理，这些本地大小地方长官，管理土地税收的书吏们，又怎么能够自愿地抑制对财产、田地的占有欲呢？官僚进行土地兼并比起神庙也许要缓慢一些，但经过上百年的积累，它也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危机。

它造成的第二个后果就是渐渐形成了一个占有大量耕地的官僚奴隶主阶层。那些州长和权贵依靠手中的世袭权力，占有越来越多的土地，成为一些巨大田庄的主人。比如卡夫拉的王子曾将自己14个城镇给了他的孩子和妻子。②这些大官僚的私人领

①冯祖贻编著：《西洋全史》第2卷，台湾台北市燕京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229页。

②James Henry Breasted《Ancient Records of Egypt》Vol. I Published 1906 third impression 1927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90。

地已成为国中之国。至于拥有几个田庄、数十名上百名奴隶的官僚奴隶主则更为普遍。在《布鲁克林纸草》书背面，可以找到一个拥有80个奴隶和大量土地的私人田庄的记载。① 官僚机构中下层书吏虽然官位微小，但是利用手中的职权仍可以参与兼并。他们一般成不了大土地所有者，但人数众多，这部分人所占土地的总数也相当可观。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必然使得国家的可耕地不断递减，最后导致统一王朝赖以为生的税源一天比一天少。藏于列宁格勒博物馆的1116A号纸草表明，第九王朝时，整个古埃及经济崩溃，国家王室的土地几乎被地方权贵或神庙所倾吞。第三王朝末期，王室收入几乎只能靠直辖地加上臣民的奉献了。② 历代王朝末期的法老们，甚至要靠卖官爵来增加国库的收入。*

国家官吏兼并土地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农民赤贫化。随着贵族、书吏私人占有地的膨胀，国库收入一天比一天少，国家为了维持足够的税收，不得

①A.N.久梅涅夫：《近东和古典社会》，载《史学译丛》1958年第8期。

②冯祚民编著：《西洋全史》第2卷，台湾台北市燕京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58页。

*在一份文献中，纪录了十七王朝（公元前1650—1567年）的一个法老宣布出卖艾尔卡布市市长官职的事情。（艾伦伽德纳《埃及语语法导言》，载《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2期）

不增加税率，加重对农民的剥削。第六王朝末古埃及一个统治者曾炫耀自己加倍征收赋税。① 这就导致了一个正反馈链。兼并造成的赤贫化使农民只得把自己的土地送给神庙，自己沦为佃农、有时甚至是奴隶。国家拥有的耕地进一步缩小，这反过来进一步加剧土地兼并。古埃及农民同时承受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国家三令五申，严禁卖地；另一方面大量书吏官僚趁人之危、想尽一切办法行私舞弊，而税收一天比一天重。在这双重压力下，很多农民没有机会卖地，只能卖身。农民卖身比卖地容易，这就出现2.4节中所讲的农民陷于特殊身份奴隶的现象。

在目前保存下来的一些纸草书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埃及人沦为奴隶的记录。比如上面提到的布鲁克林纸草书背面记载了一个南部城市的土地长官赠给他的妻子的83名奴隶中就有33个是埃及人。② 正如2.4节所讲，这些奴隶只在人身上属于主人，为主人做那些非农业生产性质的劳动，如家务、纺织等等；同时他们还得为国家耕种自己的份地，缴

①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24页。

②《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3页。

纳高额租税。他们的处境或许比一般的奴隶更为困难。两条毒蛇紧紧地盘缠在他们身上，国家的税吏每年要向他们纳税，吸取了他血汗的大部分。奴隶主则对他们那枯瘦如柴的身体进一步敲骨吸髓。他们要卖地则要寻找机会（这毕竟是非法的）。所以很多农民一旦有条件，就开始抛弃家园逃亡，到城市中作为城市贫民。他们宁肯成为无家可归沿路行乞的流浪汉，也不愿变成为身戴这双重剥削枷锁的奴隶。在王朝末年经常可以看到大群流落街头漂泊异乡的农民。第六王朝末，普通居民破产已极为普遍，流浪的贫民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一个州长曾自夸从自己财物里把大麦和牛乳分给在自己州内发现的一个饿汉吃，把贫民养在自己的地界。①

当大量农民陷于这种特殊身份的奴隶或逃亡作为城市贫民时，就为贫民奴隶大起义提供了条件。个别官僚和神庙的救济和慈善事业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国家拥有的耕地和农民在整个经济中已经不占主要地位了。国家诺姆经济中残有的小农已经喘不过气来。国家再也无力组织大规模的公共灌溉工

①Miriam Lichtheim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Vol. 1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aperback edition 1975 P. 17, P. 24.

程。水渠废弃了，土地荒芜了，生产力降低，国王威信扫地，各地州长已成为大奴隶主，他身下拥有大量属于他个人的管理人员，中央既缺乏神的权威，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继续给神庙祭司们以赏赐，以神的权威来号令地方。这时必然出现3.1节所讲的两种倾向：地方割剧势力猖厥，各地州长不再听命于中央；农民陷于赤贫者、特殊奴隶身份者越来越普遍，城市贫民已成为使整个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广大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动乱的狂风暴雨也就日益临近。

3-4 王朝瓦解的两种方式和修复机制

为了研究古埃及王朝更替的规律，我们将古埃及王朝瓦解和中国封建社会王朝崩溃作一对比。中国封建社会几乎每一个王朝都被农民大起义推翻，王朝更替总是伴随着整个社会大动乱。古埃及王朝瓦解的方式却是多种多样的。一般说来，古埃及王朝更替有着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与中国类似，出现全国性大动乱；另一种则是近于连续的和平过渡，神庙废除一个旧王朝宣布一个新的王朝开始。

从目前保存下来的材料分析，很可能第五王朝变为第六王朝、第十一王朝变为第十二王朝，都是近于连续的和平过渡。非常奇怪，古埃及王朝变迁这两种方式是周期性交替出现的。第五王朝灭亡时，没有出现全国性动乱，但第六王朝末却爆发了大起义。十一王朝灭亡十二王朝建立几乎是一种和平过渡，但十二王朝却是被全国性贫民奴隶起义推翻。古埃及王朝更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一张一弛的节奏？

王朝的倾覆是被无组织力量瓦解。旧王朝灭亡后，新王朝要建立稳定的秩序，必须清除破坏旧王朝稳定的无组织力量。在古埃及历史上三十个王朝中，不少王朝十分短命，比如第七王朝只存在了70天，共换了70个法老。① 第八王朝所辖区域仅限于孟斐斯地区，而全国则是一片混乱。这些王朝只是名义上建立。它们由于内部无组织力量强大，不能维持稳定。因而研究一个王朝瓦解方式以及新王朝建立的途径，必须认真分析某一个王朝是被那一种无组织力量瓦解的。新王朝只有消除瓦解旧王朝的那种无组织力量才能在旧社会的废墟上修复。不同的瓦解方式对无组织力量的杀伤也大为不同，这

①威廉·兰格主编：《世界史编年手册》古代和中世纪部分上册，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63页。

样一来，王朝修复方式也和无组织力量有关。

为了讨论方便起见，我们分别将3.1节中所讲的五种不断增长的倾覆王朝的因素称为五种无组织力量。第一种无组织力量的增长表示法老世俗化。第二种无组织力量用来度量官僚机构腐败程度。第三种无组织力量代表神庙膨胀和失控。第四种无组织力量是地方割据势力。第五种无组织力量是大、中、小官僚奴隶主阶层形成，大量农民陷于奴隶、佃农地位，成为赤贫者。这五种无组织力量增长速度是不同的。大约第一种增长得较快，第二、三种次之，其余两种增长得较慢。一般说来，五种无组织力量中只要一种足够大，就可以使一个王朝瓦解。在古埃及三十个王朝中，这五种无组织力量的增长互相影响，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使得旧王朝瓦解和新王朝建立的方式多种多样。

王朝瓦解方式取决于它内部哪一种无组织力量最大，谁最先破坏社会结构的适应性。一般说来，社会整体结构总是从那些最为脆弱的连接点断裂的。古埃及社会最脆弱的是神权官僚政治体系中的中央权力。整个统一社会虽然拥有数以万计的官吏，实际上它始终具有地方联盟的性质。州长作为地方最高长官，又是大贵族，身兼“军”“政”

"宗教祭司"三种权力，他们的世袭地位很容易使州变为独立王国。因此，统一能否维持关键在于法老是否有神的权威。祭司一旦和王权貌合神离，法老神性丧失，地方势力马上会不再听命中央，王朝即告解体。因此，最先破坏社会适应性的常常是第一种无组织力量。它增长速度最快，而且受第三种无组织力量的影响。很多时候，神庙祭司力量（第三种无组织力量）增加到一定程度，虽然神庙拥有的地产还未占主导地位，破坏国家诺姆经济，但由于神庙和王权的冲突已十分激烈，使法老威信下降，神性减弱。这时，王朝统一再也维持不下去了。这时出现改朝换代。由于瓦解王朝的只是第一种无组织力量，改朝换代方式是和平的。整个王朝是否被贫民奴隶大起义推翻，取决于第五种无组织力量大小。而第五种无组织力量大小又和第二、三种无组织力量有关。当第二、第三种无组织力量中一种足够大时，第五种无组织力量一定很大，都足以引发贫民奴隶大起义。比如第四王朝末，第二种无组织力量很大，第三种无组织力量不很大，大动乱由官僚机构腐败引起。有的王朝，第二、三种无组织力量都很大，社会危机更为深重，这时旧王朝末期的大

动乱更为激烈，历时更久。*

很可能，第五王朝过渡到第六王朝，第十一王朝过渡到第十二王朝，社会之所以没有出现大动乱，乃是因为瓦解第五王朝和第十一王朝的只是第一种无组织力量，其余四种无组织力量均不很大。神庙出面再次宣布新任法老具有神权，通过和平手段改朝换代，不再具有神性的法老被替换，第一种无组织力量在新王朝初建时被消除，新王朝能稳定地建立。但是这种和平的改朝换代同时也埋下了灾难的种子。和平修复虽然消除了第一种无组织力量，但难以清除其余四种无组织力量。这些无组织力量在旧王朝灭亡时虽未大到危及王朝稳定的地步，但也具有相当的数量。在新建王朝中，必然加剧发展。到这个和平修复王朝的末年，它必然十分严重，因为它是两个王朝危机累加的总和。五种无组织力量同时很大，社会大动乱也就不可避免了。

从表 3-1 可见，第五王朝经历 149 年，第六王朝经历164年，第二、第五种无组织力量虽然增长速度比第一种无组织力量慢，但通过313年的积累，数值必然十分惊人。同样，第十一王朝和第十二王朝共历时347年，社会结构必然被五种无组织力量同

* 后面将谈到它导致出现中间期。

时破坏。这时候，势必只有大动乱的狂风暴雨席卷整个社会，才能清除几百年来日积月累的无组织力量。因此，在古埃及我们总是可以看到王朝两种不同的瓦解方式周期性地交替出现。

对于那些被五种无组织力量瓦解的王朝，出现全国性大动乱，贫民奴隶大起义对五种无组织力量来了一个总清算。这些王朝灭亡之后修复的王朝一开始五种无组织力量都很小，它的后期只有第一种无组织力量增长最快，其余四种较小，这些王朝往往可以通过和平方式改朝换代。历史证明，第五王朝、第十一王朝都是经过大动乱修复的。据狄奥多洛斯讲，第四王朝末年，人民起义了，把一些国王的尸体从金字塔中抛了出来。① 而第十一王朝能够修复，也是以第六王朝灭亡后整个社会经历141年的大动乱，彻底消灭各种无组织力量为前提的。*

关于贫民奴隶大起义怎样消灭各种无组织力量，古埃及很多文献中有形象的记载。一个名叫安虎的祭司曾这样描绘过大动乱时社会的状况。“我

①阿甫基耶夫：《古代东方史》，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21—222页。

*从第六王朝灭亡到第十一王朝建立，经过141年。在这段时间第七王朝、第八王朝、第九王朝和第十王朝都是不稳定的（或没有统一全埃及）。

沉思着大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变化发生了，与往年不同了。一年比一年困难了，国内叛乱了。国家蒙受创痛，到处在忧伤。许多州和城市陷于悲哀之中，国家正在遭到破坏——不正当的行为（甚至）出现在保密议事室中，神的计划常被干扰，他们的仪式被忽视。全国大爆乱，听候命令的人发布命令了。”① 目前保存下来的关于第六王朝和十二王朝灭亡时大动乱的文献，主要是《伊浦味陈辞》、《聂非列尔胡预言》等资料。这些资料清楚地表明贫民——奴隶大起义时，起义者对这五种无组织力量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扫荡。

起义者首先冲击的是以法老为首的官僚机构，《伊浦味陈辞》中多次讲到：“三角洲在哭泣，因为国王的粮食已经成为一切人的财产。”“所有的公务员已经不在其位了，人们好象失去自己的牧人而受惊的畜群一般。……国内的官长们还以逃跑自脱。他们甚至找不到施舍。宫廷人已经从王家被赶走了。”“审判厅的法律纸卷已被抛出，在十字路口，人们就在那纸卷上行走了。审判官被赶到国内

①刘家和主编：《世界上古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页。《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9页。

各地去。”在法老和神权官僚机器被砸烂的同时，贫民——奴隶起义者对大大小小的官僚奴隶主也来了一个总清算。一切都颠倒了过来。“女奴隶正在祭拜阿玛刻物体”。而“贵妇人……正在逃跑”，“那本来没有财产的人，已变成财富的所有主了”。“本来受管理的人，却已成为奴隶的所有者”，“国内的庶人已经变成富翁。财富的所有者却变成无产的人了。”① “贵妇们在丈夫被杀后也被赶到街头，卖掉孩子来换取食物。”或者逃到沙漠里，象书中所描写的一样：“他们象野兽一般地过活。”②

古埃及历史上，当古王国灭亡后，中王国能走向繁荣，中王国被无组织力量吞没后，新王国能再次走向兴盛；首先应归功于贫民——奴隶大起义打击了无组织力量。大动乱使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土地问题在新王朝初建时比较缓和。“那本来不是为自己耕种的人们现在可以得到收获了。”“而从前财产的所有者则是一无所有的人。”③ 随着大大小小官僚奴隶主大地产被起义者消灭，国家又能将那些曾

①③R·D·福克纳：《一个埃及贤人的训诫》（又名《伊浦味训诫》、《伊浦味陈辞》）载《世界史译丛》1980年第2期。

②A·费克里：《埃及古代史》 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1页。

被神庙和官僚奴隶主吞并的土地分给自耕农，重建国家诺姆经济结构。并且，法老又可以将大量无主荒地赐给新的官僚和神庙，重新使用这一巩固神权官僚政治的调节手段。这时一切又能象上一个王朝那样重新开始。但是我们还必须解决一个逻辑上的困难，这就是大动乱后王朝修复机制问题。

3-5 两个中间期和轮换主神的原因

古埃及社会的政治组织是建立在神权基础之上的，因而对统一神的信仰是王朝改建必不可少的条件。否则即使无组织力量得到清除，但如果神庙已经被焚毁，某一个主神由于他的代理人在旧王朝末期作恶多端而失去人们的信任，整个社会将没有统一信仰或没有体现这种信仰的机构。这时要重新建立神权官僚政治是十分困难的。如果旧王朝瓦解时，没有出现大动乱，或者虽出现贫民——奴隶起义，但起义者的矛头主要针对法老和官僚机构，而没有对准神庙，那么神庙可以充当神权官僚政治的修复机构。由神庙推选法老就是例子。但如果在整个社会大动荡中，连神庙都遭到扫荡，人们对某一个神

失去了信任，神庙就不能起到修复机构的作用了。

那些被五种无组织力量吞没的王朝的末年，各种社会问题堆积如山，官僚奴隶主和神庙祭司们如毒菌一样附在腐朽的国家机器之上，全体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敬神”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人们再也不对腐朽的神庙抱有敬畏之感。

希罗多德曾讲过一个故事，很能反映这种关头古埃及人的情绪。据说，“从布头城有一个神托送到法老美凯里诺斯这里来，说他只还有六年的寿命，而在第七年一定会死。国王认为这太不公平了，于是便把一名使者派到神托所去谴责神，抱怨说他的父亲和叔叔封闭神殿，不敬神并蹂躏世人却活得很久，而他这样一个十分敬神的人却是短命的。但是从神托所却来了第二个神托，这个神托对他说，他所做的善事正是他短命的原因，因为他是违反天命行事的；埃及注定要受150年的苦难，这一点他前面的两个国王知道，然而他本人却不知道。听到这话之后，他知道他的命运是确定了。于是便下令制造许多烛灯，每到夜里就把他们点起来，饮酒作乐。他昼夜不停地饮酒作乐……目的是打算把黑夜变成白天的办法，把他的六年变为十二

年，从而证明神托的虚妄。”① 古埃及人很迷信，但这个故事却反映出一种对神普遍的不敬。这是大动乱来临前社会的普遍心理，统治阶级由于社会危机难以克服每天饮酒作乐，认为这是埃及命中注定的灾难。而广大人民则对法老、神庙和官僚们的荒淫无耻表示极大的愤慨。苦难使他们动摇了对神的信仰，现有一切社会机构在他们眼中都失去了神权的性质。

这样，大动乱一开始，神庙必然被起义者扫荡。在那些有关大动乱的文献中多次提到：“不信神的人。”《伊浦味陈辞》足足有一长段是号召恢复宗教祭祀。可见当时一切全国性的宗教活动都已停顿，大多数神庙都荒芜了。打击神庙，对于消除无组织力量来讲，是达到了目的。但是它很可能意味着出现可怕的精神真空。统一的社会结构从此再也修复不起来，社会瓦解成一些碎片，它可能导致古代文明的灭绝。然而在古代埃及，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旧王朝灭亡后，不管多么困难，新王朝总是能重建的。这里，古埃及的以一神为主的开放性多神教（崇拜）以及它特殊的诺姆结构也许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①希罗多德：《历史》2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335页。

我们在第二章指出，古埃及每一个诺姆都有自己崇拜的神。当统一王朝存在之时，这些地方神是不重要的，统一信仰由全国性主神来维系。但一旦主神地位动摇，主神的神庙被动乱荡涤，全埃及又分裂成若干个诺姆，这时每个诺姆所崇拜的地方主神就十分重要了。这些小神庙在社会统一时期，由于不占主导地位，它的规模不很大。从表3-4(2)中可以看出，那些地方性小神庙所占土地、地盘、劳动力都是不大的，其腐化程度也远比大神庙轻。他们所受动乱的冲击比较小，因而在大动荡后都保存了下来。只要这些地方主神尚有力量，那么根据古埃及开放性多神教的特点，这些地方主神中的某一个就必然随着那一地方势力的强大而被推为全国的主神，整个神权官僚政治结构就可以恢复。埃及的诺姆和开放性神教承担了王朝修复的模板功能。它保证当某一主神被无组织力量吞没、动乱打击了这个主神的地位时，另一些地方主神有可能取而代之，成为新王朝的全国崇拜的主神。

古埃及各王朝主神形态的变迁为这种分析提供了证明。表3-5是各个统一王朝的主神。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各王朝的主神名义上都是太阳神，但名字和形象却是不同的。如荷鲁斯是鹰，拉是蛇，而阿

表3-5　各王朝主神变化

王朝名称	全国主神名称
第一王朝	荷鲁斯
第二王朝	塞特神
第三王朝	荷鲁斯
第四王朝	荷鲁斯（拉）
第五王朝	拉
第六王朝	拉—阿图姆
中王国各朝	阿蒙
新王国各朝	阿蒙

蒙的形象却是人。初一接触古埃及史料，都会很奇怪，为什么同是太阳神，但神的名字和形态却不同？实际上，任何一个诺姆的地方神一旦成为全国主神时，都必须成为太阳神；但他尚未成为主神时，仅仅是地方神，而地方神的形态是不同的。他们有的是动物，有的是人形的。主神形态的变化大约证明了主神由某一地区地方神演变过来的机制*。当旧王朝瓦解后，全国主神消失，那个势力

* 古埃及法老象形文字的变化也明显地反映了主神的更换，见本书附录二。

最强大的地方神随着这个诺姆征服其他地区，就成为太阳神。于是这个新的主神的形象往往是双重的，既保持了原有形象，又具有太阳神的形象。必须指出，一个新王朝的主神可以和旧王朝的形态不同，但并不是每一个王朝主神形态都一定不同。新王朝的主神形态取决于它是怎样修复的。当由神庙祭司集团修复王朝时，主神当然不会变化。即使旧有神庙被摧毁；如果新王朝修复是在一二百年之后，修复王朝的地方势力所在地与旧王朝一样，那么主神仍是不变的。比如古埃及从中王国到新王国各朝主神都是阿蒙，基本上没有变过。关键在于阿蒙是底比斯地方主神，只要是这一地区的地方势力最后修复王朝，那么阿蒙神仍旧被奉为主神。

我们认识古埃及王朝颇为复杂的修复机制后，就可以理解三十个王朝变迁中的一些疑难问题。表3-1所记载三十个王朝变迁的三千年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存在着两个中间期。一个是第六王朝灭亡后到十一王朝建立之前，这个中间期长达141年。第二个中间期是第十二王朝灭亡到新王国十八王朝建立，第二个中间期更长达219年。在两个中间期，埃及一片混乱。即使建立起来的王朝也都是不稳定的。似乎王朝修复遇到了某种困难。为什么有这两

个中间期呢？

我们知道，无论是第六王朝还是第十二王朝末年，都出现了全国性贫民——奴隶大起义。起义之猛烈，在埃及历史上是少见的。据一些学者估计，这两次大动乱每一次都起码延续了半个世纪。可以想象，大动乱对无组织力量的摧毁是多么的彻底。不仅人口大为减少，并且全国性主神神庙势力也基本上被摧毁。动乱对国家诺姆经济上的打击尤为严重。因而要等这些诺姆中某一个诺姆经济上强大起来，它的主神再形成为全国性主神，肯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第二个中间期由于从亚洲来的外族人——希克索斯人的入侵，持续的时间较第一中间期更为长些。

那么，是不是每逢全国性大动乱，就一定会导致中间期呢？不一定，关键看旧王朝灭亡时全国性神庙是否腐朽，贫民奴隶起义打击对象是否包括神庙。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第四王朝末的大动乱。当时，无组织力量主要表现在官僚机构腐化，起义的矛头主要针对法老和官僚机构。当时拉神的势力刚刚兴起，它成为全国性神的时间尚不长，第四王朝灭亡后，还没有腐化。从史料上看，拉神神庙在动乱中没有受到打击。因而第五王朝修复很快。动

乱后拉神一下子上升为全国最重要的主神。第四王朝一旦被起义者推翻，拥有巨大势力的希利奥波里的太阳神拉神庙，马上推出一位祭司当法老。近年来，一支埃及和澳大利亚的联合考古队在开罗西南的萨卡拉地区发现一批古墓，古墓的墓壁文字证明，第五王朝的创建者尤塞尔长弗法老正是一名祭司①。当时，“祭司们制造了一种预言说，法老的王位将传给太阳神拉的儿子；说来惊人，这个儿子是奉祀拉的一位祭司妻所生。”②可见祭司们早就为他们改朝换代准备了舆论。只要旧王朝一垮台，控制着全国信仰的拉神庙马上可以在混乱中恢复秩序，完成王朝修复。

只有当全国性神庙都已腐朽时，才会导致不稳定的中间期。第六王朝末和十二王朝末，全国性主神的神庙已被无组织力量吞没，随着王朝崩溃，它们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大动乱中差不多全部被摧毁。那些地方神不可能一下子就变为全国性主神，而且，当时每一个地方割据势力都很弱小，他们发展壮大势必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因此，这两次社会大动荡在

①符福渊：《世界上最早的女大臣》，载1984年2月27日《光明日报》。

②莱昂内尔·卡森：《古代埃及》，纽约时代公司1979年中文版，第96页

埃及史上导致两个不稳定的中间期。但是经过两百年的动乱和灾难后，古埃及王朝还是再次得到修复，它足以表示古代文明令人惊叹的生命力。这种死而复甦的能力也许是古埃及文明所特有的，它使古埃及社会结构在繁花似锦的远古文明中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特例：它是一个超稳定系统。

第四章

又是一个超稳定系统吗

呼唤死者的名字就能叫他再生

——古埃及格言

4-1 古埃及社会的停滞性

1917年，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来到埃及，经过整整六年的寻找，他终于在埋葬着三十多个法老的“帝王之谷”，打开了古埃及法老图坦阿蒙陵墓的石门。这一发现一下子轰动了世界。图坦阿蒙是古埃及史上以宗教改革著称的法老埃赫那吞的女婿。他大约于公元前1361年登基，当年仅10岁，他死去时才19年。这一发现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古埃及法老的金字塔大多都被历代盗墓贼掘盗过，有的早已被洗劫一空，而这一陵墓虽然在图坦阿蒙死后十年也被盗劫，但马上又被封好，并被乱石所掩盖，一直保留到现在。当考古学家打开墓门，他们的手碰到那些三千年来没有人碰过的“奇

形怪状的动物、雕像和黄金”时，不由心中万分激动。一位历史学家很形象地描绘了那些打开一层又一层法老棺椁的科学家的心情：“有一会儿”，打开这些古老棺椁的考古学家想到：“人类生命中的要素——时间已经失去了意义……你所呼吸的特殊空气多少世纪以来并未改变，还是安奔图坦阿蒙王木乃伊的人呼吸的。”①

研究古埃及社会，人们常常会有这个考古学家同样的感觉，在古埃及也许时间确实没有多少意义，这个社会最令人惊异的特点是几乎一切都是一成不变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当缓慢，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尼罗河河谷地区已是人类生产力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但是二、三千年过去了，这个地方生产水平增长仍不显著。后面插表4-1给出从古王国到新王国末期二千年来的一些指标。从中可以看到，古埃及的农具两千年来除了犁的改进外，似乎没有显著变化。而一直到新王国时期，埃及的青铜器才取代石器，古王国和中王国这近千年中一直处于金石并用的时代。在这一段时间中，其他地区的古代文明却大踏步地向前，进入了铁器时代。虽然，尼

①戴礼进：《图坦卡芒之谜》（现一般译为图坦阿蒙），载《西亚非洲》1980年第5期。

罗河河谷内缺少铁矿，但从中仍可看出，生产技术进步的缓慢。另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商品经济发展缓慢。中王国初期，埃及已进入文明社会一千多年，但仍停留在物物交换的阶段。一直到新王国时期，真正的货币仍没有出现。而在这段时间内，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城邦虽起步较晚却很快形成了一个个商品交换的中心。古埃及社会似乎从进入文明后就停滞了！正因为如此，人们经常把古埃及社会比作法老的木乃伊，静静地躺在金字塔中，抗拒着迅速流过的时间。古代的习惯、生活方式、耕作技术，甚至修建金字塔的方式，都是一代传一代，很少改变的。

关于古埃及社会的停滞性，从希罗多德到近代，很多学者都谈到过。但是，大多数人们都倾向于用古埃及人的保守来解释社会发展的停滞。希罗多德认为古埃及人天生保守，“他们遵守着他们的祖先的风习，并且不在这上面增加任何其他的东西。”①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也明确地运用这一观点来分析那些影响古代社会进步的因素。他说：“我们应当指出，最足以使罗马人成为世界霸主的一种情况，就是在他们经常不断地对一

①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09页。

切民族作战的时候，他们只要看到比自己更好的习惯，他们立刻就放弃了自己原有的习惯。”①

我们认为，把古埃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缓慢归因为古埃及人保守，归因为他们死抱过去的习惯不变，这种观点既不公正，也缺乏事实根据。就拿他们信仰的主神名称来讲，从古王国开始到新王国，就是经常变化的。这种信仰主神变化的高频率，似乎在其他古代文明中很少看到。据一些人认为，十八王朝时，埃及视亚洲人生活习惯为蛮俗，但到了十九王朝，上流社会便盛行亚洲生活方式。拉美西斯二世的女儿取闪族的名字，叫阿纳特（Bint—Anath），意为“阿纳特神之女”，此神是叙利亚的女神。② 由此可见，古埃及社会习俗也和其它社会一样，处于永恒的流动之中的。

另一些学者则用与世隔绝来解释古埃及社会的停滞性。这种观点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尚不能自圆其说。古埃及社会从公元前4,000到古王国这一段时间不是停滞的。正是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尼罗河河谷中，出现了最早的文明社会，一个个诺姆城市国家

①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

②冯祚民编著：《西洋全史》第2卷，台湾台北市燕京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出版，第198页。

在几百年中迅速形成统一的王国。这一段时间中，埃及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社会组织以及宗教观念都来了一个大飞跃。历史证明，停滞似乎是出现在第三王朝建立到新王国这一段时间。

我们认为，社会生活是一般发展的洪流，没有一种古代文明能象木乃伊那样躺在金字塔中经历三千年的沧桑不变。无论一个民族怎样保守，时间都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任何一种传统，随着老一代的去世，新一代的出现，都会有所改变。经济生活更是这样。前面提及古埃及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缓慢，一直到新王国时期，仍处于物物交换阶段，但绝不能讲古埃及社会的商品经济在二千年中从没有发展。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古埃及人没有发明货币。近年来，一些考古资料证明，在古埃及某些时期，商品经济是发达的。考古学家在发掘古埃及的孟斐斯城时居然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广告，那是二千五百年前的事。前不久，在土耳其发现三百块刻有希腊字母的碎片，将其拼起来，居然也是一个写着当时古埃及商人出卖商品的广告，上面写着："水果、酒、装饰品、头巾、陶器……等。"①

①1984年5月18日《参考消息》。

实际上早在古王国末年，古埃及的整个经济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各种文献中都曾提到过很大数量的用于交换的各种各样的货物。甚至还出现了钱，其形式是金属块。在史料中也常提到去外国进行贸易①，或许原始形态的货币最早是在古埃及出现的。当时手工工场已具有了相当的规模。那么为什么古埃及商品经济一直停留在相当幼稚的形态呢？关键在于随着第六王朝的灭亡，整个社会陷于大动乱之中。这场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大地震扫荡了城市，破坏了灌溉系统，死伤了大半人口。接踵而来的又是第一个中间期近百年的各州分裂割据，和频繁的交战局面。在长期动乱中，整个社会物质文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甚至倒退了上百年。新的发明在动乱中被遗忘，大城市成为一片废墟。一个个诺姆各自满足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交换已没有意义。因而古王国已经出现的货币也就不会进一步发展。大动乱结束后，中王国刚开始时，其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灌溉系统，手工作坊规模都退回到古王国时期，商品又采用了物物交换的形态。随着社会趋于安定，经济又进入另一个由复苏到发

①阿·尼·格拉德舍夫斯基：《古代东方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119页。

展的循环周期之中。通过三百年的积累，到了中王国后期，商品经济又得到一定程度发展，货币再次出现。但第二个中间期的大动乱再一次破坏了经济的发展，致使中王国末期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因素再次差不多被毁坏殆尽。新王国初期整个社会又处于以物易物的阶段。因而，在古埃及一直到新王国以后的后期王朝，特别是希腊化时期才真正出现货币和商品经济，然而这时二千多年已过去了。

同样，灌溉工程、工具的发展，以及手工业生产规模也无一不是处于发展→停顿→衰退→重新发展的循环之中。古埃及社会之所以停滞，并不是说整个社会生活是一潭死水，而在于古埃及社会结构处于周期性的崩溃和修复之中。在《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中，我们曾把社会结构比作一只赫胥黎之桶，而把生产水平和丰富的社会生活比作装在这个桶中的各种东西。古埃及社会同样是这样一只有生命的赫胥黎之桶。社会结构规定了桶的容量。在任何一个社会的稳定时期，各种新事物生长，各种变化倾向不可抗拒，它们如同蜜蜂酿蜜一样在这只赫胥黎之桶中滋长起来，一直到填满这个桶为止。但是作为社会的进步，还要求当旧有社会结构瓦解时，一个新的容量更大的社会结构将其取

而代之，并且取代过程要尽可能地近于连续和平稳①。这样随着赫胥黎桶容量的增大，我们才能看到生产力的稳步发展。然而古埃及社会却不是这样，每随着一次旧社会结构的瓦解，社会进步因素和生产力就被摧毁一次，而且新建的社会结构是旧结构的翻版。尽管每个王朝的法老不同，信仰的主神也有差别，但是修复后的社会结构仍然是国家诺姆经济、神权官僚政治和以一神为主的开放性多神教组成的社会关系网，其容量并没有进一步增大。于是历经两千多年的古埃及社会，进步必然是缓慢的。

这里我们再次发现，一种古老的社会结构通过周期性的振荡保持着自己的存在，这和整个社会的停滞性必定是同时出现的。《兴盛与危机》一书把这种系统称为超稳定系统。古埃及社会也是一个超稳定系统。

4-2 另一种振荡机制

《在历史的表象背后》与《西方社会结构的演

①参见金观涛、唐若昕：《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变》两本书中，我们曾较详细地论述了超稳定系统造成社会停滞的机制。这类社会结构是通过周期性崩溃和修复来消除社会内部不断增长的无组织力量，保持某种社会结构在数千年中的长期存在，而生产水平也长期局限在这种社会结构所规定的极限之内。从王朝周期性覆没以及王朝瓦解后出现大动乱，进而通过社会振荡全面消除无组织力量以使新的王朝得以修复这些方面来看，中国封建社会和古埃及社会是类似的。但是，毕竟古埃及文明比中国封建社会要早上千年时间，它们的社会结构也是不同的。因而在社会结构的修复和不断消除无组织力量的具体机制等方面，古埃及必然有着自己的特点。

古埃及社会结构和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大差别在于：古埃及社会结构中存在着一个很明显但又是十分脆弱的物质文明外壳，我们在第二章曾指出，古埃及文明象是寄居蟹那样生活在一个人造的内环境之中，这个内环境主要是指灌溉系统（见图2.3）。中国封建社会也建立了庞大的灌溉系统。但是社会生存和发展对灌溉系统的依赖远没有达到象古埃及那种程度。2.1节表明，在古埃及，只要尼罗河河谷灌溉系统被破坏，那么无论这个社会结构

内部多么和谐，统一王朝都将无法维持下去。在古埃及社会中，整个社会结构和内环境的互相和谐是社会结构能够稳定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是，任何一种互相调节都必然会导致无组织力量的增长。埃及人年复一年汲水灌溉也是一种维持内环境稳定的调节措施。它肯定会造成某种无组织力量的增长。如果没有一种机制来克服这种无组织力量，古埃及社会结构能够保持三千年之久，那是不可思议的。

最近，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那些被称为“水利文明”的古代社会的灭亡和内环境的被破坏有关。我们认为破坏内环境的正是这种不断增长的无组织力量，其重要表现形式就是灌溉导致的盐碱化。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衰亡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两河流域也和古埃及一样，是人类最早的文明，同样生活在一个人造的灌溉系统之中。干旱的气候，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地形和水文条件必然要求人类控制洪水，建立灌溉系统，才能创造长期居住地，并生产一个庞大的社会所需要的足够的粮食。但对内环境年复一年的调节不可避免地造成无组织力量的增加。这就是灌溉带来的土地盐碱化。长期汲水灌溉，特别是水渠渗出的水和过份灌溉会造成地下水位的升高和土壤中盐分的积累。这种效应在数十年

中是难以觉察到的，但经过几百年，上千年的积累，却会造成悲剧性的后果。早在公元前1800年，史诗阿特腊希斯中就这样写道："黑色的田地变得白茫茫"，"平原铺垫上密密麻麻的盐层"。① 阿瑟班尼颇尔（公元前668—626年）曾说他已经"把盐撒布在他的敌人的田地上。"可见盐碱化对一个由灌溉系统组成的内环境的威胁。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盐碱化很早就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小麦和大麦种植面积大致相等。但到了公元前2500年，一千年无组织力量的积累使土壤盐分大大增加了，对盐灵敏的小麦减少到百分之十五左右。到了公元前2000年，小麦只剩下百分之二。盐碱化使小麦不能种植，大麦平均亩产也不断减少。表4-1是两河流域大麦产量，它们是逐年下降的。② 为了对付盐碱化的威胁，古代两河流域农民不得不采用休耕轮作，以及改种耐盐作物等办法，而这只能减慢盐碱化速度而不能克服它。整个两河流域的文明，不得不随着盐碱化向北移动，去占领

①Gunther Garbrecht：《古代水利工作——历史的经验》，载《科学对社会的影响》1983年第1期，第7页。

②Gunther Garbrecht：《古代水利工作——历史的经验》，载《科学对社会的影响》1983年第1期，第4—7页。

表4-1 社会结构演化的四种模式

时　　间	大 麦 产 量
公元前2400年	2,600公斤/公顷
公元前2100年	1,500公斤/公顷
公元前1700年	1,000公斤/公顷

那些未开垦的土地。未开垦的土地是有限的，迟早整个灌溉的土地要被密密麻麻的盐层所布满。两河流域这块哺育了古代文明，曾被誉为神话中伊甸园的地方，今天百分之八十的耕地已盐碱化，其中三分之一已无法耕作，成为一片不毛之地。虽然，我们还没法判定土壤盐碱化对两河流域古代文明的衰落起了多大作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建立在这样一个内环境中的古代文明迟早是要消失的。即使社会结构内部不断增长的无组织力量不吞没它，内环境的无组织力量也会使社会结构不能生存下去。

那么，为什么三千多年的灌溉没有导致古埃及内环境中无组织力量的增长？难道古埃及人的灌溉系统对环境没有任何副作用？这似乎是不大可能的，那又是什么原因使古埃及内环境保持数千年稳

定呢？这个问题直到本世纪修建阿斯旺水坝后才引起人们的重视。阿斯旺水坝修建后，人们虽然可以控制尼罗河水的泛滥，但埃及的整个水文体系遭到了巨大的破坏，过去数十个世纪没有盐碱化的土地居然开始盐碱化了！原来，尼罗河每次泛滥对埃及的土地都是一次冲洗。正如一位美国科学家所说：所有这些古代文明都由于同样原因而衰退了，即土地发生盐渍化以致作物不能再生长。当水从地面蒸发和通过作物叶面蒸发时，从地势高处土壤淋溶出来的盐分聚集在灌溉农田之中。虽然洪水、病虫害和战争给农作物带来损失，但最终是建立在灌溉基础上的文明由于土壤盐渍化而消失。在这个共同性的结局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即尼罗河河谷。这里直到近代并未“真正实行过灌溉”*。每年尼罗河洪水淹没了一大片辽阔的土地，年年淤积起一层新的肥沃土壤，使河谷逐渐延伸。洪水控制了盐分的积累，因为当水渗入土壤时，它溶解了土壤中的盐分并把它带入地下水中，而地下水最终又排入河道中，结果是土壤中的盐分多少自动地达到平衡。盐分一世纪又一世纪地被送入地中海中，在农业开

*这是指两河流域那种方式的灌溉。

始以前这种情况已存在数万年。①

也就是说，古埃及利用尼罗河的泛滥保持土地的肥沃，同时也消除了灌溉积累起来的盐分。水文学家发现，在埃及，水通过土壤渗透保证了全部淋滤作用。尼罗河的每次泛滥似乎都在消除灌溉系统中积累起来的无组织力量。埃及社会能在三千年中保持不变，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内环境的无组织力量得到定期清除。

将尼罗河的泛滥和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洪水对比是很有趣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虽然也有周期性泛滥，但它们发生在“错误的时机”。它出现于四月到六月，这对夏季作物来说太晚，而对冬季作物则过早。而且冲击平原斜度很小，水不易排除，土壤很容易浸满水造成盐碱化。因而在两河流域，泛滥并不能起到冲刷盐分的作用。泛滥的后果是破坏性的，只有人工控制洪水才能建立文明。但是通过控制洪水人类所取得的成功只是短期的，因为在建立对抗大自然的灌溉系统的同时，人类必然也在慢慢地破坏着内环境。

这些古代文明的兴盛是以它灭亡的命运作为代

①Arthur F·Pillsbury：《河流的含盐量》，载《科学》1981年11期。

价的。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发现了一个令人深思的事实：只要有调节，就必定有无组织力量的增长，即使对于环境也不例外。一旦内环境成为整个社会结构不可忽视的部分，人对内环境的依赖和控制变得相当重要时，这种调节也会导致无组织力量的增长。它也只有形成超稳定系统才能保持几千年不变。当社会所寄居的物质文明外壳的脆性不那么明显时，瓦解社会结构的无组织力量主要来自社会组织内部。这时，要在历史前进的洪流中长期保持这种结构，只有依靠社会结构一次次崩溃和修复来清除无组织力量。对于古埃及这种寄居在脆弱内环境中的超稳定系统，则需要多重振荡机制来保持它的存在。第一种振荡是社会结构中政治、经济等子系统适应性破坏带来的动乱，它打击各种腐朽因素，使社会结构可以重新修复。我们在第三章谈到的改朝换代和两个中间期古埃及社会由盛到衰再在动乱后重新兴起就导于第一种振荡。第二种振荡机制是尼罗河周期性泛滥，定期冲刷土壤中积累起的盐分，执行着保护内环境长期不变的功能。

4-3 涅杰斯、涅木虎和阿吞教

超稳定系统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各种新生的潜组织要素不能互相结合。尽管在这个文明成长的千百年中，不断有各种新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创造，但这些新因素不能形成新的社会结构，它随着每一次的旧结构的振荡、瓦解而遭到打击、变型，以至于消失。于是，在这个超稳定系统中，我们除了看到旧结构的不断瓦解、修复和对生产力发展的周期性杀伤外；还可以看到各种新因素、新社会思潮虽然会如花朵般在旧结构中开放，但最终随着旧结构的瓦解而凋谢。

商品经济是不同于国家诺姆经济的一种新因素。我们已经讲过，无论是古王国、中王国还是新王国的后期，商品经济都有了相当的发展。商品经济的萌发，不仅表现在城市人口的增加，货币和高利贷的出现上，还表现在一批中小非官僚奴隶主的崛起。在古王国、中王国末年，土地兼并十分厉害。我们在第三章指出，兼并者大多数属于官僚奴隶主集团，它们是破坏整个旧社会结构稳定的无组

织力量。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买卖也部分出现，这时就必然会出现由于个人经营有方或开荒等原因的致富者。一部分自耕农和城市的商人、自由民也有可能买到一些土地和奴隶成为奴隶主，他们不是旧官僚，但也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他们在社会上形成一个非官僚中小奴隶主阶层。对于古埃及社会来说，这是一种新的经济因素。

古希腊罗马文明中，正是这种力量成为社会组织的中坚。罗马帝国经济有两大支柱：一个是城市繁荣；第二个就是存在着大量中小自由民奴隶主。古埃及社会古王国、中王国后期，虽然城市很发达，也出现了一批和古希腊罗马文明中类似的中小自由民奴隶主，但是他们却不能成为新经济结构的组织力量。首先，古埃及的城市是政治统治的中心，它们更类似于郡县城市，并不能从旧社会结构中脱离下来独立存在。而且这些新经济因素在政治上、文化上没有代表，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上互相结合的新的潜组织。随着古王国、中王国的灭亡，大动乱的出现，大城市消失了，商品经济瓦解，这些中小奴隶主阶层也随之变型，最后在历史上消声匿迹。

在这里，我们提出在古埃及社会二千年的历史

中，曾多次出现过一些类似于古希腊古罗马社会中的组织成份和经济因素；只是他们不能形成新社会结构的组织因素而不得不一次次地被动乱所消灭或变型。这有没有事实根据呢？有！在古王国末年涅杰斯阶层的产生和变型就是例子。涅杰斯的原意是小人，和贵族相对立①。但是他们往往也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和奴隶，史学界公认他们是一个新的奴隶主阶层。在古埃及，由于大多数官僚，甚至祭司和书吏都是父传子袭的，因而，整个官僚阶层基本上也是一个世袭的贵族阶层。古王国末年，涅杰斯和贵族对立，可以断言，他们一定来自非官僚中小奴隶主。这个阶层的来源可能很复杂，有人认为，他们是从农村公社分化出来的富裕农民，靠开荒获得一定的土地；有人认为是发财致富的手工业者。不管他们的来源如何，有一点是明显的，只有当土地兼并和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这样一个阶层，整个古埃及社会的耕地是处于国家严密控制之中的，靠自由开荒获得土地也好，靠土地买卖成为奴隶主也好，都需要国家控制的放松和失灵，

①《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2页。

都需要相应的商品经济的繁荣为前提。这只有古王国末期才做得到。而大量史料正好表明，涅杰斯确实是古王国末才成为一支社会力量的。

古王国末期的涅杰斯虽然是一种新的经济因素，但它却是夹杂在无组织力量之中的，无论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找不到自己的代表。他们只能随着旧社会结构的崩溃而发生变型。古王国灭亡后，涅杰斯地位戏剧性变化形象地说明了潜组织要素在一个超稳定系统中的命运。第六王朝覆灭时，爆发全国性奴隶贫民大起义。大起义打击的矛头主要对准官僚奴隶主阶级，非官僚中小奴隶主阶层受到打击相对小一些。他们虽然没有在大动乱中被消灭，但是他们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大城市和商品经济的土壤却消失了。涅杰斯们成了无皮之毛，无本之木，他们不得不依附于各州长，大多数人投靠各州割据势力，成为诺姆军队的主要成分。在上百年的社会动乱中，他们完全脱离了商品经济的土壤。中王国统一后，他们中很多人就投靠法老，成为中王国时期官僚的来源之一。

在目前得到的关于涅杰斯的文献中，有很多涅杰斯成为国家官吏的纪录。比如那个著名的聂非尔列胡就是涅杰斯。聂非尔列胡预言中还提到一些当

官的涅杰斯。① 一个名提伊的自称自己成了国家的栋梁。很多涅杰斯成为国家的官吏，但地位低于贵族。② 一个名涅苏图蒙的人，自称是涅杰斯，后法老赐给他奖赏和荣誉，贵族在他前面弯腰。这些文献表明涅杰斯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政治势力。这似乎和我们前面讲涅杰斯在政治上找不到自己的代表相矛盾。实际上，必须看到，涅杰斯成为一种政治势力，成为法老用以维持国家统一的社会基础这是中王国的事情。中王国的涅杰斯和古王国末年的涅杰斯是不同的。古王国末期，涅杰斯阶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他们作为新经济势力，当然不能普遍地被吸收到国家官僚机构中去。但是到了中王国初，商品经济衰退，这些人虽然由于历史上的习惯，还叫做涅杰斯，但性质已经完全变了。当他们被组织进官僚机构时，在经济上已不代表奴隶制商品经济。只是简单地作为王朝修复时法老利用的一种统一力量。第十一王朝时期，一个名叫提伊的涅杰斯，曾直言不讳地说自己是"底比斯的栋梁。"③ 随

①《聂菲列尔胡预言》，载《世界古代史料选辑》上册，北京师范大学1959年版，第37页。

②参见刘家和主编：《世界上古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59页。

③参见刘家和主编：《世界上古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59页。

着商品经济的退化，他们已经蜕化为旧官僚机构的组织力量。除了血统外，他们和官僚奴隶主集团已毫无差别。随着他们一天天被织进神权官僚政治的大网中，他们必然也慢慢演变成世袭贵族。古埃及官吏的世袭制度是一架巨大的机器，只要有足够的时间，这些古王国的贫民同样可以成为一种有高贵血统的官员。果然，在中王国末期，我们几乎再也看不到涅杰斯和贵族的对抗。他们完全被官僚机构消化了。涅杰斯的命运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古埃及经济结构中新的潜组织要素不能形成新社会结构潜组织的悲剧。

如果某一种现象是历史规律的表现，那么它会反反复复地出现。在古埃及任何一个王朝，只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就必然出现一个非官僚的中小奴隶主阶层。他们在王朝末期出现，代表着新经济因素。但随着大动乱的来临，商品经济的衰退，他们也必然变型，最后蜕化为旧结构的组成部分。无疑对于中王国、新王国这一机制仍然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应该看到和古王国末年到中王国中期相类似的历史现象。果然我们看到了，这就是新王国的涅木虎阶层。涅木虎的原意是指孤儿、贫民、地位低下的人。这个词（Nmh）后来演变为贫穷的、体力衰

弱的、成了孤儿的、丧偶的涵义。涅木虎阶层的地位和涅杰斯十分相象。所不同的只是他们出现在中王国后期，而涅杰斯出现在古王国后期。涅木虎的命运和涅杰斯也如出一辙。在中王国后期，他们成为一种经济势力，但没有进入官僚机构。到了新王国时，却成了法老用于平衡贵族的力量。

周启迪先生在他的古代埃及史讲座上曾介绍过：十八王朝的一首赞扬阿吞神的颂词中讲："是造就贵族的神，造成了涅木虎的神……。"涅木虎有财产、奴隶，但和旧官僚贵族有一个差别，这就是他们没有高贵的血统。二十王朝的一个铭文中讲到："一个涅木虎叫勒涅菲尔，她与她的丈夫有四个奴隶，她的一个女奴与她丈夫同居而生下了三个孩子，她连同孩子的母亲一起将其收为自己的养子养女。"这表明，涅木虎比起世袭贵族来讲，不那么注重身份和血统。还有一些材料反映，许多涅木虎是经营王宫土地的。这些关于涅木虎来源的文献几乎都证明，他们和涅杰斯一样，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但在王朝崩溃时期，脱离了商品经济，投靠各诺姆。当某一个州长统一全国成为法老后，他们又成为和贵族对抗的力量，成为法老的官吏来源。在埃赫那吞改革时期，涅木虎和贵族神庙相对立，支持法老进

行改革。改革失败后，霍连姆赫布在阿蒙神庙祭司的支持下完全恢复了旧秩序，他一继位，就下令保护涅木虎。这说明了涅木虎阶层是王权依靠的力量，它与权贵、祭司们相对立。埃赫那吞改革失败后，权贵、祭司势力卷土重来，他们排挤扼杀涅木虎，而王权则为了集权的需要，一定要保护涅木虎，并免去涅木虎因种种原因欠的税，以便他们能继续为国王服务。《哈列姆黑布（即霍连姆赫布）赦令》的第一条就是保护涅木虎，① 使之不受贵族权贵的欺凌，违者分别处于劓刑、苦刑或流放。《马伊大臣墓铭》中纪录了一个涅木虎的自述："让我把君主对我做的好事告诉你们，你们将会说，啊，给这位涅木虎做的事多么伟大啊！我，按父母双方都是一个涅木虎。君王把我树立起来……"。② 在新王国时期，法老需要涅木虎的支持，涅木虎则需要君王的保护，这说明了他们是和贵族相对立的力量。新王国的历史同样证明：涅木虎只要一旦被织进神权官僚机构的大网中去，他必然慢慢演变为世袭贵族。所以，新王国后期，就再也看不到涅木虎和贵族的对抗了。

①②《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6页。

以上分析表明，涅木虎和涅杰斯除了出现的时间相差五、六百年外，其主要差别就是他们的名称不同。在这里，名称只反映了事物最初的来源。名称是世代凝固的，而事物却是变化的。涅杰斯、涅木虎的产生、消亡难道不是正好反映了起稳定系统中那些新的潜组织要素不能形成新的社会结构，必然被淘汰、变型的铁的规律吗?!

在古埃及，不仅经济结构中出现过一些新的潜组织要素，在意识形态结构中，也出现过一些新的潮流。十八王朝的法老埃赫那吞所提倡的阿吞教，大约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当代一些欧美学者，对埃赫那吞所进行的宗教改革，评价非常之高。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人类最早的一神教。有人甚至把它和基督教相提并论，认为“埃及人早在基督诞生前1500年，已经提出了上帝三位一体的概念。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奥西里斯、爱西斯和荷鲁斯三神的合一。”① 这些评价可能不尽妥当，但埃赫那吞在和神庙的斗争中，确实提出了“一神崇拜”的思想。这无疑是一次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重大变革。美国的埃及学者莱昂内尔·卡森认为：“纵使埃赫那吞建立他的阿吞

①埃及教育部文化局主编：《埃及简史》，三联书店1958年版。

崇拜，或者说清除别的神的努力尚未成功，他的尝试也标志着埃及宗教史上一个转折点。也许是因为要反对埃赫那吞新信条定于一尊的本质，也许是因为人民正向希伯莱人不久就要到达的方向摸索前进，埃赫那吞时代以后的宗教崇拜和从前比较，个人的成份（如表达个人愿望）多了许多。……一支从公元前十二世纪拉美西斯四世当政时期传下来的颂歌，有一部分是这样唱的：‘你应给我健康、生命与老年，使我长久当政、四肢有力……你应给我吃的……你应给我唱的……’。此时认为诸神不仅塑造宇宙，不仅反复无常地制造麻烦，也有责任关心他们创造人的福利，同情人类并答应人类的请求”。①

目前，我们并不能肯定十八王朝时，整个社会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是否发生了巨大的振荡，也不知道当时是不是出现了一股全社会性的新思潮。正如周启迪先生所指出的，一神教在当时是没有社会基础的，“在经济上，一直到新王国时期，埃及的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得还很不充分，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各地的经济联系还很有限……不仅铸币

①莱昂内尔·卡森：《古代埃及》，纽约时代公司1979年中文版，第80页。

没有出现，……当然不可能形成全埃及统一市场。”在政治上，每个诺姆文化上仍有很大的独立性，不能做到罗马帝国时那种“一切民族差别都消失了，地方和民族的自主性的最后残余被摧毁了。”在这种局面下，因此埃赫那吞的一神教不可能象基督教那样获得广泛传播并深入人心的社会条件。① 我们可以断定，阿吞教至多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结构中新因素的萌芽，它不能成为一种新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当时还没有与其相应的经济、政治结构中的潜组织要素）。这朵早开的一神崇拜之花是不可能结下果实的。埃赫那吞之后，古埃及传统宗教很快复辟。在以后的十几个世纪中，特别是当埃及文明开始走下坡路时，古老的动物崇拜又重新抬头，整个古埃及宗教如江河日下，从此一蹶不振了。到公元二世纪以后，基督教在整个地中海地区传播，并一天天征服人心。而在埃及，一小撮古代宗教的忠实继承者——那些人数一天比一天少的祭司们——躲在神庙中，悲哀地叹息着这曾经如太阳一样照耀了三千年的古代思想的死亡。他们是否想到，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埃及似乎也出现过一神教的种子。他们

①周启迪：《关于埃赫那吞改革的若干问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第25—34页。

或许根本记不起埃赫那吞那可贵的尝试，那企图使古埃及宗教向更新的境界升华的勇敢举动。然而历史规律有着自己铁的意志，如果一个民族不去接受那曾经给于他的机会；结果不去用新的创造去对抗那必然要来临的死亡；那么，旧事物的消逝只是时间问题，无边的虚无将把他们吞没。

4-4 社会演化四种模式

现在，我们对前面几章的内容作一简单的概括。第一章用自组织机制探讨了古埃及文明的起源。第二章分析古埃及社会结构，指出经济、政治、文化和内环境这四个子系统怎样在互相调节中保持社会结构的稳定。第三章指出，无组织力量增长在古埃及社会同样是不可抗拒的，它必然破坏社会结构的适应性。我们剖析了古埃及无组织力量的形式，研究了它怎样吞没一个王朝，并指出只有打击各种无组织力量，并具备一定的修复机制，新的王朝才能建立。而在本章我们证明了古埃及社会也是一个超稳定系统，指出古埃及社会王朝周期性崩溃不断破坏生产力的积累，潜组织要素不能互相结合形成潜结

构，使得古埃及王朝二千年中只能是旧结构不断崩溃后修复，它造成古埃及社会的停滞性。我们从古埃及社会的一系列扑朔迷离的历史现象中理出了一条线索。读过《在历史表象的背后》和《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这两本书的读者也许已经发现，虽然就社会结构而言，古希腊罗马社会，古埃及社会，中世纪的西欧，中国封建社会是不同的，但是关于它们的演化，似乎都遵循着一些最为基本的原理。这就是组织系统演化的规律。

系统演化机制表明，在没有外来冲击条件下，社会演化的首要前提是：原有社会结构各部分互相适应性慢慢被破坏；而旧社会结构稳定性的破坏都是因为功能异化和无组织力量增长。对于不同的社会结构，由于维系它存在的内部调节方式不同，功能异化的方式不同，无组织力量的内容及其增长速度也不同。当社会组织规模很小（如原始部落），功能异化和无组织力量增长往往表现为这些社会组织和环境之间不适应，有时还包括这些社会组织形态和人口之间的不适应。对于那些生活在灌溉系统和其他脆弱的人造环境（比如玛雅人在原始森林中建立文明社会，他们在密林中开出一些梯田和台地，这也是一种人造环境）中的文明社会，内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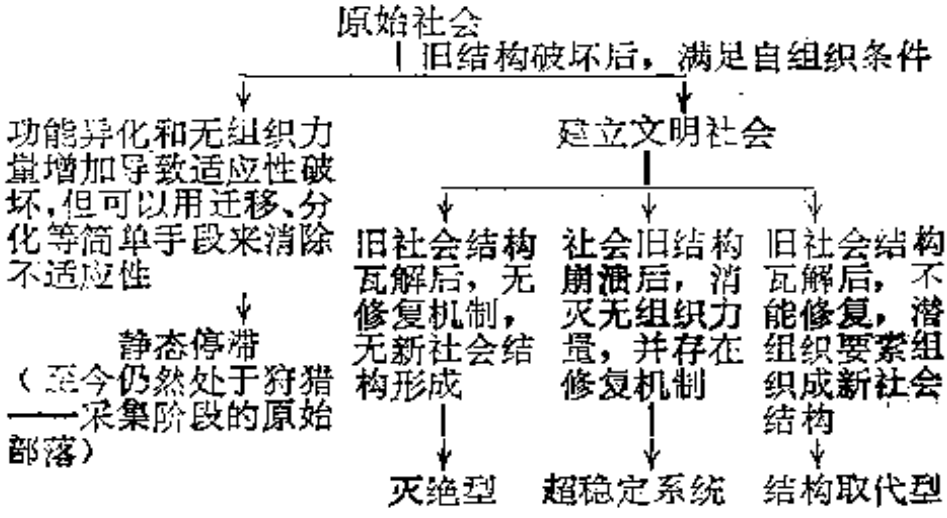


图4.1　社会结构演化的四种模式

中无组织力量的增长也是一种破坏旧结构适应性的重要因素。我们认为，可以从功能异化和无组织力量增长来概括形形色色社会结构内部适应被破坏的原因。理论根据是：无论社会结构怎样千姿百态，它都是一个组织系统，组织系统的维系必然离不开互相调节，但任何一种调节都有副作用，都会带来功能异化和无组织力量的增加。这样，对于任何社会结构，当没有受到外来冲击时，它的演化将取决于四种因素：

（1）内部无组织力量的大小和增长速度，它决定原有结构能否稳定地保持下去；

（2）是否形成潜结构，它是新结构取代旧结构

的中间环节；

（3）无组织力量在社会结构瓦解后能否清除；

（4）旧结构有无修复机制。

条件（3）和（4）决定旧结构能否修复。根据这四个制约条件，从逻辑上可以推出，当一个社会没有受到外来冲击，处于独立演化时，必定存在着四种最基本的模式（图4.1）。

第一种模式称为静态停滞型。当一个社会内部无组织力量增长极慢，或旧结构适应会很难破坏时，演化就呈静态停滞。一般来说只有那些组织规模很小，极为简单的社会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它专门是针对至今仍处于狩猎采集阶段的原始部落而言的。第一章讨论了尼罗河河谷地区的特殊条件怎样有利于打破各个原始部落的保守性，从而引发自组织机制。作为一个反面对比，我们考察了那些至今仍处于狩猎采集阶段的原始部落。在这些原始小社会中，很可能存着一种简单的方法来克服自己和环境、部落组织之间不断增长的不适应性。比如用迁移、控制人口等办法克服无组织力量的积累，使得这些小社会结构从整体上不被无组织力量破坏，这样原始的社会结构就长期保持稳定。人们不会也没有必要去创造新的社会结构——文明的大厦，这些

部落长期静态停滞在狩猎采集阶段。

另外几种类型指文明社会的演化模式，第二种就是超稳定系统。旧社会结构瓦解后，存在着修复机制，但没有潜结构可以取代它。停滞性和社会结构周期性崩溃和修复同时出现。中国封建社会和古埃及社会都是例子。

第三种模式是取代型。它是指当旧社会结构瓦解后不能修复，但存在着潜组织，潜结构能不断壮大最后取代旧结构。《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中以古希腊罗马社会为例，对这种情况进行了专门讨论。显然，在逻辑上看，这三种模式并非穷尽一切可能，还有一种模式在理论上也是成立的，这就是旧结构既不能修复，但又没有新结构可以取代它。我们将其称为灭绝型演化模式。

在前面几章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潜含着关于灭绝型文明可能存在的分析。我们在讨论古埃及社会修复机制时谈到过两个重要特点，一个是尼罗河定期泛滥周期性地清除内环境中不断增长的无组织力量，从而保持内环境的稳定。美索不达米亚的古代文明就不存在这种机制。那么我们自然可以问，如果一个古代文明，它是生存在一个脆弱的人造环境之中，当人造环境中无组织力量不可抗拒地增长

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在古代灌溉系统盐碱化一旦出现，要消除它是十分困难的。因而从逻辑上就可以导出，它必然带来这个地区古文明的毁灭。对于社会结构内部（主要指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结构）所积累起来的无组织力量的增长，也完全可能存在着类似的情况。我们讨论过古埃及的开放性多神教对王朝修复的作用。当旧王朝崩溃，大城市被动乱摧毁，由于祭司的腐化，使得对某一种神的信仰已处于危机状态之时，原有的宗教信仰很可能与这个社会同归于尽。在古埃及，王朝能够修复，关键之一在于开放性多神教。它的主神是可以轮换的，当祭奉某一个主神的神庙已经腐朽时，那些地方性的尚未腐化的神可以取而代之，即使存在着这种奇妙的修复机制，在两个中间期，更换主神的修复过程也走过漫长的道路。那么当这种修复机制不存在时，即使不出现环境问题，古代文明也常常面临灭亡的命运。

4-5 “灭绝型”文明的证据

这些理论分析能得到证实吗？二十世纪以来，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历史学家发现，有很多文明我们至今可能连它们的名字都不知道。它们在古代十分繁荣，由于尚不了解的原因灭亡了。文明似乎和生物一样，灭绝的比生存下来的要多得多。埃伯拉城的发现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1955年，一个农民在叙利亚沙漠里挖出一件用灰色玄武岩雕刻成的狮子。根据这一线索，考古学家进行了挖掘，找到了一个公元前三千年的青铜器时代农业定据点。现在人们已经认出了这些意义隐晦的碑上所写的成千的人名、地名、条例和指令，税款和纺织品贸易的帐目以及买卖契约。有一块碑上开列了70种动物的名称，另一块上写着260座古代城市的名字，这些城市，历史学家迄今还未听说过。据这些文献判断，埃伯拉城市在公元前2300年发展到顶峰。它统治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网，大商业城市里聚集了大约3万个商人、农民、官吏、工匠，还有一座学生人数很多的大学。埃伯拉还控制了30万人口的地区。有一块石碑记载了一座能贮藏足够1800万人吃一餐的大麦仓库。但是一个世纪后，这个文明衰落了，来自南方的敌人掠夺了它的财富，毁灭了城市。①

① 《埃伯拉——引起轰动的古代城市》，载《环球》1982年第4期第38—39页，美国《时代周刊》1981年9月21日。

许多辉煌的古代文明灭绝了，这一点在学术界并没有多少争议。很多学者认为，日前人类的文明是第三期的，而第一第二期的早期文明基本上都灭亡了。问题在于这些文明灭绝的机制。大多数学者谈到这些文明灭绝原因时，仅仅将其归为环境的破坏和外部入侵这两种比较单纯的因素。根据我们关于文明灭绝的模式，灭绝的因素可以来自文明内部。对于那些灭绝型文明，由于社会结构的缺陷，即使没有外部军事入侵，它也会灭亡的。人造环境的破坏无疑是古代文明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我们在谈环境问题时，是把它纳入对环境调节造成无组织力量增长这一机制之中的。它只是整个社会结构不断增长的多种无组织力量之中的一种。即使没有环境问题，只要经济、政治、文化结构被无组织力量一一瓦解；既没有新结构可以取代它，又没有修复机制，那么文明灭绝也是不可避免的。

近年来，一些考古新发现似乎为这种观点提供了证明。例如原来人们一直公认迈锡尼文明衰落的原因是因为多里安人的入侵。对古文明遗址的考古挖掘发现，这种说法很可能是错误的。多里安人入侵说的一个重要根据就是迈锡尼文明似乎是被火烧毁的。然而当时被认为是火烧毁的地点不过是八

个，其中真正被焚毁的永久废弃者仅四个，而它们又处于其他安然无恙的遗址之间。看来，多里安入侵说是不能成立的。① 实际上，当时希腊大陆文化中心正处于向外分散状态，外地的迈锡尼文化居住地有所增加（如在罗多斯岛，迈锡尼文化居住地由21个增加到了36个）。而本土居住地减少（据1970年所知，由328个减为137个）。大陆人口减少，中心力量削弱，引起四邻山居部落乘虚而入。② 所以，把迈锡尼文明衰落归为蛮族入侵似乎混淆了因果。很可能由于文明的衰落才导致蛮族的入侵，而不是野蛮部落的入侵毁灭了古代文明。

一位历史学家曾这样写道："世界上几个文明古国，看起来颇象几个小岛。在这些小岛周围，尽是蛮族形成的海。文明代表财富和舒适，野蛮代表饥饿和嫉妒。饥饿和嫉妒象海浪不断冲向小岛，小岛虽筑有堤防，但一旦堤防破裂，小岛即告淹没。"③这也许是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们认为，仅仅把古代文明看作一种抵抗野蛮的堤坝大约不太恰当。古代文明是一种跨地域组织，当它强盛之时，

①②日知、陈陶：《关于雅典国家产生的年代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

③杜兰：《世界文明史》，台湾台北市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62页。

力量比处于原始状态的部落大得多，只有当它衰落时，才有可能被蛮族摧败。真正促使古代文明由年轻强大到衰老的是不断增长的无组织力量。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很多古代文明确实是被另一些进攻性很强的文明毁灭的。我们仅仅是强调社会结构也和生命一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老化机制。在人类文明的森林之中，那些犹如虎狼一般掠夺成性的帝国为数不少。在虎狼成群的森林中，我们似乎是看不到一只老死的兔子的。因为兔子只要体力稍微衰弱，在老死病死之前已被吃掉了。虽然从表面上看来，很多文明是被其它文明军事力量所摧毁，但我们切不可忽略文明内部老化的机制。

这一点对于那些处于特殊地理环境中的文明，就很突出了。当一个古代文明处于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中，它是一个超稳定系统型还是灭绝型的文明就表现出来了。这时已排除了外来冲击，社会结构主要受其内部张力而变迁。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玛雅文明。玛雅文明大约在2000年前就出现了，在一种难以置信的环境中生存了很长时间。玛雅文明是在美洲原始密林中诞生的。它曾经有过庞大的城市，众多的人口，发达的古代技术。它的繁荣期是公元250—900年。此后，它放弃了宏伟的庙宇和宫

殿而转入密林。关于玛雅文明灭亡一直是一个谜。因为我们对玛雅社会结构至今还未搞清楚。

5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玛雅的经济结构极为简单。它和今天中美洲盛行的“密尔帕”休耕制类似。由于在密林中开垦土地，为了保持土壤的肥力，一块土地耕作过后，一般要弃置十年，让丛林重新遮覆以恢复地力。根据“密尔帕”休耕制可以算出每个农民都要拥有6—10倍于每年耕作的土地。而农民又需要住在自己土地的近旁。因此，这样的经济组织必定是地广人稀，社会组织也一定不复杂。于是一些学者认为，玛雅社会仅由两个阶级——祭司和农民组成。这种社会人口很少，剩余产品不多，因而贵族阶级人数也不多。根据这种分析，很难理解玛雅人为何有能力建筑宏伟的宫殿。由于社会组织简单，它似乎应该是静态停滞式的。而玛雅文明为什么会经历兴盛、衰落、最后灭绝，就不可理解了。

七十年代初，考古学家终于发现，用今天中美洲近于原始部落中盛行的经济结构来想象玛雅文明是错误的。这种“密尔帕”经济很可能是古代文明崩溃后的遗物。因为在玛雅低地发现了人工台地。它证明：“这里有一年几熟的聚约农业这种生产方

式。花粉分析表明，这里曾种植过玉米和棉花。”①接着，又发现了低地中部的山坡梯田。这些土地曾长期精耕细作，曾经有很大一部分劳动力用于这些梯田的维修。这些田地足以维持城市的存在。据考证，当时较大的城市提卡尔也许超过十万人，社会结构也十分复杂。即使对玛雅人的宗教，最近也有了很多新的看法，“原先认为泛神的、温雅的玛雅宗教，现在证明是兽性的，邪荡的，血腥的。宗教和艺术用于巩固贵族在政治上的地位，为他们控制经济提供神的辩护。”②

关于玛雅文明衰亡的原因，据历史学家猜测很可能是人口过剩和开发主要资源的经济结构过分庞大而引起的各种社会危机。虽然对于文明灭绝的原因尚未最后搞清，但有一点很明显，它来自于社会结构内部，它同样是各种调节引起的无组织力量的增长。对无组织力量增长的具体机制只有等搞清玛雅社会结构以后才能理解。

我们证明社会演化存在着这四种最基本的模式，绝不是说某一个社会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属于某一个模式而永不可改变了。我们仅仅是认为，从

①②哈蒙德：《玛雅文化概述》，载《史学集刊》1982年第3期。

功能异化和无组织力量增长方式以及潜结构取代来看，这些演化模式是四种最典型的极端状态。某一个社会结构真实的演化过程可以是复杂的混合形态。比如古埃及社会从一个个诺姆城市国家演化到统一王朝，就是一种结构取代。只是到古王国建立时，它才变成超稳定系统。而且，这四种典型模式是以一个社会没有受到外来冲击为前提而推导出的。当各个文明之间开始互相影响、互相交融时，无论是旧结构内部无组织力量增长的方式、速度、潜结构的形成和取代都将呈现一系列新的变化。原来是超稳定系统也可能打破，变到别的演化模式。古埃及在新王国以后，随着近东和地中海地区相继兴起一系列古代文明，文明的接触和融合不可避免，这个超稳定系统受到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它日益脱离自古以来就形成的那种与世隔绝的孤立状态，成为开放的古代近东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一个部分。

对于古代埃及社会来说，和外来文明的接触是痛苦的，它伴随着近五百年的动荡和不安。埃及从后期王朝开始一直到成为罗马帝国的殖民地，这一段历史十分混乱。古代埃及失去了它那伟大和庄严的形象，但却作为人类社会不同文明第一次融合的

例子，为后人提供了教益。

第五章

文明的冲突

那威势赫赫的古代文明，以其垒垒巨石，似悔恨，似内疚，压在今日人类的心头。……往昔黎民百姓的那位首领，也许并不怜恤民间的疾苦，但他却无限怜惜他们的死亡。他并不怜惜他们逐个地死去，而是怜惜整个人类将湮没于茫茫沙海之中。于是，他便率领他的百姓至少垒起那沙漠掩埋不了的块块巨石。

——〔法〕圣埃克絮佩里

5-1 从与世隔绝到开放

1983年10月的一天，一支由19人组成的美国—埃及远征探险队，从埃及的开罗出发，向西北进入了茫茫的撒哈拉沙漠。他们想要寻找二千五百年以前被暴风沙吞没了的波斯帝国的一支军队。据历史

记载，居鲁士大帝的儿子冈比西于公元前525年，为了彻底征服古埃及帝国，曾派遣一支五万人的大军，企图穿越沙漠到西瓦绿洲去焚毁古埃及人心中最伟大的神——阿蒙的神庙。他们在沙漠中整整跋涉了七天，来到了一个被后人称为幸福岛的地方。这天清晨，正当这支军队吃早饭的时候，突然，一阵极为强烈的南风，卷起了漫天的黄沙，铺天盖地。倾刻之间，这支军队就被这涌起的沙浪埋没了。从此，他们就永远地失踪了。① 现今的美国波士顿小说家加里·查菲茨认为，这支部队很可能是被凶恶的风沙埋在一个蜿蜒曲折的、高达100米的沙丘组成的迷宫之中。1983年，考察队准备根据这位作家的推想，去寻找波斯远征军的葬身之地。他们在沙漠中只能停留五个月，翌年三月中旬必须返回。否则，他们估计自己也将遭到波斯军队的下场。②*第二年，据报道，他们终于发现了一个墓葬群和若干人骨。如果确实证明这是公元前500年的遗物，那么这二千多年以来的历史之迷就算有了答

①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70—371页。

②1983年10月17日《参考消息》。

*每年的四、五月间，撒哈拉大沙漠中都要刮50余天的干热的南向季风，狂风卷起漫天的黄沙，直到六月中旬方能停止。

案。①

这个事件非常形象地反映了其他文明若要征服和影响埃及是多么困难。古埃及社会的特殊地理环境，可以使她完全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相对孤立状态。我们在第一章中曾叙述过埃及的地理位置。只有进一步了解古埃及周围的天然屏障，才能使我们对古埃及社会这个超稳定系统在新王国灭亡之后的一千年中受到的各种冲击以至最后灭亡的过程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

埃及的西部是无法逾越的撒哈拉大沙漠。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天然屏障，任何一种力量从这个方向都难以对埃及构成威胁。埃及的东面是阿拉伯沙漠高原。整个东部沙漠的平均高度为800米②。与西部沙漠一样，它也是古埃及的有力屏障。据《圣记·出埃及记》记载，摩西率领着以色列人向东逃离埃及，在经过这片东部沙漠去西奈半岛的途中，几乎遇到与波斯军队同样的厄运，幸好摩西施展法术，才得以死里逃生。*

埃及的南部，是尼罗河上游。溯尼罗河而上至

①1984年4月17日《人民日报》。

②侯赛因·凯法菲等著：《埃及》，黄威烈、朱运发等编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页。

厄勒蕃丁处（今阿斯旺处），河道宽窄不一。到此为止河床坡度较小，平日水流平缓，很便于船只航行。这里就是古代埃及古王国时期的南部边界。再向南，尼罗河上有六个瀑布，河流湍急，河道窄狭。河道中遍布坚硬的基岩。有的裸露于河面之上，有的则匿身于河水之中。河床坡降不规则，船只无法航行。两岸则是难以通行的山地。古代埃及的法老，为获得南部努比亚的黄金，多次派兵溯河而上，侵伐努比亚。每当大军到达厄勒蕃丁以后，队伍就要弃船登岸，把船只拖上岸边，在陆地上拖拉前进。这时，道路有时为无穷无尽的荒沙切断，有时则为泥泞的池沼所隔阻。经过一段相当艰难的路程，绕过这六个瀑布，船只才能放进水中。①

埃及的北部濒临地中海，这里的海岸倾斜平缓，浅滩密布，暗礁罗列，船很难靠岸。海洋对于远古的人类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而且尼罗河三角洲上沼泽密布，实际上通向海洋的出口几乎是封

---

* 据学者们考证，以色列人在逃离埃及时，大概是遇到了几乎全部死去的厄运，但他们也似乎真遇到了“奇迹”。许多巧合使他们九死一生地穿越了沙漠到达了西奈半岛。（见科西多夫斯基著《圣经故事集》，新华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119页—130页。）

①司徒卢威编：《古代的东方》，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第93页。

闭着的。在埃及古王国、中王国时期，海岸确是非常平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支海军能够威胁埃及。沙漠、高原、瀑布、大海成了古埃及的忠实卫士，他们驻守在埃及的四周，终年累月，不知疲倦地承担着保卫古埃及的任务。

一位国外的学者说："凡能阻止外族或别部落之干涉者，即得称为一种保护；如人所不易越过之特殊地势，将成为特殊之防卫，人之逾越愈难或逾越之时须费极大之能力，则其保护之作用必愈大。许多地理之特点，常被利用作为特殊之防卫，若川流、若湖泊、若重山、若峻岭、若沼泽，皆有保护小规模社会之能力。……若欲安然度越，必也文明先有极大进步。"① 一位美国的埃及学家认为："埃及之风俗、宗教、美术及文字之奇特，实因其在尼罗河流域之内发达，她好象处于孤舟之中，借海、沙漠及险滩与其余人类相隔绝。我们尽可承认此类防备可以使埃及不受外国之侵略。从各方面侵入埃及之路既有限而又狭隘，自然不利各民族及军队之往来。如果入侵者由沙漠而来，则他们在经过大沙漠之时，必然会遇到绝粮断水的危险；若由地

①斐格莱：《地理与世界霸权》上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2页。

中海而来，也很容易失败而与后源断绝联系。亚述人多次由海上的进攻，大都遭到这种命运。”①

是的，正如人们所说：“大自然对埃及特殊照顾，美索不达米亚人的早期文明建立在空旷的原野，他们把大半力量都放在自卫上了。美索不达米亚两面的巴勒斯坦，没有什么地理屏障，常常遭到侵扰。埃及就不是这样……，因此人民生活比较安定”。② 古埃及人充分利用了地理条件上的优势，他们依险而守，修筑了关卡。在古埃及和外界有限的通道上都置有重兵，以保护自己的安定和繁荣。据考证，大约在第四王朝时（公元前850年），古代埃及在西部设置防区，叫“西方之门”。为了防止南方的威胁，在第三王朝时，法老乔赛尔即决心于第一瀑布厄勒蕃丁至希拉康玻里设置边卡。第五王朝末年，又在厄勒蕃丁处修建了“南方之门”。它是长约12公里的砖墙，截断了由南方入侵的道路。③也是在这一时期，据帕勒摩石碑上铭文记载，第四王

①摩勒：《近东古代史》中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72页。

②莱昂内尔·卡森：《古代埃及》，纽约时代公司出版1979年中文版。

③摩勒：《近东古代史》中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42页。

朝斯涅弗鲁任法老期间："建筑了南境和北境的城墙，号为斯涅弗鲁堡"。①

这表明，古埃及社会是位于近东和西欧的交接点上。他在距离上虽和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近在咫尺，但是，由于这特殊的天然屏障，即使近东和地中海兴起了伟大的古代文明，但只要这些文明还不具备克服这些屏障的技术力量，只要古埃及王朝和其它社会力量的对比不是十分悬殊，古埃及社会都能成为一个相对孤立的系统。正因为如此，古埃及社会才能作为一个超稳定系统，从古王国到新王国存在了近两千年之久。

然而，公元前1,000年前后，形势发生了变化，这时新王国已老态龙钟，行将就木。如果说人类最初的文明，象黎明时刻那空中的寥寥的晨星，孤零零地闪烁着那迷人的光芒。那么现在，地中海地区兴起了许多伟大的文明，并进入了铁器时代。随着这些文明国家的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增大了。特别是当一个个新兴的国家稠密地排列在相邻不远的地区时，它们之间的地理屏障必然要消除，互相接触和经济文化交流必然日益频繁。（参见地

① 《世界古代史史料选辑》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8页。

图二）那挂在晨空中几颗古老文明的孤星，终于化入了令人目眩的世界文明融合的阳光之中了。

从古埃及晚期王朝开始到托勒密王朝这一千年的时间中，古埃及这个超稳定系统不断受到外来文明的冲击。一开始她还能有效地保护自己，但外来文明一天比一天强大，超稳定系统不得不打破。特别是公元前五世纪后，古希腊罗马文明兴起，世界上第一次伟大的文明融合过程，在地中海的东南沿岸区域拉开了帷幕。

5-2 干扰与冲击

人类早期文明交往和融合的过程，往往以刀剑为手段，以鲜血为代价。但在这刀光剑影之中，仍可以摸索出超稳定系统怎样打破并与外来文明融合的规律。超稳定系统一般都是在某种与世隔绝的条件（包括地理上的相对孤立位置和时间上远远早于其它文明）下形成的。它和其它文明的交往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加以考察，一种是外部文明比它落后，另一种是处于比它更为先进的文明的包围之中。前一种出现在超稳定系统形成后的鼎盛期，后者发生

在超稳定系统的后期。古埃及和外来文明的交往，从新王国时已经开始。最初无论在技术上还是从文化上埃及都处于领先地位。一般说来，当外来文明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组织上比古埃及社会落后时，它对超稳定系统至多只能构成一种干扰。为什么它只是干扰呢？因为超稳定系统具有强大的调节能力。当古埃及王朝处于强盛状态，即使外来文明克服了地理上的屏障，也很难影响它。这时外部文明反而常常处于古埃及王朝势力的控制之下。但超稳定系统又具有周期性振荡的特点，当外来文明的冲击刚好出现在王朝衰落、社会动荡期，那么它可能对超稳定系统发生作用，影响其修复机制，甚至建立外族人的统治。但是一旦当一个新的王朝重新强盛，这种局面就会结束。因此外来干扰常常在古埃及王朝本身衰落时影响埃及社会，又随着新王朝的修复而被排除。古埃及社会在第二个中间期受到希克索斯人的干扰就是例子。

中王国末期，埃及社会发生了强烈的振荡。贫民奴隶大起义后，王朝瓦解，神庙被摧毁。我们在第三章中讲到，在中间期新王朝的修复要经过相当长时间。正是趁这个混乱时期，亚洲的希克索斯人入主埃及，建立了十五、十六王朝。在埃及人的心目

中，希克索斯人是蛮族，他们的文明程度也的确低于古埃及民族。希克索斯人丝毫不去考虑这延续了几千年的埃及社会状况，他们残暴地烧毁了城市，彻底捣毁了神庙，向上下埃及征收贡赋，迫使埃及全国用产品和塔·米里（埃及）一切好的东西向他们纳贡。① 他们也不崇拜埃及的神，因为他们信仰的是亚洲的神。② 希克索斯统治者甚至派人到底比斯去，命令停止崇拜阿蒙神以及其他的埃及神。③ 也许由于他们的入侵，使埃及第二个中间期的动乱比第一个中间期更为激烈，时间也更长。

然而希克索斯人的入侵并不能打破埃及这个超稳定系统。他们比埃及落后，那年轻而野蛮的生命力会很快被时间吞没。随着他们的衰落，埃及王朝可以重新修复。历史正是这样展开的。希克索斯人有点象中国元朝的蒙古统治者，他们建立的王朝很快被无组织力量腐化了，最后被逐出了埃及。希克索斯人在埃及显得来去匆匆，但它却给埃及留下了战马、马车、和复合式的弓箭兵器。④ 埃及渡过混

① 《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7—299页。

②③A.费克里：《埃及古代史》，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2页。

④A·费克里：《埃及古代史》，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2页。

乱阶段，进入了新的稳定阶段——新王国时期。

我们知道，超稳定系统一旦克服了外来干扰，重新建立起来，外来的各种新的要素被注射到古老的社会中去，虽然社会结构变化甚微，但新建的王朝往往表现出巨大的活力。新王国的早期，埃及正是以一个庞大的有世界影响的帝国登上了历史舞台。埃及人从希克索斯人那里学来了新的作战技术，而且在驱赶外族政权时，造就了一支精锐部队，形成了新的职业军人阶层。

因此，新王国早期与中期的埃及在与其它文明的接触中，与其说是文明的交融，还不如说是她的强力输出。古埃及在驱逐希克索斯人的过程中，在东北方向实际上占据了埃及至小亚细亚的沿着地中海东岸的狭长地带（现在的巴勒斯坦、叙利亚的西部沿海地区），这是当时欧亚非三大陆的咽喉要地。埃及的法老们几十次地出征这个地带。图特摩斯一世率部队一直打到了幼发拉底河。图特摩斯三世时，在东北方向越过了幼发拉底河，在南部则深入努比亚，直到尼罗河第四瀑布处，他建立了一个横跨西亚，北非，规模空前的大帝国。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地域宽广、包容多种类型文明的庞大帝国。但是埃及对新占领国土的管理只是派驻军队，行政事务则

由当地的王公掌握，法老实际控制的区域仍然不过是尼罗河流域本身。① 但是各个公国都臣服于古埃及。他们与法老有定期的信件往来，每封信都有一定的格式。公国的王公在给法老的信中一般都称："吾皇陛下，吾神、吾之太阳；某城太守某，陛下之臣仆，陛下足下之尘土……王之命令，备受尊崇，按时对埃及纳贡。"② 而法老回信则说："注意，不得有所疏忽，预备多量之粮食，酒类及一切物品以供王师之用。须知王犹天上之太阳，其士卒之战马无不神骏。"③ 古埃及帝国向周围的国家强行征敛财富，每次战争都掠获大量的财物及人口，古埃及的首都成了"当时为人所知的全世界的首都"，④ 源源不断的财富（黄金、木材、香料等等）和俘虏进入埃及。当时，埃及帝国几乎是地中海世界的中心，尼罗河河谷是一个有力的超稳定系统，而它的四周则是进贡的藩属。

然而，这种局面不会永远继续下去。在超稳定系

①莱昂内尔·卡森：《古代埃及》，纽约时代公司1979年中文版，第57页。

②③摩勒：《近东古代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94—395页。

④A·费克里：《埃及古代史》，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53页。

统王朝的一盛一衰的周期中，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趋于饱和后就会停滞。而其它地区的文明却在迅猛地发展。新王国后期，古埃及凭着他老资格的历史履历，因袭几千年古老文明的遗风，依靠富足的土地，仍然保持着世界霸主的宝座。但这时在欧洲，米诺斯、迈锡尼的文明也已达到了顶峰，他们与许多国家特别是埃及开始建立密切的贸易往来，① 并从中吸取营养。在埃及的西部利比亚民族正在兴起，南部的努比亚人也不时进入埃及。在西亚先后出现了赫梯、亚述、波斯帝国，在他们与埃及之间的巴勒斯坦的狭长地域上也建立起叙利亚等许许多多国家。这些新兴民族，或迟或早将拥有比埃及人更为先进的技术。他们将凭着自己年青的生命力，骑着埃及人未曾见过的快马和骆驼，驾着战车，手持铁制兵器凶猛地敲打古埃及的门户。

5-3 超稳定系统是怎样打破的？

当外部文明和古埃及的超稳定系统一样强大，

①参见兹拉特科夫斯卡雅：《欧洲文化的起源》，三联书店1984年版。

甚至在技术上和组织上的力量超过古埃及社会时，外来的影响就不再是一种干扰。它将有力地冲击超稳定系统周期性复苏的机制，使超稳定结构慢慢破坏，王朝修复也就越来越困难。随着古埃及王朝在实力对比上一天天趋于劣势，它不断失去自己的藩国，最后不得不龟缩回狭窄的尼罗河河谷地带，依靠地理上的与世隔绝，奉行闭关政策。但是古埃及的大门迟早要被外来文明打开，古埃及文明被迫要和新兴文明交往和融合。这正是古埃及后期王朝所经历的痛苦过程。历史表明，与强大的新兴文明接触、抗衡，最后导致超稳定系统打破的机制不仅表现在外来文明不客气地破门而入之上，更重要的是对外征战和开放将导致国内无组织力量的增长，使社会结构各部分由适应变为不适应的过程大大加快。这种情况在新王国后期就十分明显。

我们在第三章分析过古埃及王朝无组织力量增长的五种形态。其中每一种都在古埃及和外来文明的对抗中加速增长。就拿土地兼并来讲，新王国后期，兼并速度比以前的王朝更为迅速，这和对外交往密切相关。古王国、中王国的兼并者主要是神庙和国家官吏，而新王国则出现了一个新的土地占有阶层。这就是军士阶层。他们每打一次胜仗都会得

到法老恩赐的土地、奴隶及其他财富。古埃及十八王朝图特摩斯一世麾下的一名桡夫长亚赫摩斯，他的父亲在一次战争中阵亡，他于是从军作战。由于作战有功，他“曾在全国面前得到七次黄金奖赏和奴隶”。法老仅在赫查一处就先后奖赏他60斯塔特（即阿鲁尔）土地。他在一次战斗后曾获得5头奴隶及5斯塔特（即阿鲁尔）的土地。① 这类事情很多。表面上看，每个军士得到的土地并不很多，但维持世界霸主的地位需要拥有大量军队。新王国时，埃及的雇佣兵和职业军人和书吏一样是一支庞大的队伍。兼并者数目比以前翻了一番，而且军费开支成为国家财政支出的重头。对农民的税收必然增加。这样，土地兼并势必加剧。新王国时战争频繁，而且多为胜仗，每次战役后都要行功论赏。军士们就这样不断获得恩赐的土地，而这些土地往往成了他们进一步兼并的基础。再者，笃信宗教的埃及人，将每个军团都用一个埃及主要神灵的名字命名②，每次战争都要向神祈祷，而战争一旦胜利，为了维系这种每战必胜的信心，法老都要向神庙奉

① 《桡夫长亚赫摩斯传》，载《世界古代史史料选辑》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7—50页。

②阿甫基耶夫：《古代东方史》，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89页。

献大笔财产（土地、黄金、奴隶、牲畜），为神添盖新的宏伟的庙宇，以表明阿蒙在冥冥的上天的神威一直在护佑着埃及的军队。于是祭司势力随着每次战争的胜利也迅速膨胀。*

总之，对外战争造成了埃及新王国的世界霸主地位，而这种霸主地位的光照越强烈，社会结构内部的无组织力量也就象植物那样，受光合作用越充分；它的“果实”生成的周期也就越短，“果实”也就越发饱满。所以，到了新王国的末期，古埃及面临的挑战和社会危机比古王国、中王国更为严峻，它不可抗拒地衰落了。这种衰落的症候在其内部依然表现在中央集权统治的衰微，地方势力——州长的权力膨胀，土地兼并以及祭司专权等；其外部症候是帝国管辖下的藩国纷纷背叛了埃及。这一时期埃及与其他国家往来的信件表明，她开始在亚洲丧失威信。① 毕布勒的公爵写信给法老，声称“国土已处于啥比利人的统治之下了”。② 一些国家起初还苦苦求诸埃及法老，让埃及派兵来保护自己免受他人的蹂躏，图尼普城的王公说自己“在流泪，没

---

* 参见本书第三章。

①②阿甫基耶夫：《古代东方史》，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77—278页。

有援助，二十年以来，我们寄信给我们的统治者，国王、埃及王，但没有得到一个字”。①但到后来，他们看到埃及根本无意也无力派兵时，即致书法老，扬言“现在我们不再属于我们的统治者埃及王了”。②一些在叙利亚的王国甚至在喜特国的支持下结成了反对埃及的公侯联盟。③随着埃及衰落，她在国际舞台上的霸主地位也就彻底动摇了。利比亚部落及海上部落（所谓“海上民族”，其中包括吕底亚人、昔烈尼人、西西里人、撒丁尼亚人以及部分希腊人）不断从西面、北面侵扰埃及。虽然埃及也曾多次打败过他们，但终归是处于守势状态。到新王国末期，内部终于发生了大动乱。那些饥寒交迫的人们揭竿而起，整个社会趋于土崩瓦解。

如果这时仍象古王国和中王国末期的外部环境，她应该通过动荡消除无组织力量，进而修复原有结构，再次经历由衰到盛的痛苦的恢复过程。但是，正如上面指出的，公元前1,000年左右，正是欧亚非三大洲的文明交融时期，埃及的封闭的外环境，在其他伟大文明的眼中已只是艰难的路程，而

①②③阿甫基耶夫：《古代东方史》，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77—278页。

不再是什么无法愈越的屏障了，对富庶的尼罗河流域的占有欲望足以支撑他们勇敢地跨越这些障碍。

特别要指出的是，这时西亚一带兴起的赫梯国家和亚述国家以及地中海其它文明，日益显示出他们在组织能力特别是在科学技术上的先进性。他们代表了人类一个新的时代——铁器时代。而古埃及仍然处于青铜时代。这种技术上的差异很快就在军事力量对比上明显地表现出来。

古埃及第一个保护性反应就是实行闭关政策，企图依靠地理上与世隔绝的天然屏障保持自己的稳定。史料表明，当埃及处于强盛之时，它倒是相对对外开放的。比如在中王国时期，埃及东北方国境是完全开放的，整个埃及境内有过大量贝督因人①。但是，一旦在对外交往上处于劣势，北方之门立即关闭。然而，在拥有强大活力的新文明面前，天险再也不能起到历史上一再行之有效的保护作用了。

在古埃及东南西北的自然屏障中，最容易突破的是东北部。它通过苏伊士地峡与小亚细亚相通。这条狭长的地带历来成为埃及通向亚洲以及亚洲人通向埃及的桥梁。历史上这个古埃及的门户是有重兵

①塞特尔斯：《"训诫"的年代在第二中间期》，载《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2期，第45页。

把守的。但是随着内乱的发生，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这个门户被打通了。在铁器文明面前，古埃及已不能再长期与他们分庭抗礼了。历来地理上的与世隔绝都是相对于一定的技术条件而言的。因而只要几个文明强大到一定程度，交往就必然发生。只要一个新的文明在军事上占绝对优势，那么她就可以通过各个薄弱环节涌进埃及。公元前八世纪以后，外来的文明如涨潮一般一次又一次冲击着古埃及社会。一开始使古埃及真正感到胆战心惊的是亚述人，亚述帝国的士兵，手持铁制的锐利兵器，驾驭着轻便的战车，势如破竹地进入埃及。埃及人手中的青铜兵器几乎成了一堆无用的废物。亚述人曾经辛辣地讥讽过那些依靠埃及的支持和他们分庭抗礼的以色列人："看哪，你们所信任的东西不过是破芦苇罢了！"① 公元前十七世纪，埃及的孟斐斯遭到了亚述人的旋风般的洗劫。接踵而来的是波斯帝国的大军。波斯帝国在埃及统治了两个世纪之久。这表明，由于文明的进步特别是人类进入铁器时代，古埃及社会已经不可能重新与地中海地区其它文明孤立起来。埃及超稳定系统必然被打破。

①莱昂内尔·卡森：《古代埃及》，纽约时代公司1979年中文版，第180页。

超稳定系统打破后该怎么办？很可能，无论是亚述人、波斯人还是当时的埃及人都没有很好地思考过这个问题。埃及人醉心于修复他们世世代代习惯的社会结构。而外来者则想把自己的社会结构强加于它。然而这两点都不能完全做到。在开放的地中海世界中，古埃及的传统修复机制正在慢慢失灵，而外来制度又很难在这个已经生存了三千年之久的古代文明中生根。其结果是大家都没有料到的，尼罗河畔“城头变幻大王旗”，整个古埃及社会陷于无止境的动荡。入主埃及的外来文明，无论是亚述，还是波斯以及其他人，一开始他们都带着胜利者的微笑，但很快就发现治理这个文明古国的困难。他们大多数迅速衰落，退出历史舞台，让位给其他新的入侵者。

在古埃及超稳定结构被打破，不得不和外来文明融合的历史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希腊人。他们曾经认真地进行过尝试，企图使古埃及文明和希腊罗马文明融合起来，进行一种新的创造。这就是马其顿亚历山大入主埃及后出现的托勒密王朝。它统治埃及近三百年。这三百年结下的丰硕的历史之果，以及留给我们的教训都是值得人们认真回味的。

5-4 旧瓶装新酒：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

公元前五世纪，希罗多德踏上了古埃及的国土。他吃惊地发现，古埃及和古希腊社会竟是那样的不同。他用惊奇的口吻记述道："他们上市场买卖的都是妇女，男子则坐在家里纺织。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织布时把纬线推到上面去，但埃及人则拉到下面。埃及的妇女用肩担东西，但男人则用头顶着东西。妇女小便时站着，男子则蹲着。他们吃东西的时候是在外面街上，但是大小便却在自己家里。……儿子除非是出于自愿，他们没有抚养双亲的义务，但是女儿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她们是必须抚养双亲的。……所有其他人一生是和畜类分开过活的，但埃及人却总和畜类居住在一起。他们用脚来和面，用手和泥土拿粪便。……在写算时，埃及则是从右向左。尽管如此，他们说自己是向右，而希腊人是向左。"① 希罗多德的这种惊诧几乎和

①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91—292页。

十八世纪那些第一次登上东方古老帝国的欧洲人一样。希罗多德对古埃及社会的陌生和好奇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他可能属于最早登上古埃及帝国的欧洲学者之一。当时，这个古老的文明已经有三千年的历史，而古希腊文明却兴起时间不长。埃及受古希腊文明的影响还非常之少。但继希罗多德之后，古希腊罗马文明如旭日东升，历史上古老文明与一个新兴文明的第一次融合开始了。

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吞并了埃及，建立了马其顿帝国。埃及这个古老文明的特殊性一下子引起了亚历山大的注意。亚历山大到达埃及后，他便“把埃及政府分派给许多军官掌握，因为这个国家的特点和实力使他吃惊”。① 亚历山大知道埃及人对自己古代神祉的崇敬，也知道埃及人对波斯人因不尊重他们的信仰所表现的憎恨。他决定去朝拜庙宇，和神庙的祭司们结盟，用传统的方法统治埃及。据说有一次，“亚历山大在他的内殿里对神作了一次特殊的私人的谒拜。从那时起，他完全相信了神谕的真实性”。② 他给母亲的信中说：“他得

①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8页。

②A·费克里：《埃及古代史》，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12页。

到了很伟大的指示”，以至于他临终时，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埋在阿蒙神的旁边。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大将托勒密在埃及建立了统治三百年之久的托勒密王朝。可能是因为亚历山大意识到在埃及只能恢复传统的社会结构，统治才能长久。他的继承者建立的托勒密王朝时期社会结构几乎是古埃及王朝的翻版。不同的是：军事力量以及政府官员是由希腊人掌握着的，社会结构是由希腊人修复的。

历史学家公认，托勒密王朝的经济结构和新王国时期是类似的。“不仅是税收制度、而且是农业组织以及主持这种组织的行政机关，上至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及的财务大臣职位都差不多完全同不久前所公布的维尔布尔纸草上的材料相类似”。① 甚至在政治体制和国家管理上，托勒密王朝也全盘保留了古埃及的国家机构。全埃及分为上下两个部分，由一个个诺姆组成，诺姆以下设县，县以下设村社。托勒密王朝同样把尼罗河河谷所有耕地置于官僚机构的监督之下，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财政税收系统。为了维系神权官僚政治的稳定，从托勒密一世开始就和神庙结盟。托勒密一世一到埃及，就向神

①久梅涅夫：《近东和古典社会》，载《史学译丛》1958年第4期第111页。

庙捐献了50塔兰特，作为一只阿庇斯圣牛的葬仪费用。而托勒密二世则一次赠与埃及各神庙75万德本的白银。以后各代国王如同各王朝法老一样，不断给神庙以许多特权、赠品以保持神庙对全埃及的精神控制。① 而神庙则把国王说成是“救主”，托勒密一世死后，马上被尊为神，在全国举行崇拜。② 一句话，在托勒密王朝，除了埃及人降为二等公民外，社会结构几乎是旧王朝的恢复。

不管亚历山大和他的部将托勒密出于什么考虑，他们的做法比波斯人要明智。无论对于文明融合还是维持统治，首先要在埃及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在当时，这只有恢复传统社会结构才能做到。新社会结构的创造一般要通过很长的时间。亚历山大或许已经感觉到，只有先修复旧结构，才有可能旧瓶装新酒，才能最后消化古埃及文明，将其吸收为古希腊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托勒密王朝的历史证明，它确实造就了古埃及与古希腊互相交流和融合的历史机会。

托勒密王朝带来的一个重大结果是：超稳定系统被纳入一个开放体系中。在托勒密王朝之前，外

①②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51—253页。

来文明的冲击主要表现为旋风般的武装入侵。超稳定系统和外部交往是脉冲式的。而托勒密王朝的地位却很特殊，它既保持了埃及的传统结构，但同时又是一个由希腊人掌握最高权力的政府。这样，埃及与希腊人之间的联系必然不可分割，特别是经济和文化上的交往。希腊人源源不断地来到埃及这个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这种文化和经济上的连续稳定的大规模交流在埃及历史上也许是第一次。托勒密王朝为人类历史上提供了一个罕见的例外，它向后人展示了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的稳定接触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在人类历史上，一个文明的毁灭，一个文明征服另一个文明屡见不鲜，但是象托勒密王朝那样一方面保持了古埃及传统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将它和希腊社会溶为一个开放的体系，这在世界历史上确实少有。这一段时间中，希腊人、叙利亚人、犹太人纷至沓来，大量迁居到埃及，使埃及成为各种文明文化上的开放地带。众所周知，那些对古希腊罗马文化作出重大贡献的古代哲学家，文学家大多数都到过埃及。

托勒密王朝也有意识地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尽可能把古希腊城邦社会中各种先进的经验在埃及推广。据说托勒密王朝曾从希腊调来大批人帮助埃及

治理国家。又把希腊士兵安置在埃及各地，平时维持治安，战时出动打仗。甚至聘请希腊专家以发展农业生产，招募希腊公务人员管理行政。① 这一段时间，整个社会商品经济达到了古埃及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农业产量、耕作技术出现了巨大的进步。海赫尔海姆把维尔布尔纸草书的内容同托勒密王朝时期的各种制度作了一个有趣的比较。他认为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及生产行政组织上和以前的主要差别在于它有很多合理化的地方。他甚至把这种差别说成是“半封建的农业计划化”同“合理的资本主义”之间的不同。② 这种估计肯定不妥当，实际上托勒密王朝的农业结构基本上沿袭了古埃及的制度，但因为希腊城邦社会的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商品经济结构对于古埃及社会是比较陌生的。可以肯定，在托勒密王朝期间，希腊的商品经济的活跃因素已经深深地嵌入了古埃及传统的经济结构之中。

托勒密王朝时期，商品经济达到了埃及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繁荣。城市中交易量和银钱兑换数目极为巨大。被后人誉为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的亚

①莱昂内尔·卡森：《古代埃及》，纽约时代公司1979年中文版，第161页。

②久梅涅夫：《近东和古典社会》（续），《史学译丛》1958年第4期。

历山大灯塔就是那时修建的①。亚历山大港的出现标志着埃及已成为当时国际贸易的中心。本来，埃及所处的地理位置很容易成为贸易基地（埃及处在几大洲通商的交通要道上），但由于古埃及社会结构，商品经济受到了束缚。到托勒密王朝时期，它被解放了。由于埃及经济力量雄厚和统一，“埃及的商业势力扩展到非洲北岸、整个爱琴海、小亚西亚沿岸、黑海以及叙利亚、东非等地”。② 公元前279年，托勒密二世为了炫耀自己的富足，曾举行过一个盛大的活动。据记载，在队伍的“行列中有一大车银器，其中有一个掺水酒缸，能容600迈特利提斯（约等于41升）。它的工艺水平很高，外面镶有宝石。二张食器桌、七个大洗盘、16个掺酒杯，一张12腕尺（Cubit约0.5米）大小的桌子、30张6腕尺大小的桌子，80个得尔斐城阿波罗神庙的祭坛，和无数别样物品，都是用上好白银制的。……最后有20辆车载着金子、400辆车载着银子，800辆车载着香料。此外还有儿童和其他的人的服装，10万步兵和两万骑兵的装备，与一个珍奇的或是外国的动物的行列，其中有拉车或骑着人的象、

①②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9173年版，第256页。

骆驼、驼鸟等等”。① 这些使人眼花瞭乱的珍宝显示了埃及的繁荣富裕。

说明埃及商品经济发达的另一个例子，是埃及的贸易收入。当时世界上最值钱的货物来自印度和埃塞俄比亚这两个国家，而这些商品必须先运到埃及，再转售到世界其它地区。埃及从中得到入口税和出口税。而且，“这种入口税和出口税并不是经过埃及的货物的唯一负担。它们要取得在道路和运河上运输的权利还要纳一种费用，旅客也要纳一种类似的税。在埃及，货物从入口港到出口港，或从生产地到消费地，所经过的道路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税收人员来夺取货价的一部分。”② 因此埃及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收入足以使世界各国嫉妒。

两种社会结构之间的接触和交往还表现在另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在埃及出现了少量“希腊式”城市。古埃及的大城市基本上是郡县城市，而古希腊社会的城市却是商品经济的中心，城市具有一定自治权。在托勒密王朝时，出现了两者混合形态的城市。亚历山大城就是最典型的这类城市。这些希腊

①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26—127页。

②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54—155页。

式城市享有一定的自治权。比如瑙克拉梯斯选举自己的市议会和市政长官。有一时期还发行过自铸的钱币。据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所记载：亚历山大城的居民（除奴隶以外）一般分三部分，埃及土人、雇佣兵和城市居民（希腊移民）。这三部分人口只有希腊移民享有政治权利。①

这些城市成为古埃及文化与希腊文化融合的摇篮。它们确实在历史上作出了惊人的创造。亚历山大城市不仅是商品经济最为繁荣的地方，而且是荟萃古代世界各国学者的圣地。据记载，它有4,000座宫殿，4,000个澡塘，12,000名花匠，40,000名纳贡的犹太人，400座剧场。它还有一所第一流的大学和一座庞大的图书馆。②图书馆藏书达70万卷。或许，古埃及文明和希腊文明融合对人类最重要的结果就是诞生了“科学”！

5-5 两种文明初恋的结果

人们一谈起古希腊文明的伟大，总是列举古希

①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2卷，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318—334页。

②乔治·伽莫夫：《物理学发展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28页。

腊的科学作为例子。如果没有欧几里德几何学，没有古希腊科学的原始规范奠定，文艺复兴以后西方近代科学的兴起是不可能的。历史学家们常常感到困惑的是，古希腊城邦非常之小，人口总共不过几十万，但为什么正是在这些城邦之中出现了对当代西方文明极为重要的种子。很多研究者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今天被认为是古希腊科学中的主体部分，大多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完成的，并非出自于古希腊本土。

欧几里德正是在亚历山大城写出了著名的“几何源本”；托勒密也是在这里完成了著名的光学实验；埃拉托斯特尼在这里第一次测量了地球半径；希拉菲斯医生则在这里开创了解剖学。甚至连阿基米德都是亚历山大城中的那些科学大师的学生。亚历山大城是两种文明交融的产物。这似乎象自然界中的杂交原理，杂交产生优势，两种文明在杂交中产生了双方各自本土上都无法生长出来的果实。

没有古埃及的文明，古希腊人是不可能有这样伟大的创造的。喜欢思辨的希腊哲学家能那么快地发现几何定律，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古埃及人在数千年丈量土地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更为重要的大约还是古埃及的造纸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造纸

术）埃及人早就发明了用尼罗河畔的纸莎草来制做书写方便的草纸。今天英文中的 paper（纸）即源自于古埃及纸草一词。在中国发明纸以前，它是最实用、最便宜的书写材料。它使亚历山大城成为世界的知识宝库，拥有古代藏书最多的图书馆。或许仅仅把科学诞生的机制归结到古埃及文明外表上可以看到的几项贡献是浅薄的。托勒密王朝时期，近三百年埃及文明与希腊文明的交融中，希腊人处于上层，他们摘到了新的文明之树的果子。但他们所以能成功，正是由于他们扎根在一个更为宏大、更为悠久的存在了三千年的文明古国的土壤之中，英国著名语言学家、古代史学家塞斯说得好："我们是古代文明的继承者，而古代文明则奠基于古埃及"。①

这段历史常常使人们感叹不已，一个古老的东方文明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孕育了珍珠，而一个刚刚兴起的生气勃勃的新文明则轻而易举地将珍珠取了出来，那个失去珍珠的贝壳却在历史上被人们遗忘了。历史虽然无情，然而最终它对于每一个民族都是公正的。希腊人不可能长期地享受古埃及的文明

①冯作民编著：《西洋全史》第2卷，台湾台北市燕京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111页。

之果。托勒密王朝时期由于形成了古埃及文明与古希腊文明融合的特殊条件，虽然古希腊人在文化上作出了光辉的创造，但这种创造只是黑暗中瞬息即逝的闪电。它只是两种文明在早期实现了融合后的产物。不同文明接触带来的创造性很快被社会危机的洪水吞没了。

托勒密王朝的悲剧在于：它一直没有创造出新的社会结构。在托勒密王朝的初期，它恢复了埃及原有的社会结构，然后再把古希腊文明中的各种要素如商品经济、土地私有制、希腊文化等引进了埃及。但它没有考虑到真正的文明融合要求社会结构的创新。否则超稳定系统的开放迟早会冲垮原有的社会结构，带来不可克服的社会危机。历史证明，不同类型的社会生活可以象流水一样混合起来，而社会结构却不能捏合。商品经济是古希腊城邦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和古埃及国家的诺姆经济却格格不入，它们始终是两张皮。不断给古埃及社会注入商品经济的血液，最后一定会在这个古老的文明中引起不同血型的凝血反应。商品经济和古埃及传统社会结构发生激烈的冲突，最后把社会结构腐蚀了。

在托勒密王朝的初期，国家拥有大量的土地和

税源，不断增长的商品经济给这个僵死的文明似乎带来了某种活力，但商品经济一旦发展到某一程度，就会动摇整个社会结构。目前保存下来的芝诺纸草书，是埃及地主阿波罗尼奥斯与他的庄园管理人芝诺的通信，它形象地反映了托勒密二世时，埃及处于太平盛世的经济状况。从这些书信中得知，希腊人阿波罗尼奥斯是政府一名重要官吏，他因战功得到国王赐给的领地，一共有3万阿鲁尔（约一千公顷）。其中一部分租给佃农，一部分按埃及历史传统方法由国家配给的奴隶、农民耕种。从这些文献中还可以看出一点，这就是土地中出租部分比重大大增加了。① 托勒密王朝既然大力发展商品经济，那么必然加速自耕农的破产，使得大地产开始出现。它造成的后果是：王朝税收不断减少，农民逃亡或陷于赤贫状态。这些问题是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末期经常碰到的。但托勒密王朝由于把希腊社会的某些经济模式移到埃及，对私人占有土地的控制放松了，所以托勒密王朝仅统治了一百年以后，就出现了中王国、新王国统治了二百多年后才会出现的危机局面，埃及很快形成了一个商业奴隶

①塞尔格耶夫：《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第441—443页。

主阶层。据法尤姆绿洲一个乡的材料判断，由于农民逃亡，土地荒芜，国王土地收入在50年间减少了一半。①一方面是国家控制力量的衰微，另一方面是广大农民失去土地陷于赤贫状态，这一切导致贫民——奴隶起义不断发生。历史上有记载的一次大规模起义发生在公元前165—164年的亚历山大城。领导人是一个埃及贵族。公元前140年至120年，南部埃及和亚历山大城连续出现几次起义。②总之，在托勒密王朝统治最后的一百多年中，全国性的农民起义不断出现。虽然这些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但托勒密王朝的统治也就在起义、镇压、再起义的频繁震荡中瓦解了。

托勒密王朝后期碰到层出不穷的社会危机。这些危机的根源是托勒密王朝没有进行社会结构的创造。托勒密王朝统治者在保存古埃及社会结构的前提下作了若干改革，使超稳定系统变为开放性的，使得两种文明在融合的早期阶段能够产生很明显的进步和成果。但这种融合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潜在的威胁，这就是文明融合没有触及社会结构的变革，

①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59页。

②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60页。

而只是一些依附于结构的社会生活的交融。所以它没有创造出一种真正能够容纳两种文明融合的果实的社会组织。当原有社会框架尚稳固时，这些果实显得光彩夺目，但在超稳定系统实现开放过程中，原有社会结构很快被腐蚀。随着这一结构的瓦解，文明融合产生的种种硕果也将毁于一旦。这一切很象在一座不透气的房子里打孔开窗，当超稳定系统那密不透风的墙上开了一个洞时，新鲜空气涌了进来，开始确实给这个古老的社会带来活力，但接着打开了第二个孔、第三个……最后整个墙都倒塌了，大厦崩溃，文明进一步融合也就不可能了！公元前30年，托勒密王朝第七代法老，美丽的克列奥帕特拉女王，看到自己的情人和保护伞罗马帝国三巨头之一的安东尼自杀，害怕被当作战俘押赴罗马，就用一条毒蛇噬胸而死。① 她的死宣告了气息奄奄、日薄西山的托勒密王朝的最后灭亡。三百年来，一次企图将古埃及社会结构和古希腊文明融合起来形成新的社会结构的尝试（这种尝试或许是不自觉的）遂宣告失败。古埃及沦为罗马帝国的殖民地。

①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名人传》古代部分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20—24页。

5-6古埃及文明给人类的遗产

如果说托勒密王朝统治埃及时，历史曾恩赐给古埃及一次机会，使其得以利用传统的社会结构来建立新的秩序；但到了罗马人统治埃及时，则根本没有这种可能了。埃及社会结构内部无组织力量之大，使得罗马人只能借助武力建立军事政权才能进行控制。历史学家公认，在罗马统治时期，埃及的土地制度，无论是它的名称还是它的性质，都逐渐地改变得和从古埃及一直到托勒密王朝的国家诺姆经济完全不同了。按照罗马法律，公有土地是可以转变为公民私有的。① 这样，大奴隶制庄园在埃及迅速兴起。商品经济的畸型发展甚至把神庙的土地也完全吞没了。罗马帝国名义上保留了神庙的所有权，但用摊派方式占据了这些土地的收益。实际上，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完全剥夺了神庙和祭司对居民的经济支配权，而对他们的宗教活动则不加干扰。他们的土地和全部收入都成为埃及财政中的一

①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57页。

个项目，和其它项目同样地受国家的管理控制。而维持公众祭祀的教士生活所需要的费用，现在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就由国家来供给了。① 这样在埃及出现了一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这就是神庙消失，古埃及文化连同祭司一起灭亡了。是的，在罗马帝国将埃及作为自己的领地的时候，神庙是必然灭亡的。因为它已经失去自古以来的组织功能，它已经不可能占有托勒密王朝时所占据的地位，它已不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而是某种历史上有过的社会结构的残余碎片，那些新兴的大奴隶主如狼似虎地把它们吞下肚去。罗马把自己的结构强加给埃及，把埃及变成帝国的谷仓，这就造成了两个历史性的后果。

第一，大量财富由这个文明古国源源不断地流向罗马。孟德斯鸠曾把这一点类比作十七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的殖民地掠夺，认为埃及刺激了罗马奴隶制商品经济的繁荣。他说："当奥古斯都征服埃及的时候，他就把托勒密的财库带到罗马来，这一点所引起的革命几乎等于后来印度（实际上是美洲——译者）的发现在欧洲引起的革命和某些制

①M·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09—410页。

度在今天引起的革命。金钱的价格在罗马下跌了一半；既然罗马不断把亚历山大城（亚历山大城本身的财富又是从非洲和东方来的）的财富吸收到自己这里来，因而金银在欧洲成了最常见的东西；从而这种情况使得各族人民能够用硬币来缴纳巨量的税款。”① 罗马帝国奴隶制商品经济明显是建立在古埃及这样巨大的商品粮基地之上的。因而历代罗马皇帝对古埃及都极为重视。《亚历山大远征记》中曾指出：“后来罗马人从亚历山大学到了经验，对埃及防范很严，从来没有从元老院派任何人去埃及当总督，只有他们中间评为骑士的人才能去进行统治”。② 塔西佗在《编年史》一书也这样写道：“作为保持专制统治的秘密手法之一，奥古斯都曾禁止任何元老或高级骑士进入埃及，除非是得到了他的许可。他通过这种作法封锁了埃及，以便不使任何人企图通过控制这一行省以及海上和陆上的枢纽地点而陷意大利于饥饿之地”。③

①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7页。

②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8页。

③塔西佗：《编年史》上册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9页。

埃及沦为罗马殖民地带来的第二个历史性结果是人们常常忽略的，这就是它加速了罗马帝国的灭亡。历史学家常常用亚历山大城的焚毁来比喻古罗马文明的瓦解。科学史家也喜欢用下面的例子来表示古希腊科学的衰落。公元415年，亚历山大城内一位以美丽和学问著称的女数学家赫帕提亚被一群土著的基督徒们撕成了碎片，此后，狂热的宗教信仰一天天地吞没了批判的理性，整个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科学就被世人遗忘了。这两个例子确有某种代表性。那些杀死赫帕提亚的基督徒大多是目不识丁的土著埃及人。古埃及社会从托勒密王朝后期一直到罗马帝国灭亡时期，一直是地中海地区最为动荡的地方。这里思想混乱，叛乱、贫民——奴隶起义此起彼伏。

众所周知，罗马帝国的繁荣是被两股凶猛的洪流吞没的，一股是基督教的兴起，它动摇了罗马帝国的精神基础，另一股是大地产，它瓦解了罗马的城市经济。这两股暗流的形成和迅猛发展都和古代埃及有关。在罗马帝国表面上尚十分强大之时，这些瓦解帝国的力量最先在埃及聚集，并从那里一点点漫延到罗马帝国的腹地。基督教首先征服埃及，这和埃及沦为罗马帝国殖民地密切相关。任何一个

社会要能稳定，繁荣昌盛，它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结构必须组成一个互相适应互相调节的系统。罗马把自己的统治网强加给埃及。埃及自身的社会结构瓦解了，对于政治和经济这两个子系统，古埃及社会还能纳入罗马组织系统中去，然而那保存了三千年的古代文化却不得不瓦解了。一个个埃及诺姆在文化上几乎又退回到原始状态。诺姆之间的宗教信仰变得互相敌对，甚至失去了统一的语言。在罗马时代，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纪载：一个信仰鱼神的州同邻近的州作战，因为这个州的统治者曾在信仰鱼神的领土上吃了这种神鱼。为了停止流血，甚至需要罗马军队出面干涉。① 这种情况在古埃及历史上是少见的，因为当时存在着全国统一的神，以一神为主的地方性多神教保持了各个诺姆信仰的协调。然而罗马统治其间，古埃及原有的统一的意识形态结构已经崩溃，很多诺姆不得不倒退到一种原始的封闭性图腾崇拜的境地。

人民的苦难，长达几百年文化上的真空，都迫使古埃及人寻找一种新的宗教。所以当基督教一旦在巴勒斯坦诞生，埃及人马上接受了这种新兴的宗

①阿·尼·格拉德舍夫斯基：《古代东方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6月版，第114页。

教，并以全部的热忱来宣传它。埃及人不仅最早接受基督教，而且埃及还成为基督教由东方传到罗马帝国本土的第一个中转站，对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广泛传播起了极大作用。埃及的文化中心亚历山大城曾出现过一批基督教思想家。其中有希腊出生的克莱门特，埃及人奥里根与圣阿塔纳修斯，他们帮助建立了基督教最早的理论体系，被认为是早期基督教最有影响的领袖。①

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也可以归结为社会结构调节功能的异化。② 它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之一就是基督教的兴起。功能异化在经济上的表现是大地产的出现，公元二世纪以后奴隶制大庄园慢慢吞没了罗马帝国的商品经济。③ 埃及的存在大大加快了罗马帝国各种调节功能的异化。在大地产的发展方面也是如此。埃及本来就有官僚奴隶主阶层兼并土地建立大庄园的传统，因而埃及最先形成了世袭的奴隶主大田庄。埃及特殊身分的奴隶演化为农奴十分方便。公元三世纪，埃及大多数农民已经沦为“奴隶”、或“农奴”的地位。埃及的“奴隶”和“农

①莱昂内尔·卡森：《古代埃及》，纽约时代公司1929年中文版，第164页。

②③见金观涛、唐若昕：《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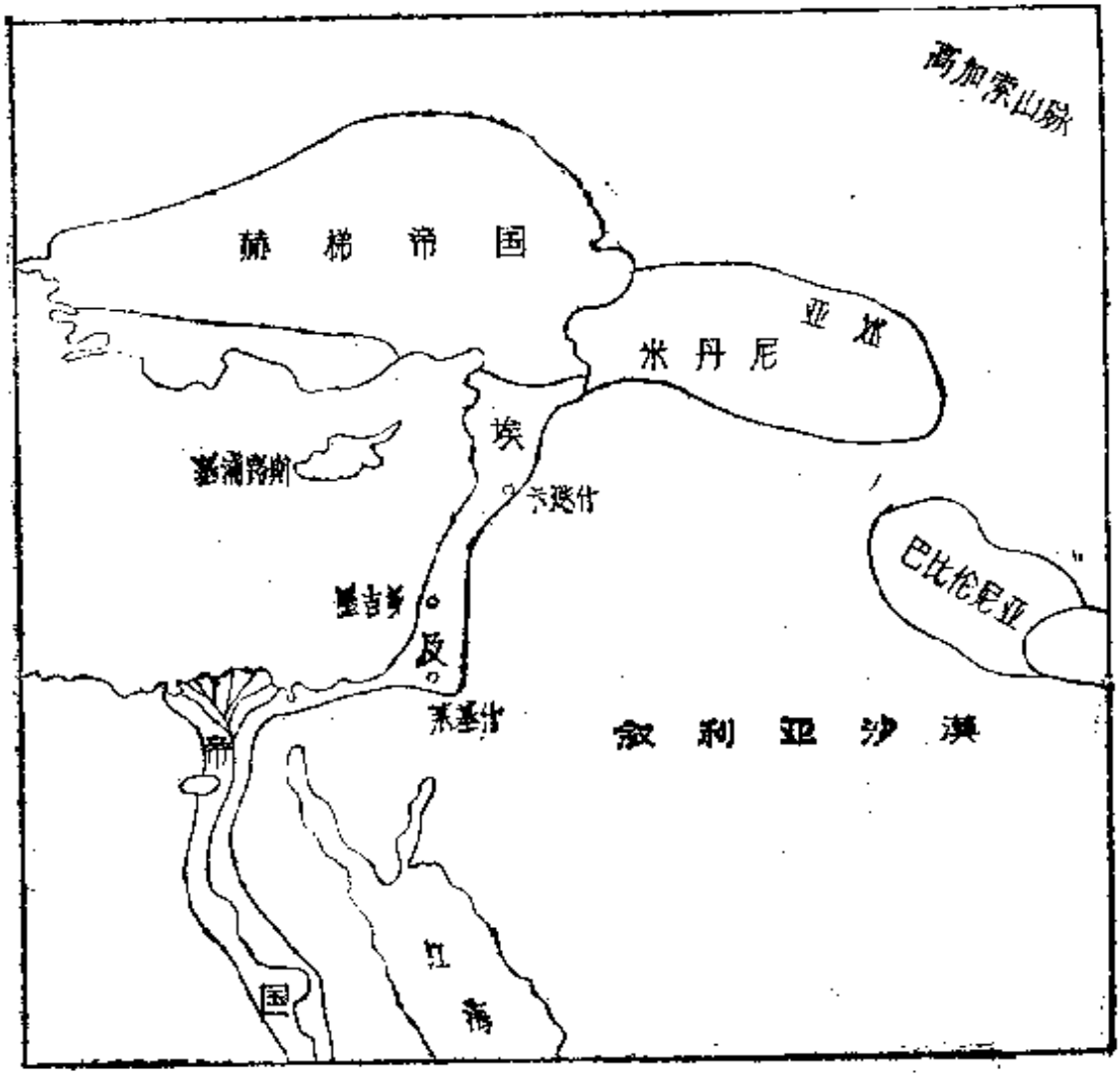
奴”制给罗马本土造成越来越强的冲击。这一切说明，古埃及虽然沦为罗马帝国的殖民地，但埃及只是被罗马文明所吞食，而并没有被消化，因而当古罗马文明日趋衰落的时候，古埃及成为瓦解古罗马文明的各种因素迅速繁殖和增长的基地。公元五世纪，无论是古埃及传统社会结构的碎片，还是古罗马社会都在各种社会冲突中灭亡了，他们一起去迎接那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地中海地区各民族共同创建新社会结构的狂风暴雨。

公元八世纪后，尼罗河河谷终于升起了新月旗。从此，埃及——这个人类古代文明最早的发源地终于隶属于伊斯兰社会。这数千年的历史变迁常常促使人们深思！古埃及社会究竟留给了人类哪些遗产？科学家会谈到几何学；工程师会想起那些不朽的建筑，那高超的测量技术；社会学家则把法律起源，宫廷文明的政体归之于埃及；甚至一个管理学研究者也会把管理科学的起源追溯到古代埃及时代……。古埃及人许许多多伟大的创造发明已溶化到今天人类文明之中，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可以看到它的作用。但是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更值得珍惜的是那些无形的遗产。

古埃及社会和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碰撞向人类展

现了不同文明融合所遵循的规律。当一个古老的文明和新兴文明相接触而不得不融合时，会开放出灿烂的花朵，结下丰硕的文化和科学之果。但是如果在文明的接触和冲突中不去创造一种能包容两个文明的新社会结构，那么旧社会结构一定不能胜任容纳文明融合中出现的新的创造，这时社会结构甚至于两种文明就有可能同归于尽，要不，是一种文明吞没另一种文明。无论出现那一种结局，对于文明冲突中的胜利者还是失败者这都是不幸的。历史只得在一次又一次痛苦的选择中寻找新的社会结构。

今天，历史学家一定还记得1789年拿破仑在金字塔下作的著名演说。他说，“士兵们，四千年的历史今天从这些金字塔的上面看着你们。”当时拿破仑的军队正和敌兵相遇，即将爆发一场对每个人生死攸关的战斗。拿破仑的士兵或许正是从五千多年埃及历史中得到鼓舞而勇敢地迎接那未来的挑战。今天看来，拿破仑似乎夸大其辞，他所指挥的那次战斗或许对人类命运并不那么重要。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却不应该忘记，那耸立在尼罗河畔的金字塔是文明生和死的见证，它至今还在注视着人类！它也将纪录人类二十世纪那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和日益强烈的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和融合！



（地图二）

附　录

附 录 一

古代埃及历代王表*①

——早王朝时期——

第一王朝（3100—2890年）

纳尔迈（又叫美尼斯）
阿哈
哲尔
捷特
登
阿涅德吉布
舍麦尔克赫提
卡阿

第二王朝（2890—2686年）

海特普塞海姆威
拉涅布
尼涅特捷尔
伯里布森
哈谢海姆（又叫哈谢海姆威）**

---

*表中年代均为公元前年代。

**有人认为哈谢海姆威是另一个王。

①本王表译自 British Museum, An introduction to ancient Egypt, London, British Museum Pub. 1979

——古王国时期——

第三王朝（2686—2613年）

陈纳赫特
乔赛尔
舍赫门赫特
卡巴
胡尼

第四王朝（2613—2494年）

斯涅弗鲁
齐奥普斯（胡夫）
勒吉德弗
齐夫林（卡弗拉）
麦凯林努斯（门卡瑞）
舍普舍斯卡弗

第五王朝（2494—2345年）

尤塞尔卡弗
萨胡拉
涅菲里尔刻勒卡凯
舍普舍卡瑞伊斯
涅菲尔佛瑞
涅苏瑟瑞
孟考霍尔　哈库霍尔
捷德卡瑞伊赛斯
尤纳斯

第六王朝（2345—2181年）

特提
尤瑟尔卡瑞
麦尔瑞尔（培比一世）
麦伦涅瑞
涅菲尔克勒（培比二世）

第七王朝（2181—2173年）

第八王朝（2173—2160年）

第九王朝（2160—2130年）

麦尔瑞伊伯瑞尔

第十王朝（2130—2040年）

瓦赫卡瑞　阿可

阿可利托斯一世

（卡涅提一世）　　利托斯二世

麦瑞卡瑞

耐伯卡胡瑞尔

阿可利托斯二世

第十一王朝（2133—1991年）

特普亚　孟图霍特普一世

塞赫尔托威　伊利奥特弗一世

瓦罕涅赫　伊利奥特弗二世

纳赫特涅布特普涅菲尔　伊利奥特弗三世

涅布赫伯特勒　孟图霍特普二世

萨恩克赫刻勒　孟图霍特普三世

涅布托威瑞尔　孟图霍特普四世

第十二王朝（1991—1786年）

塞赫特庇伯瑞·阿门涅姆斯一世（1991—1962）

克赫帕尔卡瑞·塞索斯特里斯一世（1971—1928）

努布考勒·阿门涅姆斯二世（1929—1895）

卡克赫拍瑞·塞索斯特里斯二世（1897—1878）

克哈卡库拉·塞索斯特里斯三世（1878—1843）

捷弓勒·阿门涅姆斯三世（1842—1797）

马克赫茹勒·阿门涅姆斯四世（1798—1790）

索伯克卡勒·索伯克涅弗茹（1789—1786）

第十三王朝（1786—1633）

赛克赫姆瑞　赛瓦捷托威利　赛伯克霍特普三世

克哈瑟克赫姆瑞　耐弗瑞霍特普

麦尔亚安克瑞　麦涅图霍特普

第十四王朝（1786—1603年）

第十五王朝（希克索斯人所建王朝，1674—1567年）

麦耶伯瑞　塞什
麦茹塞尔瑞　亚库伯赫尔
赛苏瑟瑞涅瑞　克奄
阿苏瑟瑞　阿波庇斯一世
阿昆涅勒尔　阿波庇斯二世

第十六王朝（1684—1567年）

第十七王朝（1650—1567年）

努伯克赫波瑞尔　伊托特夫七世
赛纳克坦瑞　陶一世
赛昆涅勒　陶二世
瓦捷克波瑞　卡莫斯

第十八王朝（1567—1320年）

涅布帕特亚勒　阿摩西斯一世
（1570—1546）
捷瑟尔卡尔瑞　阿美诺庇斯一世（阿蒙霍特普一世）
（1546—1526）
阿克赫帕尔克瑞　图特摩斯一世
（1525—1512）

阿克赫帕瑞涅尔　图特摩斯二世
（1512—1504）
玛卡瑞　哈特舍普苏特
（1503—1482）
曼克赫帕瑞　图特摩斯三世
（1504—1450）
哈克赫普茹尔　阿美诺庇斯二世
（1450—1425年）
曼克赫普茹尔　图特摩斯四世
（1425—1417年）
耐伯玛瑞　阿美诺庇斯三世
（1417—1379年）
涅弗尔卡赫普茹尔　阿美诺庇斯四世（埃赫那吞）
（1379—1362年）
安克赫克赫普鲁勒　赛姆涅克卡瑞
（1364—1361年）
涅布克赫普茹尔　图坦阿蒙*
（1361—1352年）
克赫帕尔克赫普茹尔　阿埃
（1352—1348年）
捷瑟尔克赫普茹尔　霍连姆赫布
（1348—1320年）

第十九王朝（1320—1200年）

曼伯赫泰勒　拉美西斯一世（1320—1318年）

* 曾叫图坦阿吞，后迫于祭司势力，又改叫图坦阿蒙。

曼玛勒　塞索斯一世（1318—1304年）
尤赛尔玛勒　拉美西斯二世（1304—1237年）
巴恩勒　麦尔涅普塔赫（1236—1223年）
曼涅米瑞　阿门麦西斯（1222—1217年）
尤赛尔克赫普茹尔　赛索斯二世（1216—1210年）

第二十王朝（1200—1085年）

尤赛尔克哈乌尔　塞特纳克赫特（1200—1198年）
尤赛尔玛瑞—麦尔亚阿蒙　拉美西斯三世（1198—1166年）
赫瑞玛瑞　拉美西斯四世（1165—1160年）
尤赛尔玛瑞　拉美西斯五世（1160—1156年）
涅布玛瑞　拉美西斯六世（1156—1148年）
尤赛尔玛瑞　拉美西斯七世（1148—1141年）
尤赛尔玛瑞　拉美西斯八世（1147—1140年）
涅弗尔卡瑞　拉美西斯九世（1140—1123年）
克赫帕尔玛瑞　拉美西斯十世（1123—1114年）
曼玛瑞　拉美西斯十一世（1114—1085年）

第二十一王朝（塔尼斯王朝）（1085—945年）*

赫捷克赫帕尔瑞　尼斯巴涅伯第德（赛曼德斯）
哈克赫帕尔瑞　帕苏塞涅斯一世

*二十一王朝是由入主埃及的利比亚人建立的，而与此同时，在南部埃及同时还存在着一个由底比斯阿蒙神庙高级祭司建立的上埃及政权，这个政权在十九王朝末年就实际存在了。（参见《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1—312页。）

阿门涅姆帕
希雅蒙
帕苏塞涅斯二世（底比斯王朝祭司政权）
荷里霍尔（拉美西斯十一世）
帕雅勒克
宾努捷姆一世
玛萨荷塔
曼克赫帕瑞尔
宾努捷姆二世

第二十二王朝（945—715年）

赫捷克赫帕尔瑞　舍斯霍涅一世（945—924年）
奥斯奥瑞昆一世（924—889年）
塔克路捷斯一世（889—874年）
尤瑟尔玛瑞　奥斯奥瑞昆二世（874—850年）
塔克路捷斯二世（850—825年）
舍斯霍涅三世（825—773年）
帕米（773—767年）
舍斯霍涅五世（767—730年）
奥斯奥瑞昆四世（730—715年）

第二十三王朝（818—715年）*

帕杜帕斯梯斯一世（818—793年）

* 在第二十二王朝中后期，底比斯阿蒙神庙祭司在南部建立了第二十三王朝。

奥斯奥瑞昆三世（777—749年）

第二十四王朝（727—715年）

塔夫那克赫特
巴肯瑞耐弗（鲍克乔瑞斯）

第二十五王朝（努比亚人建立的王朝，747—656年）

皮安克希（皮耶）（747—716年）
耐弗尔卡瑞　沙巴卡（716—702年）
捷德卡乌瑞　舍庇特库（702—690年）
库耐弗尔特姆瑞　塔哈夸（690—664年）
巴卡瑞　坦努塔姆（664—656年）

第二十六王朝（664—525年）

瓦希伯瑞　普萨姆麦提楚斯一世（664—610年）
艮赫米伯瑞　耐乔二世（610—595年）
南弗瑞伯瑞　普萨姆麦提楚斯二世（595—589年）
海伯瑞　瓦希伯瑞（阿波瑞伊斯）（589—570年）
克耐米伯瑞　阿摩西斯二世（阿美西斯）（570—526年）
安克赫卡安瑞　普萨姆麦提楚斯三世（526—525年）

第二十七王朝（波斯人王朝）（525—404年）

冈比斯（525—522年）
大流士一世（522—486年）

克谢尔克谢斯（486—465年）
阿尔塔克瑟谢斯一世（465—424年）
大流士二世（424—405年）
阿尔塔克瑟谢斯二世（405—359年）

第二十八王朝（404—399年）

阿米尔塔伊俄斯（404—399年）

第二十九王朝（399—380年）

涅菲尔瑞提斯一世（399—393年）
克耐姆玛瑞　阿乔瑞斯（393—380年）

第三十王朝（380—343年）

克赫帕瑞卡瑞　涅克塔涅波一世（380—362年）
台奥斯（362—360年）
斯涅德米伯瑞　涅克塔涅波二世（360—343年）
波斯人再次在埃及建立王朝（343—332年）*
阿尔塔克瑟谢斯三世　奥乔斯（343—338年）
阿斯列斯（338—336年）
大流士三世（336—332年）

马其顿诸王（332—305）**

（伟大的）亚历山大帝（332—305年）

---

* 历史上也称第三十一王朝。
** 马其顿帝国占领埃及时期。

皮列皮·阿瑞希达伊乌斯（323—317年）
亚历山大四世（317—305年）

托勒密王朝（305—30年）

托勒密一世　索特一世（305—282年）
托勒密二世　菲腊德勒夫斯（284—246年）
托勒密三世　埃乌尔盖太斯一世（246—222年）
托勒密四世　菲劳帕陶瑞（222—205年）
托勒密五世　埃庇发涅斯（205—180年）
托勒密六世　菲劳米陶瑞（180—145年）
托勒密七世　耐欧斯　菲劳帕陶瑞（145年）
托勒密八世　埃乌尔盖太斯二世（170—116年）
托勒密九世　索特二世（116—107年）
托勒密十世　亚历山大一世（107—88年）
托勒密九世　索特二世（88—80年）*
托勒密十一世　亚历山大二世（80年）* *
托勒密十二世　耐欧斯　狄奥涅斯索斯（阿乌列铁斯）
（80—51年）
克列奥帕特拉七世　菲劳帕陶瑞（51—30年）

---

* 托勒密九世重新继位。

* * 此时托勒密王朝已是风雨飘摇，罗马越发强行干涉她的事务，托勒密十一世即为罗马人拾出的傀儡，但他一继位，就被起义的亚历山大里亚人杀死了。（参见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2卷 第456—457页，三联书店1960年版）

* * * 即后人常说的埃及艳后，详见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名人传》古代部分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

附 录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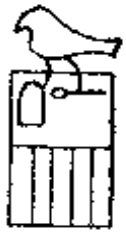
古埃及主要王朝法老名字的象形文字*

从法老象形文字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各王朝所崇拜的主神变迁，以及上下埃及的政治状况。比如第二王朝伯里布森的名号上，主神已不是荷鲁斯（鹰神—太阳神）。而是代之以象征塞特神的奇形怪状的动物。从第五王朝开始，象征太阳神“拉”的符号出现，并日益占据重要位置。十八—十九王朝后，人形的阿蒙神形象经常可见。

* 本表选自：British Museum《An introduction to ancient Egypt》london, British Museum pub, 1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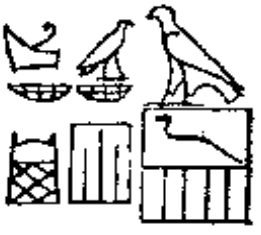
第一王朝

纳尔迈
（Narm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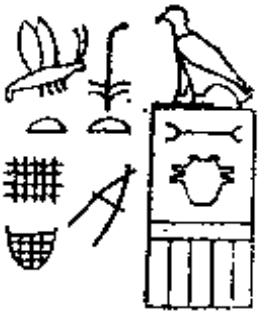
阿哈
（Aha）

哲尔
（Dj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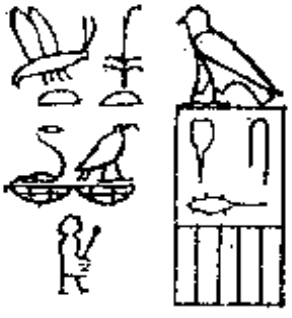


捷特
（Dj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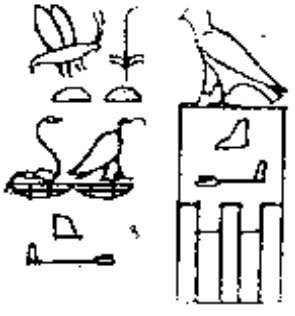
登
（Den）



阿涅德吉布
（Anedjib）



舍麦尔克赫提
（Semerkhet）



卡阿
（Qaa）

第二王朝

海特普塞海姆威
(Hotepsekhemwy)

尼涅特捷尔
(Nynetjer)

伯里森森
(Peribsen)

哈谢海姆威
(khasekhemwy)

第三王朝

萨纳赫特
（Sanakhte）

乔赛尔
（Djoser）

舍赫门赫特
（Sekhemkhet）

卡巴
（khaba）

第四王朝

斯涅弗鲁
(Snefuru)

齐奥普斯
(Cheops)

齐夫林
(Chephren)

麦凯林努斯
(Mycerinus)

舍普舍斯卡弗
(Shepseskaf)

第五王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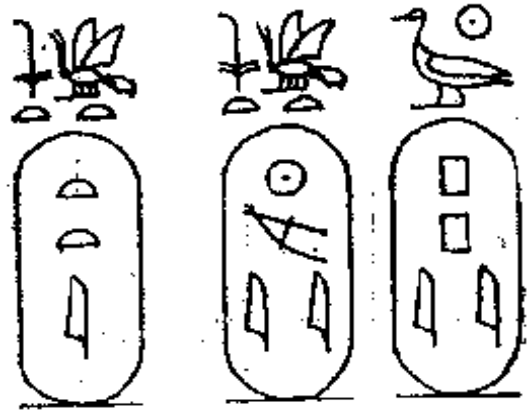
尤塞尔卡弗
（Userkaf）

萨胡拉
（Sahure）

涅苏瑟瑞
（Nyuserre）

尤纳斯
（Unas）

第六王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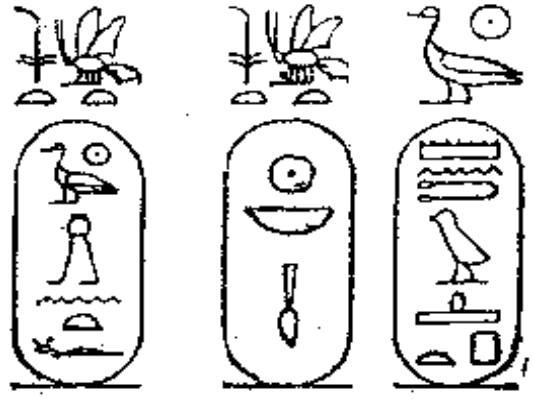
特提
（Teti）

培比一世
（Pepi I）

麦伦涅瑞
（Meren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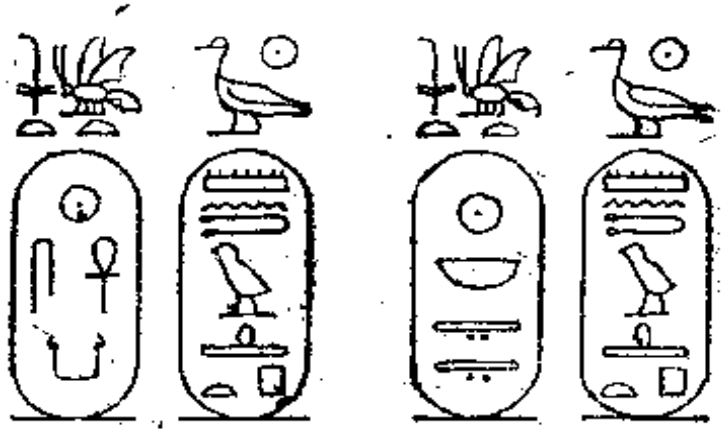
培比二世
（Pepi II）

第十一王朝



伊利奧特弗
(Inyotef)

孟圖霍特普二世
(Mentuhotpe 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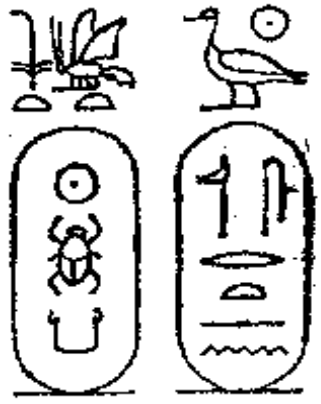


孟圖霍特普三世
(Meatuhotpe Ⅲ)

孟圖霍特普四世
(Mentuhotpe 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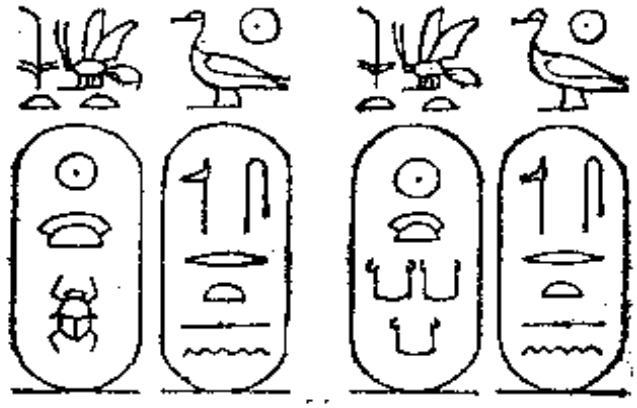
第十二王朝

阿门涅姆斯一世
（Ammenemes Ⅰ）



塞索斯特瑞斯一世
（Scsostris Ⅰ）

阿门涅姆斯二世
（Ammenemes 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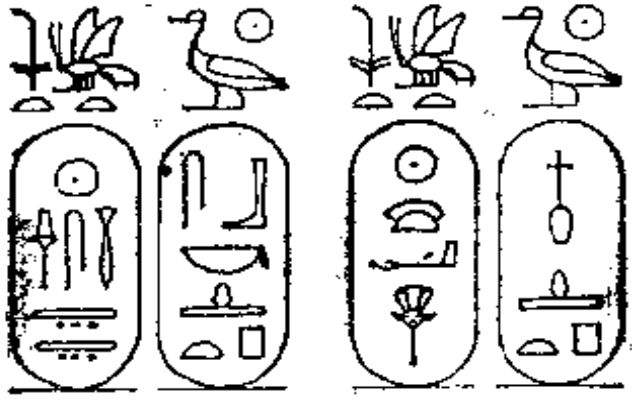
塞索斯特瑞斯二世
(Sesostris Ⅱ)

塞索斯特瑞斯三世
(Sesostris Ⅲ)

阿门涅姆斯三世
(Ammenemes Ⅲ)

阿门涅姆斯四世
(Ammenemes Ⅳ)

第十三王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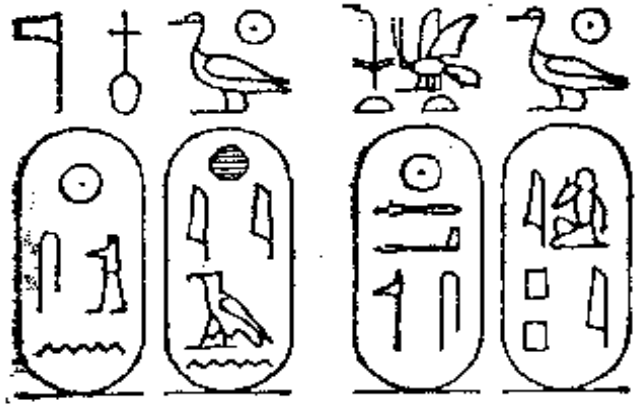


赛伯克霍特普三世
（Sobkhotpe Ⅲ）

耐弗瑞霍特普一世
（Neferhotep Ⅰ）

第十五王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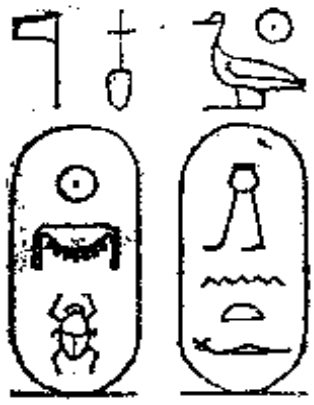
（希克索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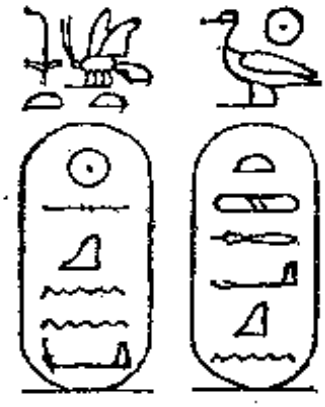
克奄
（Khyan）

阿波庇斯一世
（Apophis 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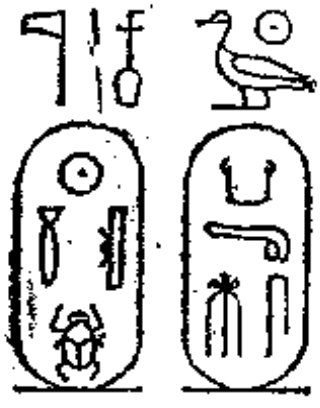
第十七王朝



伊托特夫七世
(Inyotef Ⅶ)



賽昆涅勒二世
(Seqenenre Ⅱ)



卡莫斯
(Kamose)

第十八王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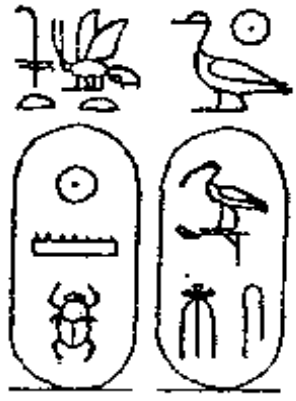
阿摩西斯一世
（Amesis Ⅰ）

阿美诺庇斯一世
（Amenophis Ⅰ）

图特摩斯一世
（Tuthmesis Ⅰ）

图特摩斯二世
（Tuthmesis 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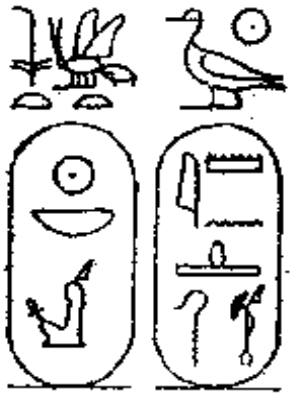
哈特舍普苏特
（Hatshepsut）



图特摩斯三世
（Tuthmosis Ⅲ）

阿美诺庇斯二世
（Amenophis Ⅱ）

图特摩斯四世
（Tuthmosis Ⅳ）



阿美诺庇斯三世
（Amenophis Ⅲ）

埃赫那吞
（Akhenaten）

图坦珂蒙
（Tutankhamun）

霍连姆赫布
（Horemheb）

第十九王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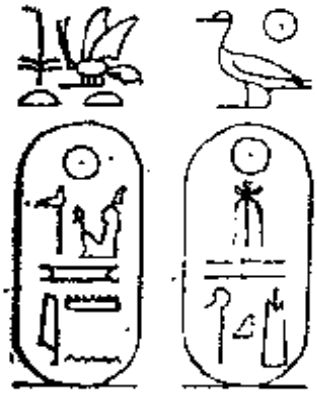
拉美西斯一世
(Ramesses Ⅰ)

塞索斯一世
(Sethos Ⅰ)

拉美西斯二世
(Ramesses Ⅱ)

麦尔涅普塔赫
(Merneptah)

第二十王朝



拉美西斯三世
（Ramesses Ⅲ）

拉美西斯四世
（Ramesses Ⅳ）

拉美西斯九世
（Ramesses Ⅸ）

第二十一王朝

赛曼德斯
（Smend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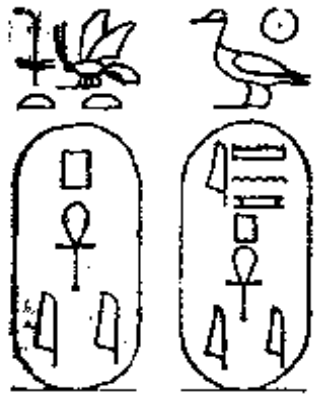
帕苏赛涅斯一世
（Psusennes I）

第二十二王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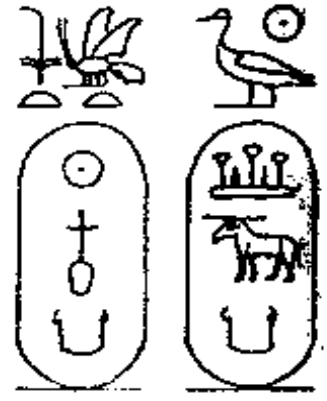
舍斯霍涅一世
（Shesho[illegible] I）

奥斯奥瑞恩二世
（Osorkon 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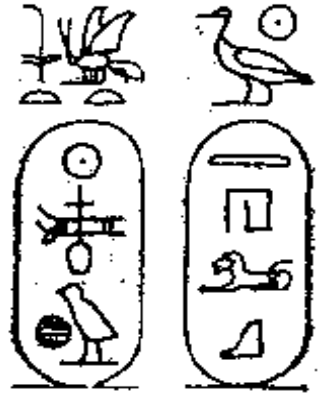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五王朝



皮安克希
(Piankhi)



沙巴卡
(Shabak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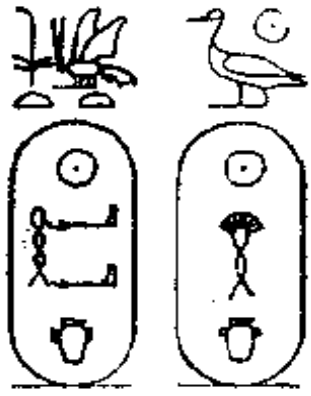
塔哈夸
(Taharqa)

第二十六王朝

普萨姆麦提楚斯一世
（Psammetichus Ⅰ）

尚桥二世
（Necho Ⅱ）

普萨姆麦提楚斯二世
（Psammetichus Ⅱ）



阿波瑞伊斯
（Apries）

阿摩西斯二世
（Amosis Ⅱ）

普萨姆麦提楚斯三世
（Psammetichus Ⅲ）

第二十七王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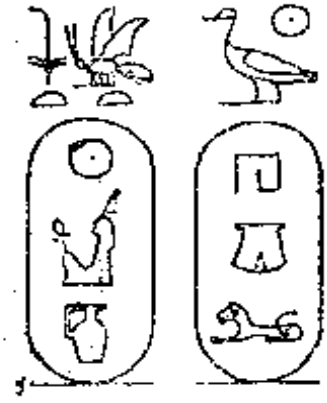
冈比斯
（Cambyses）

大流士
（Darius）

克谢尔克谢斯
（Xerxes）

阿尔塔克瑟谢斯
（Artaxerxes）

第二十九王朝



阿乔瑞斯
(Achor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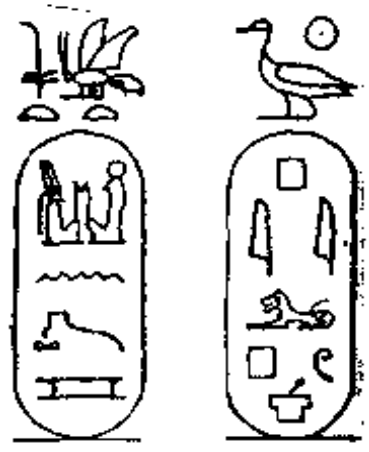
第三十王朝

涅克塔涅波一世
(Nectanebo I)

涅克塔涅波二世
(Nectanebo 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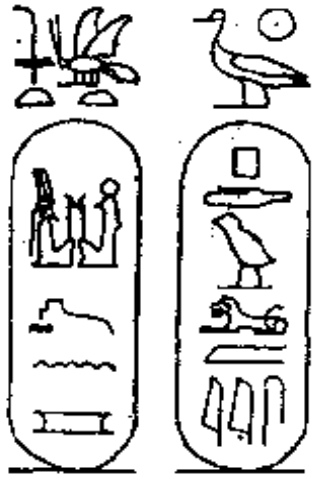
马其顿诸王

伟大的亚历山大
(Alexander the Grea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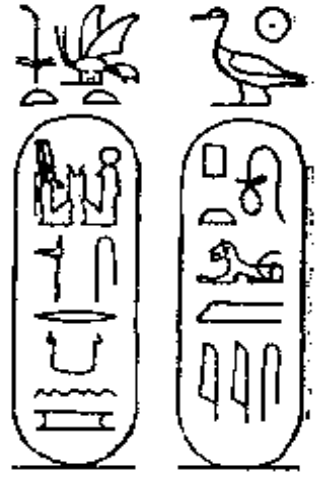


菲列浦·阿瑞希达伊乌斯
(Philip Arrhidae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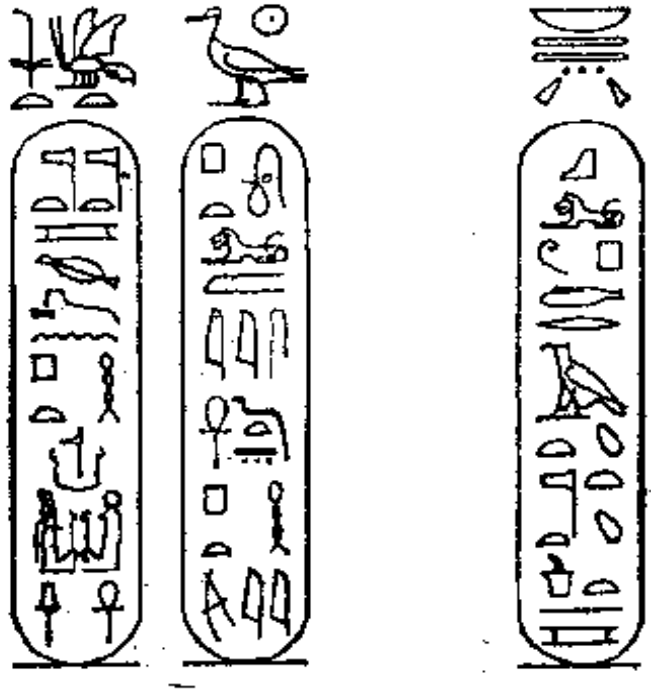
托勒密王朝



托勒密一世、索特一世
(Ptolemy I Soter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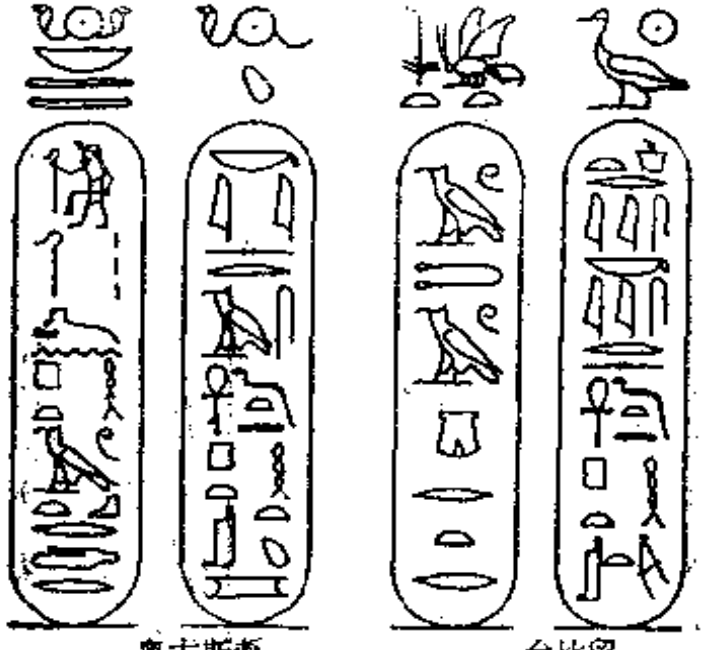


托勒密二世·菲腊德勒夫斯
(Ptolemy II Philadelphus)



托勒密五世 (Ptolemy Ⅴ)　埃庇发涅斯 (Epiphanes)　克列奥帕特拉七世 (Cleopatra Ⅶ)

罗马帝国时期皇帝的象形文字



奥古斯都
（Augustus）

台比留
（Tiberius）

图拉真
（Trajan）

戴克里先
（Dioclet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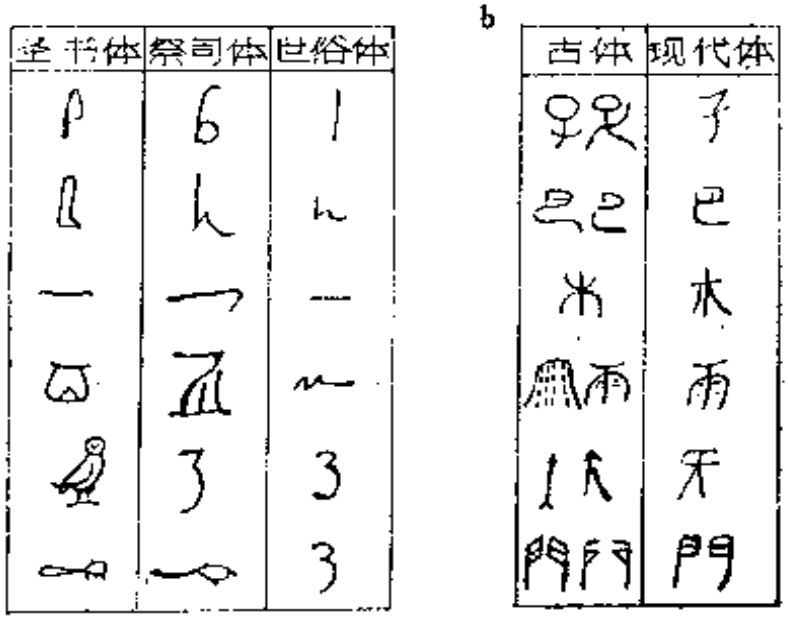
附 录 三

古埃及象形文字简介*

早在公元前三千多年以前，埃及已经发明了系统的象形文字。起初是用一幅图画来表达意思，以后逐渐将一些图画抽象出来作为特定的符号（即字）来表述具体的概念。这时的文字是用一连串的图画来表现。现在的人们一般称这时的字体为圣书体。据统计大约有2千多个圣书体文字，但经常使用的并不超过700—800字。第八王朝前后，又出现了一种祭司体（又译僧侣体）。这时的文字书写简化，字体斜倾，几乎丧失了图画的性质。它是祭司们在长期抄写公文中逐渐对文字简化的结果。以后（大约在新王国时期），又产生了更为简化的草写文体。草书文体也称为世俗体，它的特点是出现了字母、其中音素价值的符号开始占据优势。这样文字更加简化，甚至完全丧失了图画的性质。在日常生活中的文书记录一般都采用世俗体，但在书写正式文件时仍由祭司们工整抄写成祭司体，而在石

*本附录主要根据下列书目编写而成：Johnson, Paul《The civilization of ancient Egypt》New York, Athenenm 1978；艾伦·加德纳《埃及语语法导言》载《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2期；莱昂内尔·卡森《古代埃及》纽约时代出版公司1979年版；V. A. Istrin《文字的发展》文字改革出版社1966年版

碑的铭刻上，则毫无例外地一直沿用圣书体。关于几种文体的差别可见（图一）。公元二世纪以后，埃及沦为罗马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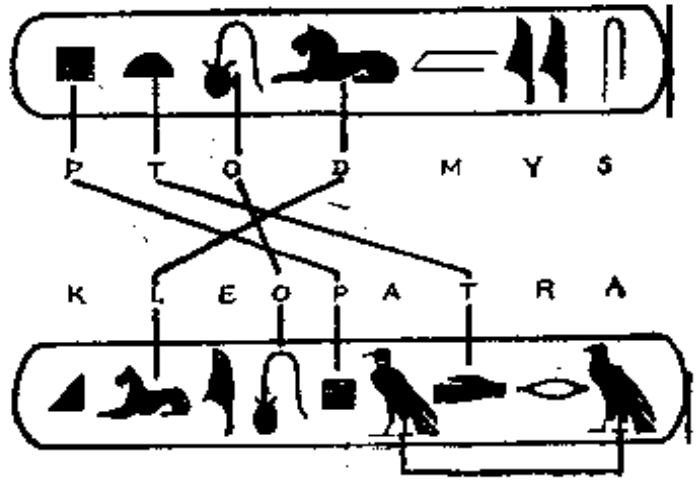
图一　埃及、中国文字发展变化
a——古埃及文字　　b——中国文字

国殖民地，神庙清亡，掌握古埃及文字的祭司们一天天地减少，终于这种曾经盛行了三千多年的古老文字失传了。考古、语言学家经过长期努力始终未能破译。一直到发现了著名的罗塞达石碑才出现了转机。

1799年，拿破仑属下的一名叫布萨（Boussard）的士兵在罗塞达处挖掘战壕时发现了一块刻有铭文的石碑。这是公元前196年的文物。上面刻着对托勒密五世的颂词。这块碑刻的内容并不重要，有意义的是它用了希腊文、古埃及象形文字（圣书体）及世俗体三种文字刻成。它为破译这种古老的文字提供了一个突破口。

法国语言学家让·弗朗西斯·商博良化了14年的功夫研究这块石碑，1822年9月29日，他的名作《关于象形语音学的字母给M·达西尔的信》在科学院宣读。古埃及象形文字之谜从此解开了。

首先被商博良认出的是托勒密的名字。这个词在碑文中位置明显，且被一个线框圈住，反复出现。商博良发现，埃及的象形文字可能是一种拼音，他反复将这些符号进行组合，再译读其他人名。1822年，有人将出自菲莱岛的一块碑文的拓本交给商博良，他根据以前拼出的符号马上拼出了克列奥帕特拉——埃及历史上著名的女王的名字。（见图二）这样他就得到了两个不完全的字母表，根据这些字母，他又推断出了另外一些字母。他认出了



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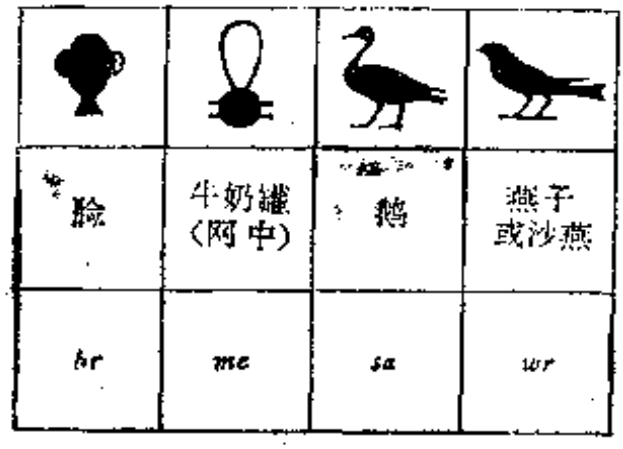
“亚历山大”（见图三）和另外两个纯粹的埃及法老的名字：拉美西斯和图特摩斯。原来，古埃及文字并非象以往人们认识的那样是纯粹的象形表意文字，也不是纯粹的拼音

图三

文字，它是两者的混合体。古埃及人没有将文字完全拼音化，没有用符号来表达所有的发音字母，他们用一些图形来表示某些重要的辅音，用这些辅音来拼读。图四是表示

符号			
代表的东西	猫头鹰	口	水
近似的发音	*m*	*r*	*n*

鹌鹑	面饼	门闩	亚麻辫
w	*t*	*s*	*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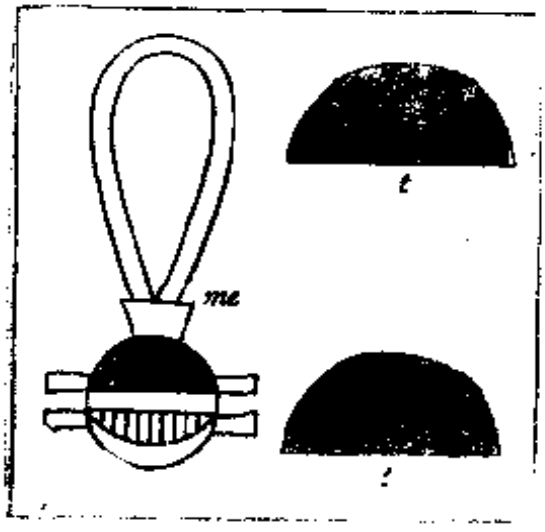


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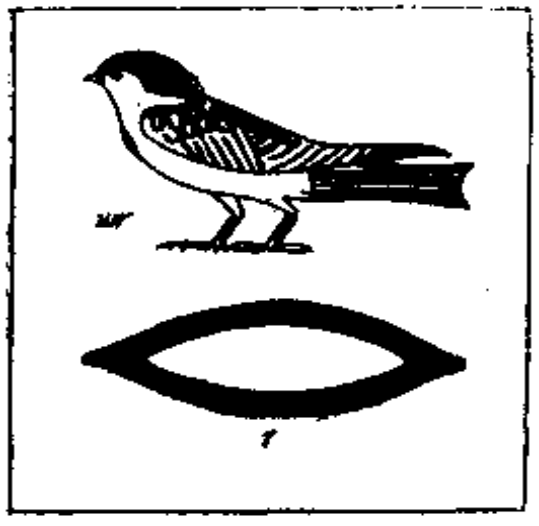
某些单辅音和双辅音的字母符号。用这些辅音组合，就能拼出各式各样的词，这些词既可以表示具体有形的东西，也可以表示抽象的概念。

但是，古埃及字母中没有元音，用辅音并不能准确地表述一个词。随着人们拼读中的元音发音的不同，同样的几个辅音字母组成的字可能发出许多不同的音，代表许多不同的意思。比如h·n·w三个辅音可以读作hinew、ohanow等等，用M·S·H三个辅音相组合可以读为：Meseh、miseh、emseh等等。

M+S+H=鳣鱼



ME + T + T = 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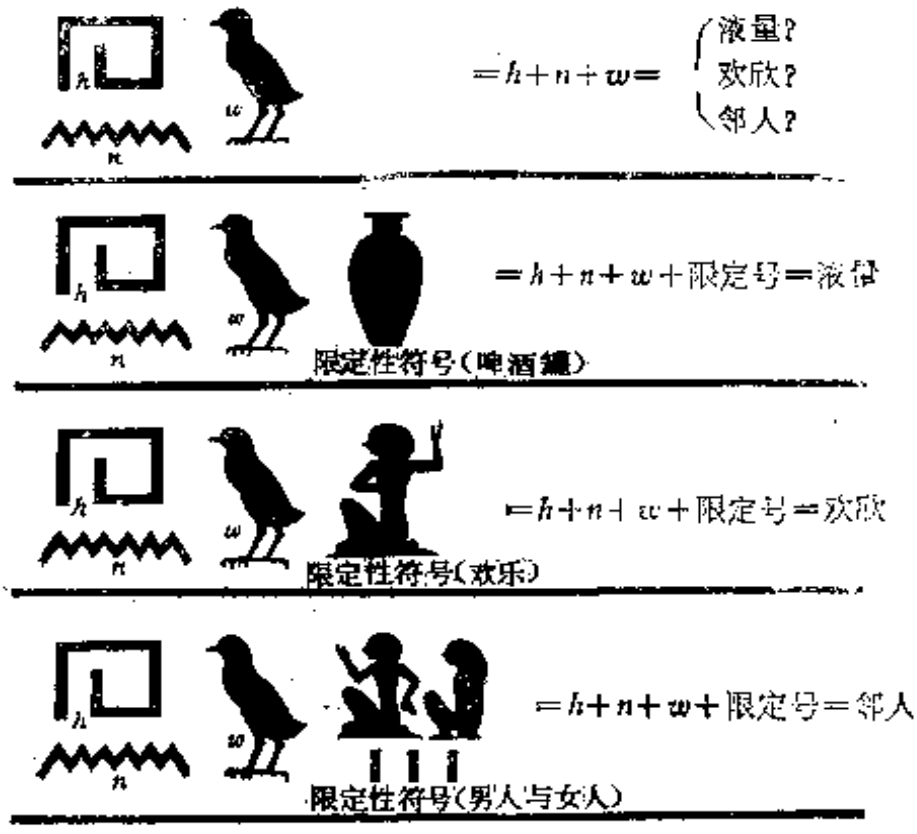
WR + R = 伟大

图五

（参见图五）由于元音的不同，同样的字母组合表达的意义根本不同。为了以示区别，古埃及人想出了一种巧妙的办法，这就是在每一个拼字后面加上一个象形的限定符号。根据限定符号再加上写出的由若干字母组成的字的具体拼音，从而也就规定了这个字的涵义。图六是一些限定符号。比如用酒罐子表示和酒与液体有关的"限定"。当用几个辅音排起来不能确定拼出的是哪个词时，后面加上限定符号，就很明确符号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了。比如h、n、w三个辅音放在一起在古埃及语中可能有"液量"、"欢欣"、"邻人"三种意思，加上三个不同的限定符号就一意确定了拼音的含义。如加上"酒罐"这个限定符号就是指液量。（见图七）

哭	男人，儿子	牛，公牛	啤酒罐，酒	蜜蜂，蜜
雏鸟	欢乐	扬帆上行	女人，寡妇	山地，沙漠

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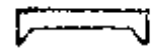
图七

总之，古埃及文字是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拼音字母，二是表意符号，它是借用一些图画来表达一些具体事物的概念。如“太阳”是用一个圆形中间加一点来表示。玛和犁也是用它们的形象来表示。三是限定符号，后两部分符号是不发音的。只有这三部分组合起来，才能准确地确定一个词的意义。图八是部分象形文字的限定符号，它们表达和某一类对象做的事情。比如眼睛表示眼睛做的事情和一切与眼睛有关的事情。而男性生殖器象形符号表示与其有关的各种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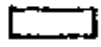
鼻子、嗅觉
高兴、轻视

夜，黑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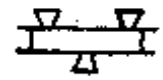
敌人、外国人



天空，上面



石头、沙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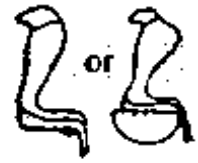
路，旅行
位置

矿物

外国人
外国

沙漠、外国

家，建筑物



女神、女王

城市，村庄
埃及

赞美，恳求

刀，切割

吃，喝，说，
想，感觉

植物、花

眼，看，月
眼睛做的事

船，航海

高，高兴，
庆祝，支持

空气，风
帆

神，法老

走，跑

凶猛，残酷

男性生殖
器，生殖，
产生，撒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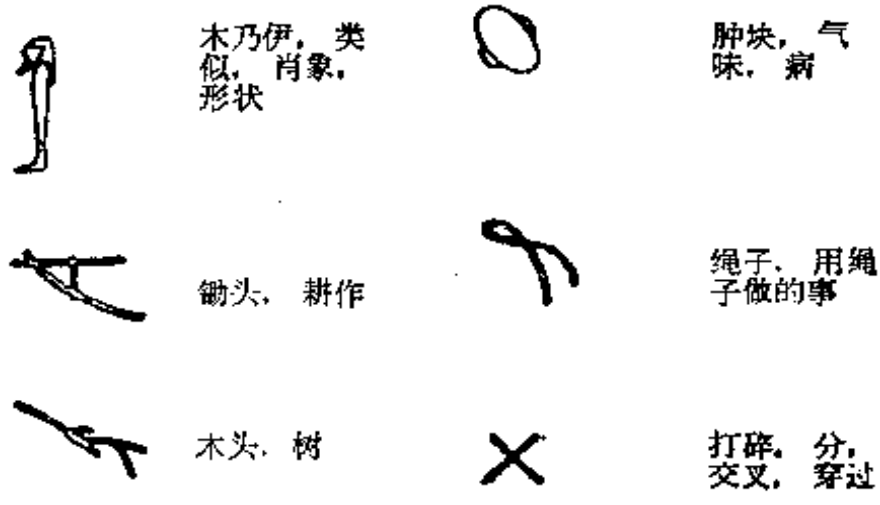
封，包，
拥抱

树

鸟，昆虫

太阳，光线
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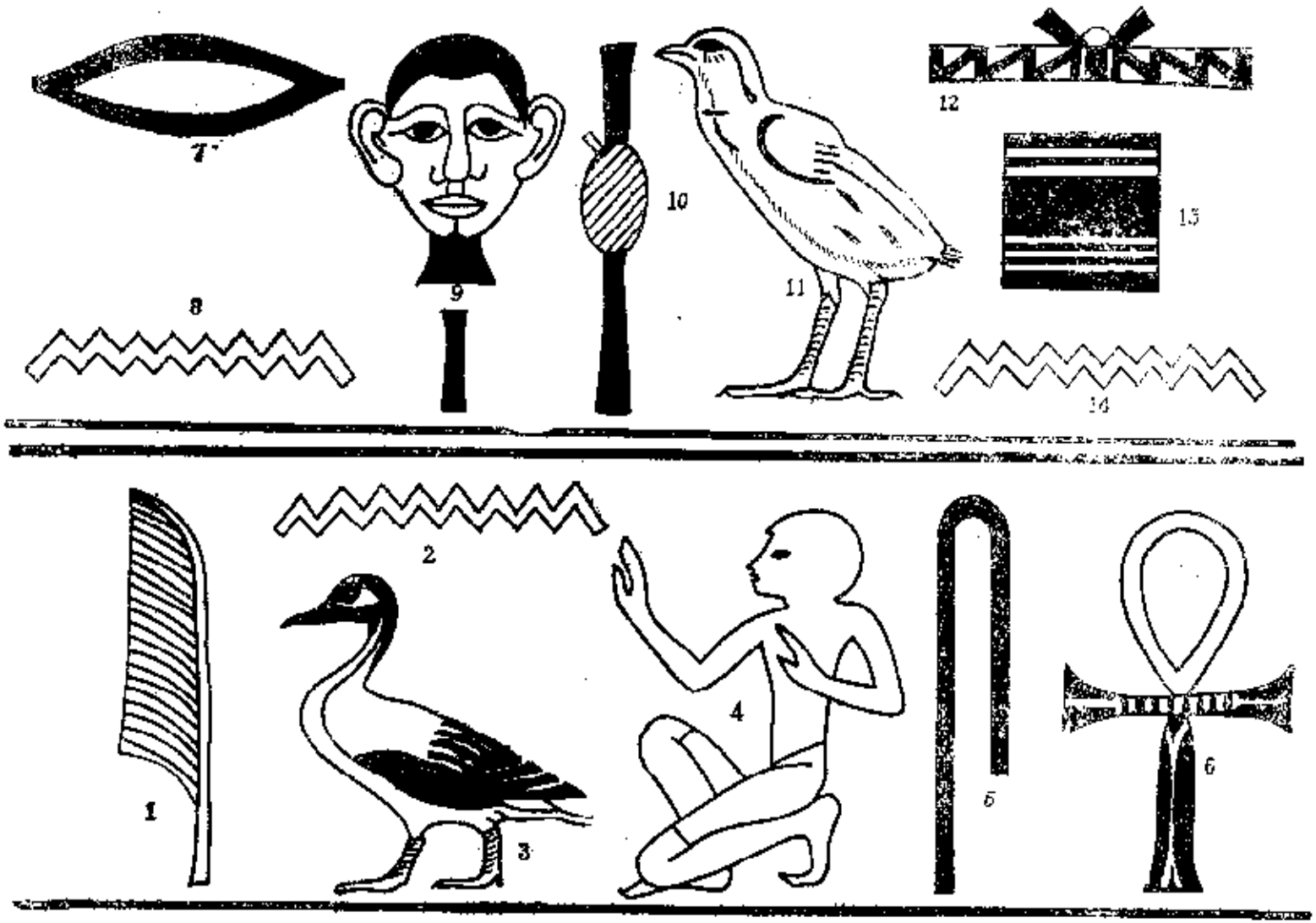
小，坏，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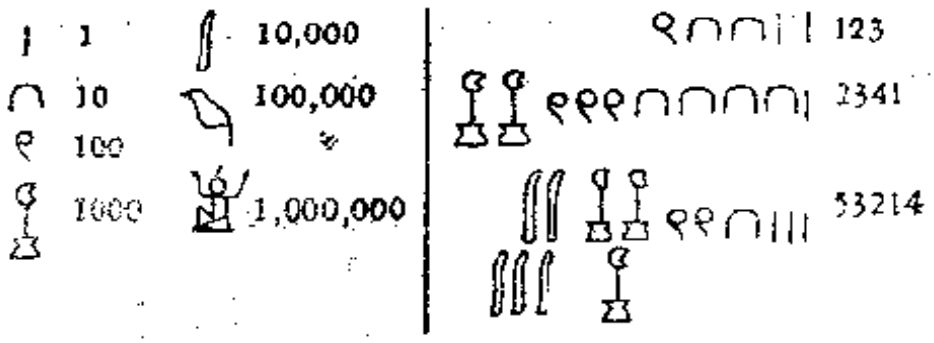
图八

埃及人利用这些符号可以简便地表述各种意思，这些奇妙的文字源于古埃及人独特的思想方法并反过来进一步加强埃及人的思维模式。（图九）是十二王朝一个军官的墓志铭，如果仅仅看图案，或仅仅用拼音，是无法知道它的意义的。它应读为："是我的儿子使我的名字活在这块石碑上"。父亲的爱子之情跃然于纸上。

古代埃及人不仅发明了独特的象形文字，而且在历法，记数、度量衡方面都有独具一格的创造。埃及人感觉不到春夏秋冬四季，他们把一年分成三季：尼罗河泛滥季节、播种季节和收获季节。每季四个月。图十表示古埃及人的记数系统，它是十进位的，但10以内的九个数字没有专门符号，20就是两个10的符号并列。埃及人用不同的符号来表示分数。用这种符号同样可以列出算式，进行四则运算（图十一）。大约最能反映记数法和文化关系的是埃及人对谷物的计量方法。它来源于荷鲁斯眼睛的神话，荷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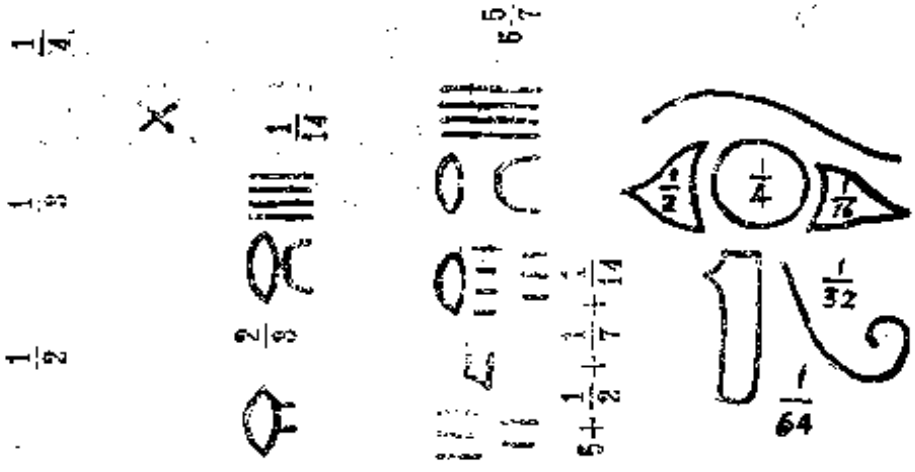


图九



图十

斯神曾被塞特神撕成碎片，眼睛不同碎片形状表示谷物的量度（图十二）。非常有趣，这些碎片（图十二）记号加起来只有$\frac{63}{64}$，而不是1。关及长度单位也独具一格，它用指宽、掌宽、肘等表示各种长度单位，并标以象形符号。$1\frac{1}{2}$肘称为一节（Pole），100肘为一竿（rod），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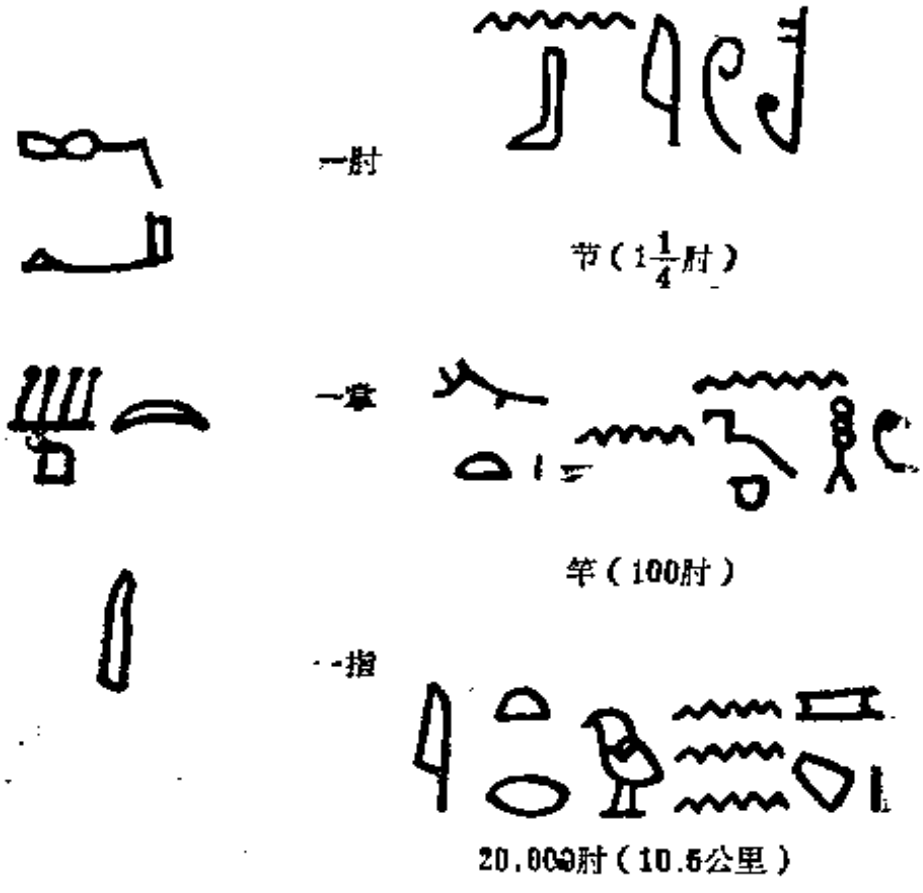


图十一

图十二

单位是20,000肘，约为10.5公里。

文字、度量衡、历法以至于技术都是建立文明的工具，古埃及在这方面独特的创造，充分表现了任何一种技术和文化都是一定社会结构的产物并和社会结构相适应。



图十三

走向未来丛书

人的发现
增长的极限
激动人心的年代
GEB——一条永恒的金带
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
现实与选择
经济控制论
探险与世界
看不见的手
语言学和现代科学
在历史表象的背后
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

人的现代化
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
没有极限的增长
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
在国际舞台上
昨天　今天　明天
摇篮与墓地
择优分配原理
第三次数学危机
凯恩斯革命
艺术魅力的探寻
西方文官系统
动态经济系统的调节与演化
新的综合

走向未来丛书

- 富饶的贫困
- 定量社会学
- 儒家文化的困境
- 系统思想
- 日本为什么“成功”
- 悲壮的赛落
- 弗洛伊德著作选
- 西方的丑学
- 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 画布上的创造
-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
-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 信息革命的技术源流
- 增长、短缺与效率